

陈垣

撰

#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智超 导读

蓬

菜

阁

丛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 陈智超

K.308 定价：9.30 元

ISBN 7-5325-2810-3



9 787532 528103 >

陈垣

撰

# 元西域人华化考

蓬

陈智超 导读

莱

阁

丛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撰;陈智超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2

(蓬莱阁)

ISBN 7-5325-2810-3

I. 元… II. ①陈…②陈… III. 古代民族-民族同化-研究-中国-元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264 号

蓬莱阁丛书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 撰

陈智超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75 插页 5 字数 122,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5-2810-3

K·308 定价:9.30 元

##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肇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有“汉家石渠阁、老氏蓬莱山”之称,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

## 《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

陈智超

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

——陈垣<sup>①</sup>

《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下一般简称《华化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 (一)

本文开首引用的，是陈垣先生在 1964 年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的一句话。它是了解本书写作背景、写作目的的一把钥匙。

《华化考》作于 1923 年，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辛亥

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列强侵略,政客争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陈垣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25岁时在广州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用文字作革命宣传,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员,定居北京。残酷的政治现实,沉重地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美好政治抱负,1923年开始,他彻底转向史学研究与教学,但并没有放弃报国之志。

这时的中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国民体质,处处落后,被人讥为“东亚病夫”,就是学术、文化也处于落后状态,为人轻视。据他的朋友、学生们回忆,当时陈垣先生萦回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就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

例如,胡适 1959 年 1 月 3 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团拜会上说,20 年代“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sup>②</sup>

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 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sup>③</sup>

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翁独健在 1978 年回忆道:“1928 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sup>④</sup>

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sup>⑤</sup>

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发表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sup>⑥</sup>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写作,就是陈垣先生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过去提起中国的盛世,不是汉代的文景,就是唐代的贞观、开元,清代的康乾。提到元代,最多说它的武功显赫,而更多的是注意它的残暴统治。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而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所以他在《华化考》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



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卷八第一节)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

他在书中郑重声明:“吾之为是编,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卷二第四节)为此需要对本书题目所用的“西域”及“华化”两词加以说明。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人们熟知的史实。时代不同,西域的范围也有变化。元代开疆辟土,西域的范围较以往扩大许多。元时又有“色目”的名称。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们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元代的色目人与历史上的西域人范围不完全相同。《华化考》所论者是色目人。为什么作者不用“色目人”而用“西域人”,他是这样解释的:“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用西域者,以元时分所治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色,公牍上称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称西域也。”(卷一第一节)关于题目中的“华化”,检阅现存的《华化考》的提纲和初稿,提纲先作“中国化”,后改为“汉化”,初稿沿用“汉化”,至定本改为“华化”,但文中还保留少数“汉化”之词。改“汉化”为“华化”,我们固然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元代的汉人与汉族人不是同义语,“汉人”不但指汉族,也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而元代的“南人”中大部

分是汉族。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本文开首所引的陈垣先生的话：“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他不曰色目人而曰西域人，不曰汉化而曰华化，以西域人与华人相对，以西化与华化相对，其故可深长思之！

## (二)

《华化考》的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但这只是作者写作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也就是说这个论断是否成立，并为人们所认同，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现实，作者提出的论据是否正确、充分，论证是否符合逻辑。

作者在界定了元时西域人的范围之后，又对“华化”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卷一第三节）

“华化”的定义既明之后，作者又是从哪些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之华化的呢？

第一，儒学：“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卷二第一节）

第二，佛道两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不必说。“佛教非出于中国，然元时佛教之入中国，已千三百余年，本分禅、教两大宗，其禅宗早已成为华化。倘其人之佛学得自梵文，或得诸西域，固不可谓之华化；倘其佛学系由汉译经论，或由晋、唐以来之支那撰述而得，而又非出家剃度、身为沙门，仅

以性耽禅悦,自附于居士之林,则不得不谓之华化。”(卷三第一节)

第三,文学:包括诗、文、词曲。这当然指的是中国诗、中国文以及在元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元曲。

第四,美术:包括书法、绘画和中国建筑。关于书法,作者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卷五第一节)关于绘画,“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以元版图之大,即有西域画家挟罗马、波斯、土耳其之画法,以显于中国,亦并不奇;然此之所谓画家,乃中国画法,非西域画法,故不曰西域画家,而曰西域之中国画家也。”(卷五第二节)

第五、礼俗:包括名氏、丧葬、祠祭、居处之仿效华俗。作者说:“试一检元人文集,种人(超按:此处指色目人)之请字请名者触目皆是,其人皆慕效华风,出于自愿,并非有政策之奖励及强迫,而皆以汉名为荣。”(卷六第一节)又说:“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莫过于丧葬。”(卷六第二节)

由此可见,作者所说的华化或同化,是指文化上的影响、吸收、接受或认同;也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之宏阔。

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材料富。许冠三在评述《华化考》时说:“仅就资料的丰实言,已属前无古人。全书七万余字,共用材料二百二十种,以金石录和诗文集为主体,所引元、明人诗文集约百种,在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连画旨、画谱、书法、进士录等,亦搜罗无遗。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

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sup>⑦</sup>

第二,版本多。许冠三又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缜密服人,‘多聚异本’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如考余阙华化,所见《青阳集》,即有元刊五卷、六卷本,明刊九卷本和四库六卷本四种。考丁鹤年事迹,所据鹤年著述则有两种版本:一、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二、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所参考的戴良作品,亦有两本:一是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戴序,二是收入戴良《九灵山房集》的《鹤年吟稿序》。前者是初稿,后者是定本。”<sup>⑧</sup>

第三,善利用。美术篇的西域之中国书家和画家两节,作者写作时较其他篇省力,因为他利用了两部“极现成之书”,即元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论证西域人名氏效华俗,则利用了元人文集中触目皆是的“字说”。但在论述西域人丧葬效华俗时,因为诸家记述极少,他多方搜集材料,利用了当时很少有人利用的《元典章》,从元代禁止畏吾儿仿效汉儿丧葬体例中反证:“必其有所效,而后有所禁也。”(卷六第二节)

许冠三还评论说,《华化考》“论证的谨严,亦是当代罕有。如证《丁鹤年集》通行本皆明刻说,共举五证,证证确切。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sup>⑨</sup>

《元西域人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等等方面,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他当年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应为后人铭记。

《华化考》也有一些具体的、细节的失误,比如鲁古纳丁、

别的因、泰不华、鬲实带、郝天挺等人是否为色目人？有的肯定不是，有的还有争论。

学无止境。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 (三)

《华化考》完成以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华化考》初稿写成之后，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前四章）之前，作者曾将油印稿分别寄给包括鲁迅在内的国内外的一些学者。

第一个反映来自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桑原比作者年长 10 岁，毕业于东京大学，此时是京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正是日本汉学中心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桑原于 1924 年春天收到《华化考》油印本，在当年 10 月出版的《史林》杂志发表了题为《读陈垣氏之〈西域人华化考〉》的书评。<sup>⑩</sup>书评一开始就说陈垣是现在中国史学家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他认为陈垣研究的特点有二。第一，是在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方面，“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代也里可温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揭载之《火袄教人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为当时学界所见重”。第二，则是书评一再强调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桑原还说，《华化考》“博引傍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不但研究元史，即使是研究中国文化史，都应参考此书。桑原的评价多处以陈垣与其他中国学者对比，读完这篇书评，如果再参看桑原大约同时写



的评论柯劭忞《新元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文章,更可以体会到,为什么陈垣先生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为什么他一再提出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王国维读《华化考》油印稿后,于1925年2月向作者寄赠有关李珣材料一条。李珣是唐代土生波斯人,能作词,《花间集》收录其词作37首,可称为元西域人华化之先导者。以后周肇祥、英华也告以同一材料。<sup>⑪</sup>作者则受此启示而联想及李珣之妹、前蜀王衍昭仪李舜弦,能诗能画,为增《西域妇女华化先导》一节。

1929年,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给应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的陈垣先生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缔交信。信中说:“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sup>⑫</sup>傅斯年现存信件多已刊出,看过他的信件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他最谦恭的一封信;而了解他的性格的人,又会知道这绝非客套之词。他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除了同有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愿之外,也是觉察到了以《华化考》为代表的陈垣先生的前期著作所达到的水平与产生的影响。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学者将王国维与陈垣并提。但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的伯希和。他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两人。<sup>⑬</sup>

1934年冬,陈垣先生将先后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和《燕京学报》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下篇木刻出版,请

陈寅恪作序言。陈寅恪在 1935 年 2 月写了《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序中说：“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又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大昕）以来未之有也。”又说：“今日吾国治学之上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陈寅恪在写序同时，对书中一些具体提法曾提出意见，作者也作了相应的修改。<sup>⑭</sup>一处是卷二儒学篇第五节摩尼教世家之儒学，排印本“噉欲谷为回纥谋臣”，木刻本改为“僂氏世为回纥贵臣”。另一处是卷四文学篇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排印本“迺贤直托尔斯太一流之所自出也”，木刻本改为“迺贤与托尔斯太一流正有些相类”。“正有些相类”，与作者一贯的文风不类，细察木刻本，知此数字为删改补刻，似为陈寅恪来函原文，作者一为尊重对方意见，一为将就刻版字数。在此之前，大约是 1930 年底至 1931 年中，两人就曾对《华化考》书中的不忽木其人进行过讨论，现存的一纸——陈笔谈遗墨是其见证。原来，陈垣先生在校勘沈刻《元典章》时，发现在《元史》等书中多次出现的不忽木，在《元典章》中作不忽术。究竟是“木”还是“术”？在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之前，他没有下结论，而是向通晓多种文字的陈寅恪请教，想从语言学方面寻找证据，再作判断。虽然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和记录。<sup>⑮</sup>

1966年,《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英译本由钱星海和 L. Carrington Goodrich 翻译、注释,作为《华裔学志丛书》之一,在美国洛杉矶出版,1989年又在德国再版。这时距本书首次发表的1924年已经六十五年了。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本书长盛不衰的学术生命力。

#### (四)

《华化考》一共有五种文本。

一、初稿: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分为三册,每册封面都有陈垣先生题字:“西域华化考史料”(上、中、下),并题“十二年十一月”。装订次序同全书篇章次序并不完全相符,原稿与其它有关《华化考》的史料合订在一起。这种装订法反映了作者写作的一个特点:他总是先将有关材料收集齐全,然后挑出第一手的、准备引用的材料。引用时常作许多删节(他一再强调,引文不可改,但可删),并把它们联缀成文。初稿的主要特点,如前所述,定本中的“华化”,初稿中一律作“汉化”。

二、油印稿:至目前为止,只知道仅存一部,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的“桑原文库”。线装上、下两册,每半页10行,行25字。卷末注有“十二年十月九日写于北京西安门外恒德厂”,由此可知本书完成的准确时间(1923年10月9日,作者当时尚未满四十三岁)和作者当时在北京的寓所。上册封面有作者题字:“桑原鹭藏先生指正/陈垣敬呈十二年十二月”。<sup>①</sup>这就是作者赠与桑原之本。桑原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全部藏书赠与京都大学,本稿也在其中。初稿中的“汉化”,在油印稿中绝大部分已改为“华化”。

三、排印本(正式发表本):1923年12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前四卷,后因该刊经费困难,久未续出。直至1927年12月,后四卷才发表于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二期。前后相隔竟达四年之久。排印本按当时刊物的规格,加了标点符号。

在前四卷发表之后,后四卷尚未发表之前,作者还应杂志之请,抽出全书部分内容,以《元基督教徒之华学》和《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的题目分别发表在《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1924年1月)和《小说月报》第七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1927年6月)上。

四、木刻本:1934年,作者将全书木刻出版,作为《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的第一种。木刻本对排印本作了若干补充修改,将标点符号改为断句。此本在台湾和大陆都有盗版。

五、1962年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拟将此书重新排印出版,作者对木刻本内容没有增删,只是对个别提法作了删改。如卷四文学篇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作者在引述《新乡谣》诗后所作解释,原作“第二截写资本主义之压迫”,改为“第二截写豪门势力之压迫”等。可能因为西北问题当时为政治上之敏感问题,出版未果。这次重排,采用作者1962年修订本,对个别标点符号作了修改。

2000年11月12日是陈垣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本书的出版,也是对他的很好纪念。

二〇〇〇年六月于北京

注释

①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 81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②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8 册第 2789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第 2 版。原文作“二十年前”,1959 年之二十年前为 1939 年,当时根本不可能谈此问题,“二十年前”应是“二十年代”之误。

③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第 12 至 13 页。

④《光明日报》1978 年 3 月 11 日报道。

⑤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载柴氏《史学丛考》第 436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⑥朱文长《北大与北大人》,《东方杂志》第 40 卷第 7 号,1944 年 1 月出版。

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 115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⑧同上书第 123 页。

⑨同上书第 115 页。

⑩原载《史林》第 9 卷 4 号,后收入《桑原鹭藏全集》第 2 卷,东京岩波书店 1963 年出版。有陈彬和中译本,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1 卷 6 期,1925 年 11 月 18 日出版。

⑪《陈垣来往书信集》第 227 至 228 页,233 页,参见本书卷七第一节。

⑫陈智超《陈垣先生与中研院史语所》及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 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学术之路》第 236 至 237 页,27 页,34 页,1998 年出版。

⑬《陈垣来往书信集》第 96 页,尹炎武函。

⑭同上书第 378 页。



⑮见陈智超《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45至24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⑯(日)竺沙雅章《陈垣与桑原鹭藏》，冯锦荣译，原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增订稿收入《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15至22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日文本载于《史林》第75卷4期。

# 目 录

《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	陈智超	1
卷一 绪论·····		1
一 元西域范围·····		1
二 元时西域文化状况·····		2
三 华化意义·····		3
四 西域人华化先导·····		4
卷二 儒学篇·····		8
一 西域人之儒学·····		8
二 基督教世家之儒学·····		18
三 回回教世家之儒学·····		25
四 佛教世家之儒学·····		28
五 摩尼教世家之儒学·····		30
卷三 佛老篇·····		36
一 西域词人之佛老·····		36
二 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		44
三 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		50
卷四 文学篇·····		55

一 西域之中国诗人·····	55
二 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	65
三 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	68
四 西域之中国文家·····	75
五 西域之中国曲家·····	80
卷五 美术篇·····	84
一 西域之中国书家·····	84
二 西域之中国画家·····	92
三 西域人之中国建筑·····	98
卷六 礼俗篇·····	102
一 西域人名氏效华俗·····	102
二 西域人丧葬效华俗·····	110
三 西域人祠祭效华俗·····	115
四 西域人居处效华俗·····	119
卷七 女学篇·····	126
一 西域妇女华化先导·····	126
二 西域妇女之华学·····	127
卷八 结论·····	131
一 总论元文化·····	131
二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华化·····	134
三 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136
附 征引书目·····	142
附 录·····	145
一 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1924年10月)	
(日)桑原鹭藏	145

---

二	致陈垣(1925年2月)	王国维	153
三	致王国维(1925年2月20日)	陈 垣	154
四	笔谈录(约1930年底至1931年七月间)		
		陈垣	陈寅恪 155
五	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1935年2月)	陈寅恪	157
六	致陈寅恪(1935年3月17日)	陈 垣	159

## 卷一 绪 论

### 一 元西域范围

西域之名,汉已有之,其范围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及政治势力而异。汉武以前,大抵自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今新疆省止,为西域。其后西方知识渐增,推而至葱岭以西,撒马儿干、今俄领土耳其斯坦,及印度之一部,更进而至波斯、大食、小亚细亚,及印度全部,亦称西域。元人著述中所谓西域,其范围亦极广漠,自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皆属焉。质言之,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曰西域者,以元时分所治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色,公牒上称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称西域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讥其重复讹舛,惜无他书是正。然借此可略知元时蒙古、色目之别,又可知元时所谓汉人、南人者,以金宋疆域为判,故契丹、女直、高丽称汉人。据《元史·选举志》,又以平定先后为判,故云南、四川,亦称汉人,而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中之江北、淮南诸路称南人。所谓江浙者,包含今闽、浙,江西含今



赣、粤，湖广含今湘、黔、桂，江北、淮南含今苏、皖、鄂。当时乡会试，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元史》列传编纂法，亦蒙古、色目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其有色目人因戴汉姓而误置于汉人、南人之列，如赵世延、郝天挺者，史臣失检也。赵翼《陔余丛考》十四、《廿二史劄记》二九谓“列传三十一卷已载元末死事诸臣余阙等，而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诸臣耶律楚材等编入，前后倒置，系分二次进呈，未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云，其说非也。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廿二史考异》九七所说为是。

本编所论，既限于元西域，故蒙古、契丹、女直诸族不与，亦以蒙古等文化幼稚，其同化华族不奇，若日本、高丽、琉球、安南诸邦，则又袭用华人文字制度已久，其华化亦不奇。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人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徐勣序《元人十种诗》曰：“天锡、易之，崛起穷发不毛之域，流商刻羽，含英咀华，骀駉闯作者之室，岂非奇渥温氏帝天下，而风会极一时之盛欤！”天锡者，萨都刺；易之者，迺贤也。是不可以不记。

## 二 元时西域文化状况

未言西域人华化之先，不可不知元时西域人文化之状况。元时西域文化，本由祆教而佛教，而景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浓郁者数百年，最后役于西辽，受大石林牙之汉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当元人未据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将汉族

文明炫耀于中亚大陆,耶律楚材《怀古百韵》有“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之句,注:“大石林牙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见《湛然居士集》十二。西辽五主,凡八十八年,皆有汉文年号,可知其在西域,必曾行使汉文。东欧人至今称中国为契丹,亦始于此际,犹之耶律楚材、丘处机等游记,统称西域为回纥,皆以其所与接触者举近概远也。西域人既杂受印度、犹太、波斯、希腊、亚刺伯诸国之文明,复曾睹中国文明之一线,其渴望身亲见之之情可想也。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文明文物,尽触于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兹编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 三 华 化 意 义

至于华化之意义,则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故忠义、孝友、政治、事功之属,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即美术、文学,为后天所获矣,而其文学为本国之文学,或其美术非中国之美术,亦只可谓之西域人之文学、西域人之美术,不得谓之西域人之中国文学、西域人之中国美术。又有西域人久居汉地,归化中国,然不能于汉族文化中有特别可纪,如《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县(今陕西榆林县)。师古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又《开元释教录》第二《优婆塞支谦传》:“支谦,大月支人,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名归化。”又《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下,师古曰:“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领者,本因汉

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凡此种种，可见西域人归化中国之事，古所恒有，特其人不能于中国文化有所表见，亦无足述。又有娴习华言，博综汉典，如《高僧传》中之西域翻经沙门，及明末清初之耶稣会士，可以谓之华学矣，然不得谓之华化。今特举元以前华化者数人为例。

#### 四 西域人华化先导

李彦昇 安世通 蒲寿晟

元以前西域人仕中国者多武人，以文事著者绝少。回教人著述有以米芾为回回人者，以尚无确据，姑置之，而论其有确据者。唐末有大食国人李彦昇，李彦昇纯汉姓名，睹其名即知其受华化已深矣。《文苑英华》三六四辩论文，有一篇曰《华心》，为陈黯作。华心者，人非华而心则华也。文曰：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帅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夷人独可用邪！”曰：帅荐才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则有华夷，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若卢绾、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华人乎！繇是观之，皆任其趣向耳。今彦昇来从海外，能以道析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作《华心》。

大梁连帅范阳公，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也。钧尝为岭南节度，岭南蕃坊多大食国人，故钧得识李彦昇而荐之。诏春司考其才，以进士第名显，是所试者为唐试进士法。彦昇之才，必通《五经》而明时务也，以唐试进士有时务策、有《五经》故。唐时太学，本许外夷子弟入学，然未闻西域子弟有以华学名，诸夷蕃将尉迟胜、哥舒翰等之子弟，亦未闻有以华学名。若尉迟枢之能为《南楚新闻》，尉迟偓之能为《中朝故事》，已绝无仅有。故卢钧之举李彦昇，时人以为奇，而陈黯乃为文释之也。

宋末有安世通，安世通疑为安息人。以安息人而入青城山学道，不可谓之不奇也。《宋史·隐逸传》有《安世通传》，曰“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谋策，为武官，数以言干当路，不用，遂自沈于酒而终。世通亦隐居青城山中不出。吴曦反，乃献书于成都帅杨辅曰：‘世通在山中，忽闻关外之变，不觉大恸。世通虽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尝发以入道之门。窃以为公初得曦檄，即当聚官属军民，兴仗义之师，以顺讨逆，而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徒为妇人女子之悲，所谓停囚长智也。区区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污面戴天，同为叛民也。’辅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劝以举义，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辅不能决，遂东如江陵，请吴玠举兵讨曦。未几曦败，玠使蜀荐士，以世通为首”云。

吴曦之叛，在开禧二年。安世通不肯附曦，而为忠义愤发之论，实难能可贵。然此不得谓之华化，今所取者，取其能以西人而入道，纯全中国化也。何以疑安世通为安息国人？汉时译经者有安世高，名安清，安息国王太子，西方宾旅，呼为安

侯，见《开元释教录》卷一。以国为姓，自昔然也。支谦为月支国人，竺法兰为中天竺国人，安世与安息音相近，安世通其一例欤。“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二语出《列子·力命篇》。安世通盖深于庄、列之旨者矣。

宋末又有蒲寿晟。寿晟西域人，为泉州市舶使蒲寿庚之兄。工诗，知梅州，有惠政。《光绪嘉应州志》十九引旧志云：“蒲寿晟，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见曾井遗泽在民，遣人还籍取家资，建石亭其上，日汲井水二瓶，置诸公堂，欲常目之而踵其武也。州进士杨圭题其梁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今祀名宦祠。”

曾井者，南汉时程乡令曾芳所遗之井。寿晟景仰流风，思则效之，而州人深许其能媲美也。循吏可贵，然亦不得谓之华化。今所取者，取其能以西域人而工中国之诗，纯华化也。寿晟有《心泉学诗稿》，已佚，清人在《永乐大典》中辑为六卷，余家藏有写本，《四库提要》别集类十八称“其诗冲澹闲远，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今《彙村丛书》有《心泉诗余》一卷，即《四库全书》本附于《心泉学诗稿》末者。明人著述，对寿晟兄弟多致微词，《弘治八闽通志》八六云：

宋季益广二王从福州航海幸泉州，守臣蒲寿庚拒城不纳。寿庚武人，其计皆兄寿晟所筹画。部署既定，寿晟着野服，隐法石山中，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忽二书生踵门求谒，闾人以处士昼寝，弗为白，遂各赋诗一首。其诗曰：“梅花落地点苍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蛱蝶不知春去也，双双飞过粉墙来。”“剑戟纷纷扶主日，山林寂寞



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书毕，不著姓名而去。

曹学佺《泉州府志胜》卷五、《乾隆福建通志》六六、《泉州府志》七五均有同样记载。其词旨虽讥寿晟，然寿晟之能诗，反于此可证，使寿晟而不知诗，虽刺之何益。《闽书》五二及《心史》，记寿晟兄弟事颇详；《日知录》十三、《鮚埼亭外集》三三，均有贬寿晟语。然吾据丘葵《钓矶诗集》，将为寿晟讼冤。丘葵者，宋末泉州人，吕大圭弟子。大圭死于蒲寿庚之难，而葵《钓矶诗集》卷三有与寿晟倡和诗，卷四复有《挽心泉蒲处士》诗二首，云：

把钓秋风辱赠诗，伤心无路送灵輶。欲书谏语应难尽，独倚寒梅照石漪。

欲持鸡絮列坟前，俗了青霞顶上仙。只合化为溪畔鹭，乘风飞去弄清泉。

是葵对寿晟始终无异词，所谓“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者，特《春秋》责备贤者之意耳。近日本桑原骥藏氏考寿庚事极详尽，见《史学杂志》廿六、七编。《四库提要》谓寿晟之名不见于史，不知《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三年二月辛酉条下，大书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也。安世通为青城山道人，蒲寿成为法石山处士，南宋两西域人，足开有元一代西域人华化之先声矣。西域之范围明，华化之意义定，可以进言元西域人之如何华化。

## 卷二 儒 学 篇

### 一 西域人之儒学

高智耀	廉希宪	不忽木
巉巉(庆童)	沙班	泰不华
回回	伯颜师圣	欣都
也速答儿赤	丁希元	家铉翁

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能知尊孔子，用儒生，卒以文致太平，西域诸儒，实与有力。其最先以儒术说当世者为高智耀，《辍耕录》卷二高学士之条云：“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奏陈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学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戊戌为元太宗十年。据《元史·太宗纪》及《选举志》，太宗九年八月下诏考试诸路儒士。盖诏下于九年八月，而选试于十年戊戌也。《元史·高智耀传》：“智耀世仕夏国，登本国进士第。夏亡，隐贺兰山。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

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是智耀为儒者尽力之第一次。

“宪宗即位，智耀入见，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占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家何如巫医？’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是智耀为儒者尽力之第二次。

“世祖即位召见，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覆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智耀奏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帝然之，即命循行郡县区别之，得数千人。贵臣或言其诡滥，帝诘之，对曰：‘土譬则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浅深，谓之非士亦不可。’帝悦。”是智耀为儒者尽力之第三次。

智耀姓高，非汉姓。其孙纳麟，《元史》一四二别有传，不戴高姓也。五代而后，河西陷西夏者二百年，诸羌杂处，元人谓之唐兀氏，为色目之一种。《元史》卷一一八至一四五，为蒙古、色目人列传，卷一四六至一八八，为汉人、南人列传。高智耀传在卷一二五，固明示其为色目而非汉人也。智耀虽色目人，然西夏夙习汉化，庙祀孔子，智耀之尊儒，不足为异。王恽《秋涧集》八六有弹高智耀状，言：“智耀事佛敬僧，乃其所乐，迹其心行，一有发僧耳。”是智耀固儒而释者，不纯为儒也。

西域人纯为儒者有廉希宪。希宪，畏吾儿氏，史称其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岁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宪为宣抚使。希宪日从名儒若许

衡、姚枢辈，咨访治道，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衡之应召，自此始也，而希宪实为举主。国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著籍为儒。己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希宪引儒生百余，拜伏军门，言：“今王师渡江，凡军中俘获士人，宜官购遣还，以广异恩。”世祖纳之，还者五百余人。时方尊礼国师，帝命希宪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希宪事迹，详《元史》一二六本传、《元名臣事略》卷七、及元明善所为希宪神道碑（见《元文类》六五）。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以希宪为第一。希宪系出畏吾儿，去中原益远，较高智耀之系出唐兀，其沾被华化倍难。然希宪笃信好学，过于智耀，斯为可贵。

希宪而后有不忽木。不忽木世为康里部大人，《元史》廿四《仁宗纪》谓不忽木为蒙古人者，以其全部曾被虏于蒙古，给事东宫也。不忽木师事太子赞善王恂，恂从北征，乃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衡亟称之，谓必大用于时，名之曰时用，字之曰用臣。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兴学疏，凡千言，力言儒学之要，规画学校制度及考试之法甚备。文详《元史》一三〇本传。赵孟頫为《文贞康里公碑》（见《松雪斋集》卷七），言：“上每与公论古今成败之理，谓公曰：‘曩与许仲平论治，仲平不及汝远甚。先许仲平有隐于朕耶？抑汝之贤过于师耶？’”可见世祖目中之不忽木，固超过许衡也。康里在元时，为术赤所封地，在今日为南俄，其地去中原又比畏吾儿为远，而其人能崇儒重道若此，是真可惊异者矣。

不忽木之子为纛纛。纛纛幼肄业国学，博通群籍，其正心

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既以重望居高位，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元史》一四三本传有爱儒答问一则，备录如下：达官有怙势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爱之？”峨峨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今秘书所藏裕宗仿书，当时御笔，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尝暮召我先人坐寝榻下，陈说《四书》及古史治乱，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从许仲平学，正欲卿以嘉言人告朕耳。卿益加懃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爱儒，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汝欲乱而家，吾弗能御，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儒者或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贮藏有过人者，何可易视也。”达官色惭。峨峨之丰仪可见矣。

峨峨之后，康里氏之崇儒术者有庆童。《两浙金石志》十八、《越中金石记》卷十有绍兴路儒学教授朱鐔所为《御史大夫康里公勉励学校记》，碑阴题名，多西域人之官斯土者，凡此皆足为西域人热心儒学之一证。

然此皆西域人之握政权者耳，有离却政权而特注意于社会教育者，沙班也。沙班色目人，居杭州，字子中，举进士，授建安经历。吴克恭《寅夫集》有《送沙子中经历建宁》诗。沙班既致仕，乃热心兴学，刘基《诚意伯集》卷四有《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云：“至正十一年春，沙班子中来，言曰：‘杭于江南，视他郡为大，民多而儒少，岂教育之未至乎！吾尝得隙地于庆远，愿筑室以为义学，招子弟以教。’余闻而叹曰：‘方今天下郡县无不有学，名山古迹，又有书院，咸设学官。杭之城郡县学及书院凡四处，生徒蚁集，省宪临焉，又何俟于子之室乎！’子

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为予之学，犹官之学欤？非也。予请为子言学。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学成而以措诸用，故师行而弟子法之。今之学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廩粟之外，无他用心，其亦异乎予之所欲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见之矣，而有志焉。吾固将以尽吾心，终吾年，纵不能行于今，庶几或垂于后。’予闻而壮之，书其言以为序。”沙班之志，盖不满意于官学之专为利禄，而欲独创一正谊明道之私学，以行其素志，中国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

宋、元以来，中国儒学史上，有所谓理学或称道学之一派，吾不知其称名当否，然其实确与汉、唐以来之儒学不同，盖儒学中之杂有道家及禅学之成分者也。元儒学既有此一派，吾言西域人之儒学，不可不于此求之，则《宋元学案》有二人焉，曰赵世延，曰秦不华。世延，雍古部人，基督教世家，为桀庵同调，列卷九五萧同诸儒学案中，吾以其晚年好道，于《佛老篇》论之，今先论秦不华。《元史》-四三本传：“秦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于台。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至治元年，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先是廷试第一皆国人，秦不华既以第一及第，故或称为蒙古人，其实伯牙吾台，是色目之一，非蒙古。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秦不华列色目表，不列蒙古表，是也。至正元年，秦不华除绍兴路总管，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越俗大化，礼让者中国人所以化西北强悍之族，而秦不华乃以化越人，奇也。秦不华为本心门人，《宋元学案》列卷八一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元史》一九〇《周仁荣传》称仁荣所教弟

子多为名人,而泰不华实为进士第一,其引重可知也。泰不华虽书生,然膂力过人,犹有西北方气概。当其守台州也,方国珍降而复叛,泰不华乘潮而前,搏敌船,射死五人,敌跃入船,复斫死二人。敌举槳来刺,辄斫折之,敌群至,欲抱持过船,泰不华瞋目叱之,脱起夺敌刀,又杀二人。敌攒槳刺之,中颈死,植立不仆。年四十九,时至正十二年壬辰三月也。刘基为赋吊之,见《诚意伯集》卷九。杨维禎《挽达兼善诗·注》,则谓其辛卯八月歿于南洋,传闻异词也。延祐庚申,泰不华江浙乡试第一,年十七,至正壬辰死节,年四十九,正符,辛卯则四十八耳,应以史为正。史又称:“泰不华尚气节,不随俗浮沉。太平为台臣劾去相位,泰不华独餞送都门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华曰:‘上为知己死,宁畏祸耶!’后虽为时相排斥,人莫不韪之。”曹安《澜言长语》卷下有泰不华佚事一则,亦足见其清节。云:元达不华为台州守,有所廉察。夜宿村家,闻邻妇有娣姒夜绩者,娣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浊者吾与尔饮之。”姒如其言,起而注清者于他器,且曰:“此达元帅也,吾等不得尝矣。”娣曰:“到底清邪!”遂笑而罢。不华闻之,未曙即去。其清节感人若此。惟泰不华著述,今无传者,《元诗选·顾北集》仅录其诗,《元史》本传只言事功,不言学业,《宋元学案》更疏略,仅缀拾本传数语,无可考见。余在《滋溪文稿》二四发见苏天爵有《与达兼善郎中书》,述《皇极经世书》之授受源流颇详,知泰不华曾有志于邵子之学。时泰不华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距死节之年,尚十余岁,未知其后造詣何如也。书云:

君子之仕,固欲行其志也,然事之齟齬者,十常八九,

欲舍而去之，不知者以为忘斯世矣。阁下以进士得官二十余年，始以文字为执业，人则曰儒者也，及官风纪，屡行而屡止，孰知其志之所有乎。向谕印祝泌《皇极经世说》，谨装潢纳上。某尝学于临川吴先生（澄），闻其言曰：“邵康节天人之学也，虽其子弗克传焉。蜀人张行成盖能得其仿佛，行成既没，其学又弗传矣。祝泌生于宋季，所学者风角鸟占之术，特假皇极之名张大之耳。抚州人有传其术者，睹物即知休咎，尝欲以学授予，予弗从而止。”某又尝学于太史齐公（履谦），每见公读邵子书不去手。晚岁又释外篇，令某传录，其言曰：“皇极之名见于《洪范》，皇极之数，始于《经世书》，数非极也，特寓其数于极耳。《经世书》有内外篇，内篇则因极而明数，外篇则由数以会极，某尝欲集诸家释外篇者为一书，顾未能也。”又闻国初李征君俊民、李翰林治皆能通邵子之书，或言征君得于河南隐士荆先生，而翰林不知得于何人也。世庙在潜邸时，尝召征君问之，征君既亡，复召翰林问之。以某观之，二公不过能通其数耳，而康节之学，盖未易言也。故曰欲知吾之学者，当于林下相从二十年，方可学也。因阁下求祝泌之书，偶言及此。

祝泌之书，今传者有《观物篇解》五卷，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一卷，清《四库》著录子部术数类。朱彝尊《经义考》又有泌所撰《皇极经世铃》十二卷。未知秦不华所求及苏天爵所与者何种，然天爵此书，实可补《宋元学案》之阙也。

西域儒者，康希宪、不忽木，均曾从许衡游，而《宋元学案》皆无传。峨峨兄回回，字子渊，《元史》附《峨峨传》，称其“敦默



寡言，嗜学能文。与弟峨峨皆为时之名臣，世号双璧”。而不言其学术。余在《吴文正集》廿二发见有《时斋记》，盖澄为回回作，而后知回回曾从澄游，好读《易》，不止能文善书已也。记云：“康里子渊卜筑于国子监之西，而名其斋居之室曰时，大矣哉时之义乎！昔先文贞公（不忽木）为国名臣，从贤师知圣学，其行于身，施于家，发于事业，固已得中得宜而当其可矣。子渊淳正明敏，益之以平日家庭之所闻，众人纷纷竞进，而退然闲处，若无意斯世者。然苟所当辞，虽近而怯就，苟所当受，虽远而勇去。所谓中，所谓宜，所谓可，盖亦无忝于其先公，此所以名其斋室之意也。虽然，时之为时，莫备于《易》，先儒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象，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时之百千万变无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一而已。子渊好读《易》，予是以云。”回回不见《草庐学案》中，此文亦可补其阙。

《元史·儒学传》尚有一西域儒学大师，《宋元学案》应为立传而遗之者，曰伯颜师圣。伯颜学无师承，崛起乡里，讲求实用，自成一家。譬之清儒，于颜元为近，而魄力过之，所谓平民学者也。《宋元学案》中应补伯颜学案。惜乎其著述毁于兵燹，徒令人想望低徊而已，然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传录如下：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刺鲁氏，世居开州濮阳县。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蚤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因命以颜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辞曰：“余不能为尔师，群经

有朱子说具在，归而求之可也。”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至于异端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而贼兵大至，伯颜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贼遇，贼知伯颜名士，生劫之，不屈，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有司上其事，谥文节。太常谥议曰：“以城守论之，伯颜无城守之责；以风纪论之，伯颜无在官之责。以平生有用之学，成临义不夺之节，乃古之所谓君子人者。”时以为确论。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皆毁于兵。

凡此皆可称为西域理学名儒也。

当科举之初兴也，蒙古、色目人即有应试者，可知其读书实在未兴科举以前。延祐二年，举行第一次进士，胡长孺有《送欣都、朱、卢、饶诸生会试京师诗序》，见《水东日记》十二，其文曰：“皇帝龙飞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诏天下郡县，兴贤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书省试上钱唐，凡一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寓于书，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欣都举首，江浙闽二十八人，朱嶠第九，卢可继第二十一，江西行省试上南昌，饶扑第七。四人者尝授经永康胡长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长孺系以诗而叙之。”

揭傒斯《文安公集》卷九有《送也速答儿赤序》。也速答儿赤，亦事科举者。其文曰：“至元初，从军襄樊有抄儿赤者，合祿鲁人也，以功为千夫长。抄儿赤传秃鲁罕，秃鲁罕传秃林台，三世皆戍建昌，而三世皆贤。秃林之子也速答儿赤，从郡人李宗哲学进士业有声。今年夏，从其妇翁增城左君至京师，拜余程文宪公故宅，貌粹而气和，才清而志锐，他日必为明进士。然君子之学，非所以为富贵利达之谋也，所以进其德而达其才者也，故其学不止于为进士。子归第务学焉，勿以科举废兴为去就。”

郑元祐《侨吴集》卷八有《送丁希元序》，曰：“淮西公告老于朝，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学士。于是公乘传入觐，而以其甥丁希元从。公与希元皆斡端（于阗）国人，斡端与国朝地若犬牙错列，去江浙二万余里。希元初侍其亲，读书江浙间，稽经质疑，问学大备，使对策大廷，其取必右选，若探囊发所素有。会举选暂罢，人惜其学成而时违，而不知其蕴用以俟时也。”

由此可见色目人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六有《送家铉翁序》，言色目人初入仕，有司事不素讲，莫谐士论，犹可见西域人改从华俗之迹。曰：“五方之人，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性善则一。先皇帝武定内难，文致太平，举中原百年之旷典，天下之士，雷动响应，殊方异俗，释櫜掉甲，理冠带，习俎豆，来游来歌，莫不洗涤，思奉明诏，立跻臬仕。然有司事不素讲，学识浅陋，莫谐士论。家君铉翁畏吾儿氏，其先居北庭，脱脱太师宁国公之裔孙。幼颖悟，自命不凡，脱去纨绔习，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应江浙

进士举及格，闾宪闻其才而辟之。泰定三年丙寅，余自暨阳出应容山县聘，授生徒于学。君至县，一见握手如旧交，相与道家世出处本末，慨然久之。君貌巉巉，美髯如戟，神采逼人，必能晓畅官事，年富气锐，功业未可量。余老，惜不及见之。”

家铉翁为畏吾儿氏，与宋使臣被留于元之家铉翁，号则堂，《元文类》三八录其《中州诗集跋》者，另一人。陆文圭称其美髯如戟，神采逼人，想犹是色目人习气。其相见即道家世出处本末，想犹念念其为色目人，而以能修孔氏之业自慰也。此亦可称西域人之儒学也。

## 二 基督教世家之儒学

马祖常 阔里吉思

上章所举，为普通西域人之儒学，其人本身或先世信仰何教，未能确指也。今有可以确证其人本身或先世信仰他教，而改奉儒教或服膺儒教者，请先论基督教。

元代版图最广，括有中亚细亚全部，故当时回教各国，及基督教、摩尼教流行之地多隶之。种人来往频繁，散居中国内地者众，久而信仰改宗之事遂不可掩。其最著者为基督教世家马祖常也。

元时典籍无基督教之名，其称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各派也。说详拙著《元也里可温教考》。顾何以知马祖常为也里可温世家，吾友张君星娘近译注《马可李罗游记》，举出三证，定马祖常为基督教：一、凡《元史》中雍古部人传，每多基督教徒之名，祖常为雍古部人。二、马祖常所作其曾祖月合乃神道碑，叙述家世人名，汉式名二十五，蒙古名一，基督教徒名十有

四。三、月合乃祖名把造马野礼属,此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中尤多见之。说详《马可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附注。余于张君所举三证之外,发见更有力之证据五:

一、杨维禎《西湖竹枝集·马祖常小传》云:“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仪可温氏。”浚仪者开封,可温者,也里可温之省文或脱文无疑也。

二、黄潛《金华文集》卷四三《马氏世谱》,祖常有族祖名奥刺罕,杨子县达鲁花赤。据《至顺镇江志》卷十六:“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刺憨(《康熙志》误作悠),也里可温人,元贞二年六月至。”其与奥刺罕同为一人,先后为杨子、丹徒两县达鲁花赤,无疑也。奥刺罕为也里可温,祖常当然为也里可温。

三、《马氏世谱》,祖常又有从诸父名世德,以国子生擢进士第,由监察御史迁中书检校官。据余阙《青阳集》卷三《合肥修城记》云:“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人。由进士第历官中书检校。”即此人也。世德为也里可温,祖常当然为也里可温。

四、元也里可温,大概包涵罗马、希腊、聂思脱里各派。马祖常之先究属何派,据《马氏世谱》开宗明义第一句即云:“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禄采思。”则马祖常之先,也里可温中之聂思脱里派,而又尝掌高等神职者也。

五、更有一事,富有宗教意味。元好问《遗山集》二十七,有《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马君即祖常之高祖。碑云:“君讳庆祥,字瑞宁,姓马氏,以小字习里吉斯行,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金兵略地陕西,尽室迁辽东,因家焉。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敕以所见者物

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与上所见者合。上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凡种人之在臧获者，贯为平民，赐钱币纵遣之。君之祖讳迭木儿越哥，父把骚马也里黠，又迁静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金史》一二四《马庆祥传》即采此。此文极有宗教意味。当未解释此文之先，余有一声明，吾国学者，对于外来宗教，每辨别不清，以甲作乙，如顾炎武之以摩尼为回教（《日知录》廿九），杭世骏之以回教为景教（《道古堂集》廿五）是也。元好问生金、元间，亦何能逃此例。曰“出于花门贵族”，即误以聂思脱里为回鹘，不若黄潘《马氏世谱》之明了矣。回鹘自唐以来崇奉摩尼，摩尼礼拜之所恒有像设，今曰“尊像不可得，惟回鹘梵呗之所有之”，则又以聂思脱里为摩尼矣。然有像不独摩尼，聂思脱里亦有之，《景教碑》述贞观诏，所谓“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者是也。金太宗所遇，与《新约·使徒行传》九章三节保罗所遇相类，固明明基督教影响也。好问曾续《夷坚志》，故于此等神话，靡靡道之。以此而言，马祖常之为基督教世家，毫无疑义。

据《马氏世谱》，和祿采思于辽道宗咸雍间（西一〇六五至一〇七四）来中国，道宗官之，不就，遂家临洮。二世始仕辽为马步军指挥使。三世当宣、政之季，被金兵掳至辽东，久之因献像事，被释放，迁静州之天山。四世即习札吉思马庆祥，始仕金为凤翔兵马判官，迁浚都，遂为汴人。五世月合乃，仕元为礼部尚书，是为祖常之曾祖。二世、四世均官名有马，故《马氏世谱》及《元史·月乃合（应作合乃）传》谓马氏始于二世，而《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及苏天爵《马文贞公墓志》（《滋溪文稿》卷九），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马祖常之家世既明，可进言马祖常之儒学。马祖常非出自中国，本人并不以为讳，且津津乐道之，故其为《马公神道碑》，则云：“我曾祖尚书世非出于中国，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俾其子孙百年之间，革其旧俗。”其为铭又有云：“懿矣我祖，百年于兹，衣冠之传，实为启之。世多王公，亦多华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则其厌恶旧俗倾慕华俗之情，概可见矣。《石田集》卷一又有《饮酒诗》六首，其第五首云：

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闻鼓鼙。  
金室符河表，我祖先群黎，诗书百年泽，濡翼岂梁鹑。尝  
观汉建国，再世有日碑，后来兴唐臣，胤裔多羌氏。《春  
秋》圣人法，诸侯乱冠笄，夷礼即夷之，毫发各有稽。吾生  
桡陶化，孔阶力攀跻，敷文佐时运，烂烂应壁奎。

以日碑、羌氏自拟，以夷狄进于中国自慰，以得受孔道陶化为幸，以努力攀跻孔阶自矢，磊落光明，莫有伦比。而朋辈中之称道之者，亦辄不忘其所自，而竭力揄扬之。文矩《于方集·送马伯庸御史奉使关陇》起四句云“圣朝启文运，同轨来无方，夫君起天关，崛起千仞翔”，明指其非出自中国也。许有壬《至正集》四六《马文贞公神道碑》亦云“公先世已事华学，至公始大以肆”，又云“部族有儒，文贞伊始”，又曰“后承聿修，讲学诸夏”。王守诚为《石田集序》，亦云“公系出西裔，斤斤于华学，于部族，于诸夏，而不能忘其非中国人”，深赞其能用夏变夷也。

惟马氏既世奉基督，至何时始舍基督而归儒，在祖常本身乎？抑祖常之先已有开其端者乎？是亦吾人所亟欲闻者也。

据祖常所自述,及许有壬所称道,马氏之儒学,肇自祖常曾祖月合乃。复据袁桷所著祖常父《漳州路同知马君神道碑》(《清容集》二六),则马氏之儒学,成于祖常父马润,至祖常乃大以肆也。碑云:“礼部尚书讳月合,植德秉志,赍土人之为孥者,后皆为达官,而子孙更业儒术,卒致光显。礼部子讳世昌,倾费粟结雋彦,家日困落,子孙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讳润,以文墨入官,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广弟子员以食。光久为用武地,司马丞相生于光,公岁率诸生以祠,民始知为儒以自重。”

又据苏天爵所著祖常弟祖谦墓碣铭(《滋溪文稿》十九):“祖谦母杨氏,生母李氏。”是祖谦为祖常异母弟,而马润实有二妻也。祖常亦有二妻,苏天爵《马文贞公墓志》云“公娶索氏,次怯烈氏”。二妻为基督教人所大戒,祀鬼亦为基督教律所不容,而马润既有二妻,复率诸生祀司马光之鬼,其悍然不守基督教律可知也。及至祖常,对于祠祭,更随俗浮沉而无所忌,故《石田集》有《陪可用中议祠星于天宝宫诗》,其他类此者不一而足,盖已荡尽基督教之藩篱矣。袁桷《马润碑》三致意于马氏子孙之用儒自振,必有所见而云然也。《马氏世谱》叙和祿采思至祖常之子凡九世,祖常从诸父中尚有基督教徒之名,如岳难、雅古、保六赐之属,至祖常同怀七人,则无一基督教徒名矣。其从昆弟中尚有一基督教徒之名,即苏天爵《石田集序》所称“公既没,其从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诗文若干篇”之易朔是也。由此种种精密观察,尚可见祖常一家背基督归儒之经过。其曾祖虽好儒术,尚未至于背基督,其父行则不然,其季父名节者,且入王屋山为道士(详《佛老篇》),是背基督当自其父行始,即《马氏世谱》之七世也。八世至祖常,且特为儒张



目矣。《石田集》卷四有《蜀道士归儒诗》，云：

青城羽客烧丹罢，要近东家问《六经》。却笑山阴痴道士，白鹅闲觅写《黄庭》。

由此观之，则其季父之为道士，亦祖常所不悦。所谓士各有志，不能强同。马氏一家，老辈皆奉基督，后生则为道为儒，分道扬镳，可谓极信仰之自由者矣。

马氏而外，基督徒之尊崇儒术者，有高唐王阔里吉思。阔里吉思本身为基督徒，与马润、马祖常之世代为基督徒者不同。世代为基督徒者其信仰属于遗传，吾谥之曰“世袭信仰”，世袭信仰非出于自由，唯自由信仰乃真信仰。阔里吉思之为基督徒，属于自由信仰者也。然在汉籍中实无左证。据近人之考察，则阔里吉思，即《马可李罗游记》之佐治王，其所据者为见存罗马之西纪一三〇五年（元大德九年）一月八日主教蒙哥未诺在燕京所发之《第一书》，其所述之信教佐治王地位事迹及卒年遗孤等，均与驸马高唐王之阔里吉思相合。驻华东正教拍雷狄斯主教以《元史》本传有“尚忽答的迷失公主，继尚爱牙失里公主”之语，疑基督徒同时有二妻，为不可解。张君星烺据《元文类》廿三卷复著《驸马高唐忠献王碑》，称“忠献王前尚皇姊忽答的美实，继尚皇女爱失里”，知前尚之皇姊已死，后乃继尚皇女，并非同时有二妻。《元史·阔里吉思传》以阎复碑及刘敏中撰《驸马赵王先德碑》为蓝本，碑见元刻本《中庵集》卷四（《四库》本缺载）。赵王即阔里吉思子术安。碑称：“忠献先尚主忽答的迷失，继尚爱牙失里。一子术安，即赵王，继出也。”《元史》删一“先”字，遂启后人疑窦。然吾据阎复碑

所述,阔里吉思之祖武毅王,则实有姬侍。曰:“初武毅未有子,公主为进姬侍,以广嗣续,鞠育之恩,不啻己出。”嗣续云云,正昔人多妻之唯一口实。然则阔里吉思之祖,尚非基督教徒。近人因阔里吉思为汪古部长(即雍古),《元史》本传载其兄弟姊妹又皆用基督教徒之名,其父爱不花,伯父君不花,又皆热心之基督徒,遂断定为即《马可孛罗游记》及蒙哥未诺《第一书》之佐治王,宜可信也。此节既明,则可以言阔里吉思之儒学。

据蒙哥未诺《第一书》,阔里吉思初信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遇蒙哥未诺,始改信罗马派,而其兄弟仍守聂思脱里派也。然阎复碑云:“忠献王生长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长,而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兴建庙学,裒集经史,筑万卷堂于私第,讲明义理,阴阳术数,靡不经意。”《元史》本传则据刘敏中碑稍易其词,云:“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是阔里吉思既信基督,又好儒术也。蒙哥未诺书称其曾于治所建圣堂,未识与阎复碑所谓“兴建庙学”者是一是二。吾人于绝不相谋之中西记述,披摭而互勘之,偶有异同,其乐正无极也。阎复碑又称:“阔里吉思弟阿里八剌尚宗王完泽女奴伦公主,耽嗜儒术。”予近在《顺治吉安府志》二五《儒行传》又发见阔里吉思尝从吉人吴鄂问《易》,足见史称其“日与诸儒讨论经史”一语,不为虚誉。志云:“吴鄂,永新人。宋末兵乱,避仇转徙山西,改姓名张应珍。注《周易》,宗程、朱而不为苟同。元骠马都尉高唐郡王阔里吉思尝从之质疑焉,为刻其书于平阳路,且序其里居为详。”今《莱竹堂》、《千顷堂书目》均有张应珍《周易注》十卷,《经义考》四四题为吴鄂,疑即阔里吉思刻于平阳路者。

鄂先改名张应珍,仕元为秘书少监,大德九年复更姓名吴鄂,见《元秘书监志》九。阔里吉思从鄂质疑时,鄂固名张应珍也。阔里吉思之好儒学,又多一证。

### 三 回回教世家之儒学

贍思丁

忽辛

贍思(溥博)

勘实戴

回回教世家中有地位与阔里吉思相若,而崇儒好学,又复相类者,为咸阳王赛典赤贍思丁。《元史》一二五本传称:“贍思丁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粳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

贍思丁之为回回教世家,《元史》已证明,不若阔里吉思、马祖常等之史无明文,必须旁搜佐证。别庵伯尔者,犹言天使,盖指摩诃末。刘郁《西使记》所谓“师名癖颜八儿,经文甚多,皆癖颜八儿所作”是也(《秋涧文集》九五)。阔里吉思封高唐王,贍思丁封咸阳王。阔里吉思兴建庙学,哀集经史,筑万卷堂,贍思丁创建孔子庙,购经史,授学田,二人所为,抑何类也。吾甚不解贍思丁以摩诃末嫡裔,而尊崇孔子若是,史有溢词,抑果实录也?然云南孔子庙,确为贍思丁所创建,贍思丁卒后,庙田曾为僧徒所夺,其子忽辛力争之,事见《忽辛传》(同卷),称:“忽辛,大德九年改云南行省右丞。先是,贍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

以供祭祀教养。贍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其父子媲美如此，此云南人士所亟应纪念者。今云南回教徒甚众，人皆知为贍思丁所遗，孰知云南孔教势力之伸张，亦不出于孔子之徒，而为别庵伯尔之裔贍思丁父子所引进也，此孔教徒所不及料者也。

尤可异者，《元史·儒学传》有阿剌伯人贍思，为元好问再传弟子。以汉文著书十余种，并文集三十卷，清初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时，诸书尚存，真元朝儒学之特色也。贍思系出大食，其为回回教世家不必问。今节录其本传如下：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国既内附，大父鲁坤，乃家真定。父幹直，始从儒先生问学。贍思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延祐初，诏以科第取士，有劝其就试者，贍思笑而不应。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时倒剌沙柄国，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独不往见，倒剌沙屡使人招致之，即以养亲辞归。天历三年，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赐对奎章阁，文宗问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进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称善。诏预修《经世大典》，以论议不合，求去。后至元二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条，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威里有执政陕西行省者，恣为非道，贍思发其罪而按之，辄弃职夜遁。三年，除签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以浙右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谓道人、道民、行童者，类皆湮常伦，隐徭役，使民力

日耗，契勘嘉兴一路，为数已二千七百，乃建议请勒归本族，俾供王赋，庶以少宽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为令。贍思历官台宪，平反大辟之狱，先后甚众，然未尝故出人罪以市私恩。著《审听要诀》。至正十年，召为秘书少监，议治河事，皆辞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谥曰文孝。贍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家贫，饘粥或不继。其考订经传，常自乐也。

贍思著述，今存者有《河防通议》二卷（守山阁本），辑诸《永乐大典》。其所著《老庄精旨》、《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等，皆不可得见，徒令人想望其瑰异而已。

回回教中著名儒者，尚有丁鹤年。鹤年通《诗》《书》《礼》三经，以其晚而逃禅，详《佛老篇》。名不甚著，而通《诗毛氏笺》，折衷以朱、吕之传，发为文辞，其光烨然者，有溥博。博字子渊，西域阿鲁浑人，回回儒者也。见宋濂《銮坡集》卷七《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又有勛实戴者，字士希，河南伊川鸣皋镇回回炮手军总管。以家财创立书院，十年始就。其子慕颜铁木，复建稽古阁，贮书万卷。延祐间诣京师，因集贤学士陈顥以闻，奉敕赐名伊川书院，令翰林直学士薛友谅撰文，集贤学士赵孟頫书之。此亦回回人之好儒学者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九，有《敕赐伊川书院碑跋》。

## 四 佛教世家之儒学

### 阿鲁浑萨理

元时佛教世家，无过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父为释教总统，身受业于国师八思马。以此世袭信仰，其思想宜不易动摇也，而抑知事实上不然。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之书耳，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爱慕华风者。今将赵孟頫所为《赵国公全公神道碑铭》（《松雪斋集》卷七）节录如下。《元史》一三〇《阿鲁浑萨理传》即从此出者也。碑云：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诸国，回鹘最强，最先附。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至元、大德间，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战之功，而道包儒释，学际天人，寄天子之腹心者，惟赵国文定公而已。公讳阿鲁浑萨理，回鹘北庭人，今所谓畏吾儿也。以父字为全氏。祖讳阿台萨理，父讳乞台萨理，早受浮屠法于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圆通辩悟，当时咸推让之。生公兄弟三人，公从国师八思马学浮屠法，不数月，尽通其书，旁达诸国及汉语。世祖知其材，俾习汉文书。顷之，遂通诸经史百家，若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靡不精诣。会国师西还，携与俱。岁余乞归省，师送之曰：“以汝之学，非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圣君。”相泣而别。比至阙，师已上书荐之裕宗，得召入宿卫，日以笔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来见，自言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数辈与语，莫能解。有脱烈者，言公可使，立召与语，僧乃屈谢不如，上大

悦。公明时务，识大体，初为世祖所知，即劝以治天下必用儒术，江南诸老臣及山林藪泽有道艺之士，皆宜招纳，以备选录。于是置集贤院，下求贤之诏，遣使天下。天下闻风而起，至者悉命公馆之，礼意周洽，皆喜过望。其有不称旨者，亦请厚赉而遣之，以劝来者。而集贤长貳，极一时名流，尽公所荐用。又请置国子监学官，增博士弟子员，优其廩既，学者益众。

本篇最可注意者，为阿鲁浑萨理之学，先释而后儒。元时隆礼国师，过于孔子，苟无二三西域人之服膺孔学者揶揄其间，释氏之徒，且欲以其道易天下，借兵威之所及，非尽变中国为佛教国不止。中国儒者，其得国主之信用，远不逮西域儒者，是故高智耀之人见宪宗也，力言儒者之道，帝曰：“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不忽木之与世祖论道也，世祖曰：“曩与许仲平（衡）论治，仲平不及汝远甚。”（均见前章）当是时，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一西域人儒者之言，不如一西域人释者之言之尤为有力，而得国主之信用也。许衡、吴澄之徒之所以能见用于时者，纯恃有二三西域人后先奔走之，而孔子之道之所以能见重于元者，亦纯赖有多数异教西域人，诵其诗，读其书，倾心而辅翼之也。国师之送阿鲁浑萨理曰：“以汝之学，非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国师盖深知阿鲁浑萨理之不能为佛教张目，而将为儒教效其劳者也。故阿鲁浑萨理初见于世祖，即劝以治天下必用儒术，“天下”云者，中国耳。治中国非用儒术不可，阿鲁浑萨理由中国历史观察，熟审当时情形，以为惟此于元有利，遂主张以此收服中国之人心也。

《元史》本传叙阿鲁浑萨理先世，有足补赵孟頫碑之阙者，

曰：“阿鲁浑萨理祖阿台萨理，精佛氏学。生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入为释教都总统。”以释教都总统之子，而主张用儒术治天下，亦犹高智耀之本事佛敬僧，而力言儒术有补治道也，此佛教世家之儒学也。

## 五 摩尼教世家之儒学

### 高昌 契氏

摩尼教兴于波斯，唐时入中国，因为回鹘所信奉，更借回鹘之势力，延蔓于中华。回鹘既分布甘、和诸州，摩尼教徒遂随之转徙。观余闕述西夏风俗，有极类曾受摩尼化者。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云：“予家合澠，澠之戍军皆夏人，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也。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其异姓之人如此，其亲姻可知矣。”（《青阳集》卷三）凡曾读摩尼教经者，即知此等有类于共产之风俗，为摩尼教之风俗；即曾考究南宋时闽、浙摩尼教情形者，亦知此为摩尼教风俗。西夏既以回鹘流入之故，受摩尼教之感化，则原为回鹘地之高昌等处，其受摩尼感化必更强。摩尼教元时中国尚有，余前在《闽书》卷七发见泉州华表山有元时所遗留之摩尼教庵，近又于谈迁《枣林杂俎》义集目录天主教条下，发见有“明教附”三字小注。明教即摩尼教。惜余所见之《枣林杂俎》，为宣统间排印本，此条特注“缺”字。有录无



书,想因天主教事有所避讳而刊落之也,安得谈氏原稿而读之!明时中国既尚有摩尼教,则原为回鹘地之高昌等处,其摩尼教必更盛。《宋史·高昌传》述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尚见有摩尼寺波斯僧,此其证也。

摩尼教流行历史略明,则可揭出吾所欲述之摩尼教世家为谁氏。吾所欲述之摩尼教世家,高昌偃氏也。元时高昌人多矣,何以独推偃氏?则以偃氏自唐以来,世为回纥相,而唐时回纥相之与摩尼,又极有密切之关系。如《旧唐书·回纥传》,长庆元年,回鹘入朝,则与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俱。《白氏长庆集·与回鹘可汗书》,赐物回鹘,则与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俱。摩尼既为回鹘尊崇,可汗常与共国,则其国相岂能独外。兹将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之前段,节录如下,以明偃氏为摩尼教世家之证。传云:偃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噉欲谷,以女妻默棘速可汗为可敦。默棘速卒,国乱,故地尽为回纥所有,噉欲谷子孙遂相回纥。回纥尝自以其鸞捷如鹘,请于唐,更以回鹘为号。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今伟兀称高昌,地则高昌,人则回鹘也。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也。噉欲谷子孙,既世为伟兀贵臣,因为伟兀人。又尝从其主居偃鞞河上,子孙宗噉欲谷为始祖,因以偃为氏焉。相传噉欲谷初为国相,适当唐天宝之际。唐以安氏之乱,求回鹘援兵,噉欲谷与太子阙特勒帅师与讨安禄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进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终。传数世至克直普尔,袭为本国相,答刺罕,锡号阿大都督(《圭斋集》十一)。

此传有事实错误者二,有文字异同者二,先为辨正,而后

推求其与摩尼教有关焉。据《旧唐书·突厥传》：“毗伽可汗默棘连，及阙特勤之兄，以开元四年即位，时噉欲谷年七十余。”“开元二十年（《新书》作十九年），阙特勤死，上自为碑文；同年默棘连死，李融为碑文。”碑于清光绪十五年（西一八八九），与《九姓回鹘可汗碑》同出土。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取和林乐府》自注有云：“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案《唐史·突厥传》，阙特勤，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开元十九年阙特勤卒，诏为立碑，上自为文。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旧史》凡书‘特勤’皆作‘衙勒’之‘勒’字，误也。诸突厥部之遗俗，犹呼其可汗之子弟为‘特勤’，则与碑文符矣。”李文田《和林金石诗》（灵鹫阁本）所谓“因思移刺（即耶律）《双溪集》，字字分明阙特勤”，指此也。而《僊氏传》乃循《两唐书》作“勒”，其异一。默棘连，《两唐书》均作“连”，李文田诗“遗址荆榛默棘连，大唐祠像旧香烟”是也，而《僊氏传》独作“速”，其异二。此犹文字之小小异同者也。

安禄山之乱，在天宝末年，阙特勤之死，在开元十九年，其碑之立，在开元二十年，是安氏乱时，阙特勤死已二十余年矣。而《僊氏传》乃谓“噉欲谷与阙特勤帅师讨安禄山有功”，其误一。且阙特勤是突厥可汗太子，而助唐讨安禄山者，是回纥太子，《旧唐书·回纥传》“至德元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遣使回纥，修好征兵。二载九月，回纥遣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收复两京，加司空，封忠义王”是也。而《僊氏传》乃以阙特勤为回纥太子，其误二。究其所以致误之由，则因史有“乾元元年八月，回纥又使王子骨噉特勒等助国讨逆”之言，而误以骨噉特勒为阙特勤乎？不可知也。

突厥之灭,据《新唐书·突厥传》谓在天宝四年,是噉欲谷由突厥入回纥时,年已百有余岁,其助唐讨逆时,年百一十岁,史称开元四年(西七一六)噉欲谷年七十余,与《僊氏传》称噉欲谷助唐讨逆后,年百二十而终,其说正相合。果噉欲谷之卒,在代宗初年,去大历二年(西七六八)敕建摩尼大云光明寺之年,不过一二年,回纥为摩尼护法,僊氏世为回纥贵臣,其与摩尼教有关,尚何待论。

顾《家传》既明言其国俗素重佛氏,何以犹谓之摩尼?则以唐时回纥,自天宝而后,全国已改奉摩尼(说见《摩尼教入中国考》)。唐所赐回鹘印,系在天宝求援回鹘以后,当然以其所信奉者祝之,岂复有以佛氏语祝之之理。吾恒言中国人对于外来诸教,辨别辄不明了,如《新唐书》·五〇《常袞传》称“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创邸第、佛祠”,“佛祠”云云,实摩尼寺也。《九姓回鹘可汗碑》言摩尼开教回鹘事甚明,今日可为铁证。然此碑出土时,江标和李文田《金石诗》,犹以摩尼为佛,则前此之谬指为佛者更何足怪。江标诗云:

大字先题登里啰,可汗名字曰毗伽,半从佛法治天下,莫怪年来景教多。

“佛法”云云,谓摩尼明教也。《闽书》亦称摩尼佛,又称“至道中,怀安士人得佛像于京城”,“佛像”云云,亦摩尼像也。则《僊氏传》所称之佛,正可证其为摩尼佛。《旧唐书·回纥传》谓摩尼为回鹘所信奉,与《家传》所谓“其国俗素重佛氏”者正同。僊氏之先,既世为伟兀贵臣,且曾与于安史之役,则其为摩尼教世家,毫无疑义也。

偃氏为摩尼教世家之说既明,则可与言偃氏之儒学。克直普尔者,合刺普华之高祖。合刺普华见《元史·忠义传》。其孙偃玉立、偃哲笃等六人,皆登进士第,其曾孙之登进士第者三人,一门两代,凡九进士,时论荣之。许有壬为合刺普华墓志,黄潘为合刺普华神道碑,皆以为“积德累仁之报”,然无论是否为“积德累仁之报”,其孙、曾能以儒术致通显若此,不可谓非色目人之特色也。

偃哲笃,延祐首科进士,与马祖常、欧阳玄、许有壬、黄潘等为同年。偃玉立,延祐五年进士,至正中为泉州路达鲁花赤。《闽书》卷五三《文莅志》称其“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高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顾嗣立《元诗选》有偃玉立《世玉集》,偃哲笃诗附焉。《千顷堂书目》二十八有偃逊《近思斋逸稿》,注“回鹘人,初名百辽”,即偃哲笃子也。碑刻中亦时见偃氏昆仲文字。偃氏昆仲虽擢高第,能文章,然区区科名,诎得谓之儒学!今亦以儒学目之者,随俗称也。且吾之为是篇,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曾谓科名之盛如偃氏,不读孔氏之书而能然耶!元时科目,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各一榜,蒙古、色目人中选比汉人、南人为易,程度比汉人、南人为低。《元史·选举志》载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今自偃玉立、偃哲笃二人于政事文章有可考见外,其他七人学问深浅,无可考见。然既中选,则必“义理精明,文辞典雅”可知也。此摩尼教世家之儒学也。

附:偃氏一门九进士图。数目字,著其登第之先后。由延

祐二年乙卯,至至正八年戊子,凡三十四年。

合刺普华	楔文质	二、楔玉立(延祐五年)	
		四、楔直坚(泰定元年)	
		一、楔哲笃(延祐二年)	七、楔百僚逊(至正五年)
		三、楔朝吾(至治元年)	
		六、楔列篋(至顺元年)	
	越伦质	五、善著(泰定四年)	八、正宗(至正五年)
			九、阿儿思兰(至正八年)

## 卷三 佛老篇

### 一 西域词人之佛老

贯云石 迺贤 马时宪  
亦都忽立 刺马当

佛教非出于中国，然元时佛教之入中国，已千三百余年，本分禅、教两大宗，其禅宗早已成为华化。倘其人之佛学得自梵文，或得诸西域，固不可谓之华化；倘其佛学系由汉译经论，或由晋、唐以来之支那撰述而得，而又非出家剃度、身为沙门，仅以性耽禅悦，自附于居士之林，则不得不谓之华化。阿鲁浑萨理以释教总统之子，先学佛于国师八思马，学成而复习儒书，故吾名曰佛教世家之儒学。若西域人既邃于汉学，又以境遇或性近之故，去而谈禅，则可谓之“双料华化”矣。吾于此得二人焉：曰小云石海涯、丁鹤年。丁鹤年为回回教世家，将别论之，今先言小云石海涯。

小云石海涯，为平宋功臣阿里海涯之孙。阿里海涯者，畏吾人。赵翼《廿二史劄记》三十谓：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而莫甚于阿里海涯。《张雄飞传》：阿里海涯行省荆湖，以降民三

千八百户,没人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税,有司莫敢问。《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里海涯等所俘二万二千余人,并放为民。十九年,御史台言阿里海涯占降民为奴,而以为征讨所得。有旨,降民还之有司(二事并见卷一二八《相威传》)。宋子贞又以阿里海涯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见其所占之户,以千万计,兵权在握,恣意营私也。此阿里海涯即小云石海涯之祖父。今非欲暴小云石海涯祖父之恶,然非此无以证小云石海涯为浊世佳公子。其家世如此,其思想遂不禁别有所感觉也。

小云石海涯之家世既明,则可言小云石海涯之历史。《元史》一四三有《小云石海涯传》,然不足证明小云石海涯之学佛,因《元史》本传采自欧阳玄《贯公神道碑》(《圭斋集》卷九),而删节其词,故小云石海涯学佛之精神亦被刊落。今欲证明小云石海涯之佛学,当舍《元史》本传而用《贯公神道碑》。贯公即小云石海涯,父名贯只哥,因以贯为氏,元人著述通称贯云石。云石文学,另详《文学篇》。其佛学则《神道碑》开始一段已可证明。碑云:“至治三年秋,玄校艺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山之间,故人内翰贯公与玄周旋者半月余。及将去杭,薄暮携酒来别,谓玄曰:‘少年于朋友知契,每别辄缱绻数日。近年读释氏书,乃知释子誓有是心,谓之记生根焉,吾因以是为戒。今于君之别,独不能禁,且何哉!’言已,凄然而别。”此节在当日不过著者叙述与云石之交情,正史本传自无留存之必要,而在今日欲考察西域人之寓中国,曾否染有中国之佛化,则不可谓之闲文。碑中叙云石与渔父易芦花被后,尚有云石与中峰和尚论道一节,亦系闲情。乃本传于芦花被事,则点窜入传,而于见中峰事,则一字不提,若为云石讳者。云石本

非以儒学自任，谈禅何足为讳！兹录碑文大略如左，亦可见云石之出处及人生观矣。曰：“公辞归江南，十余年间，历览胜概，著述满家。所至缙绅之士、蓬掖之子、方外奇人，从之若云。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乃东游钱塘，入天目山，见本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公之踪迹，与世接渐疏，道味日浓，世味日淡，去而违之，不翅解带。”中峰禅师者，名明本，号中峰，为元世高僧。有《中峰广录》、《中峰怀净上诗》等著述行世。则云石之学佛，无可为讳。《七修类稿》三二云：“贯云石尝休暑凤凰山，今北山栖云庵，其藏修之所也。”是以碑复论之曰：“公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固为斯世难得，然承平之代，世禄之家，势宜有之。至如铢视轩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终身，此山林之士所难能。斯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哉！”云石盖有得于禅者也。

西域词人中，才名与云石相埒，而爱慕道家者，有迺贤。迺贤字易之，《元史》无传。元人著述称合鲁易之，或称葛逻禄迺贤。合鲁，元译，葛逻禄，唐以前译，汉言马也，故又称马易之。世居金山之西，元兴，西北诸部仕中国者，随便住居，故迺贤称南阳人。后随其兄塔海仲良官江浙，遂卜居于鄞。《甬上耆旧诗传》卷三谓其师事鄞人郑以道，以道集有《赠门人马易之序》。迺贤善歌诗，一再游京师，尽交其名士，有《金台集》。又性好古，所至访求名迹，摩挲断碣，发为咏歌。著《河朔访古记》，刘仁本《羽庭集》、王祯《忠文集》均有序。原书久佚，乾隆时在《永乐大典》中搜得一百三十余条，聚珍版印行之。迺贤之爱慕道家，传无明文，吾在《金台集》发见之。集共诗一百八十余篇，纪游咏古之外，为道士赋者占十之一。试录其目，亦



知其香火气之深也。

- 一、送陈道士复初归金华。
- 二、玄圃。为上清周道士赋。
- 三、题崇真宫陈炼师壁间竹梅。
- 四、送道士袁九霄归金坡道院。
- 五、虚斋。为四明王炼师赋。
- 六、鹤斋。为道士薛茂弘赋。
- 七、送道士张宗岳还龙虎山。
- 八、挽清溪徐道士。
- 九、赤城。金阁山在赤城西，祁洞明真人修炼之所，山中盛产青李来禽诸果。
- 十、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子。
- 十一、病中答张元杰宗师惠药。
- 十二、崇真宫夜望司天台。
- 十三、雨夜同天台道士郑蒙泉话旧，并怀刘子彝。注：蒙泉时奉祠上京崇真宫，子彝尝于四明东湖筑天坛道院，以待蒙泉东归。
- 十四、阳明洞丁元善尊师携酒过余夜饮。
- 十五、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哀诗。
- 十六、南城咏古十六首。序云：至正十一年秋，太史宇文公、太常危公偕燕人梁处士九思、临川黄君殷士、四明道士王虚斋、新进士朱梦炎，与余凡七人，联辔出游燕城，览故宫之遗迹，各赋诗十有六首。
- 十七、长春宫。全真丘神仙处机之居。太祖尝召至西域之雪山讲道，屡劝上以不杀。
- 十八、玉虚宫。大道教以供薪水之劳为其张本。宫主张

真人，其貌甚清古。

十九、题王虚斋所藏镇南王墨竹。

二十、送陈炼师奉香归四明，庆醮玉皇阁，寄王致和真人。

诗人结识道士之多，罕有若迺贤之众者也。方以类聚，同志为朋，则迺贤之好道无疑义矣。更观诗之内容，则迺贤所好之道，实神仙服饵之一派，故“苓芝、青精”等句，辄见于行间。

如《玄圃》云：

明年我亦山中去，剩采瑶芝满药囊。

《桃花山水图》云：

我昔扪萝探山谷，青精煮饭松旁宿，至今瞳子有神光，细字犹能夜深读。

《送袁道士归金坡道院》云：

君还炼石髓，九转成玄霜，他时肯分赠，碧落同翱翔。

《松巢》云：

茯苓尚可餐，永矢谢城邑。

《望泰山》云：

悬崖芝草承甘露，溜雨松根长茯苓。

《送张宗岳还龙虎山》云：

后夜相思京雒士，黄精还许寄来尝。

《挽清溪徐道士》云：

碧乳分茶烹雪水，青精煮饭荐冰蔬。

《答张元杰惠药》云：

卧病临高馆，丹芝幸见分，明朝得强健，长礼紫虚君。

《赠空谷山人归武当》云：

小瓮春风紫术香，长镵落日黄精熟。

《送陈炼师归四明》云：

山中芝草还分得，赠我能令白发稀。

正《春秋繁露》所谓“意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美者”，后之人可因此以知其性之所近也。适贤与云石不同，云石志在遗世，故佯狂咏歌以卒岁；适贤不忘用世，故希借修炼以长生。其环境不同，其思想遂随之而异，一禅一道，所以分途也。张

起岩题《金台集》云“长使马周贫作客，令人千古愧常何”，叹迺贤之不用也。迺贤于神仙境界，时寄遐想，如《登崆峒山》有云：

路逢一道士，高结冠巍巍，恐是广成子，再拜欲问之。  
长歌入深林，弃我忽若遗，灵踪邈难及，千载生遐思。

其神往低徊之意，溢于言表。其对于元初丘处机尤殷慕之，咏之至再，《京城杂言》云：

丘公神仙流，学道青海东。扣马谏不杀，嘉辞动天  
容。保此一言善，元祚垂无穷。

自注：“世祖纳全真丘处机之一言，国家始终好生不杀。”其《长春宫》又云：

羸骖踰秋日，迢递谒琳宫，草昧艰难日，神仙第一功。

可谓倾倒之至矣。其所与游之燕人梁九思，名有，亦一好古而慕仙之人，与迺贤性相近。迺贤有《河朔访古记》，梁有有《文海英澜》；迺贤好神仙，梁有有《续列仙传》。《文海英澜》者二百卷，汇录南北金石刻三万余通，《续列仙传》十卷，均见迺贤《寄梁九思》诗注。诗中有“泗水中流寻汉刻，泰山绝顶得秦碑。仙人久致青牛约，弟子能修白鹿规”之句，梁有亦儒而好道者也。元朝著名道士张雨，号句曲外史，迺贤以西域诗人，亦自号河朔外史。凡此种种，皆足为迺贤好道之一证。

有佯狂似云石，而不忘用世似酒贤者，未知其学佛乎？学仙乎？号曰笑笑道人，则似于道家为近。然六朝以道人为沙门之称，云石学佛，固亦尝号芦花道人、酸斋道人也。学佛抑学仙，本无庸细辨，今所欲说明者，西域人中有此一派耳。则笑笑道人之行谊可一述也。王礼《送马时宪还维扬诗序》，见《麟原集》卷四：

西域马君时宪，以胄监弟子员举进士，为翰林编修官，志不屑也。性重默，无泛交，迹绝权贵之门，众以是奇之。一日，闻有笑笑道人者，荷笠披纸衣，击筑行歌于市，憩江东雷冈亭，飞舞而上马祖岩。歌声若金石，悲壮激越，林木为动，田翁樵子，弃业而聚观，意其散仙也，怪而察焉，则时宪耳。噫！其果于忘世，若楚狂接舆者耶？抑犹豪杰不偶之士，雄才莫施，辄佯狂诡其迹，轻世肆志，以泄愤懣无聊之气耶？矧燕、赵素多慷慨悲歌之士，安知不犹有曩之风烈耶！余有以知时宪倜傥不羁之情矣。

此等举动，不论其所托者为佛为仙，皆可表明其为一不得志于时者之诗人。其系出西域，为可异也。

刘壎《水云村稿》卷八有《杏林公墓志铭》，云：“亦都忽立，其先回鹘人。所居种杏成林，因以自号，卒年六十有七。男四：曰马合，曰大都驴。歿三日，夫人使子来乞铭，因思西北人材率雄杰悍鸷，尚武而嗜杀，而公独禀和易，趋尚文雅，通儒书，礼秀士，喜谈仙佛，善作大字，绰有中州风度。其钟天地之仁气者欤？胄出西土，而钟灵特异者欤？噫！善人亡矣。”

亦都忽立之名其子，未脱西域人旧俗也，而其自号，及刘

壤所述,则已深染华风。通儒书不奇,奇其喜谈仙佛也。名其子曰马合,疑其先固回回人。然贯云石等四人,皆未尝为僧为道士,不过其学术思想趋向于是耳。

吾于王逢《梧溪集》发见一西域人人全真教为道士,真可谓应有尽有矣。《梧溪集》卷五有《俭德堂怀寄》,凡二十二首,每首各有小序。其第八首序云:“刺马当文郁,西域人。由父荫累迁南台御史,今寄迹全真教中。”诗云:

清修马道士,忆过小林丘,脱略青骢迹,追随白兔游。  
君亲心独取,河海泪同流,好在医闾北,徘徊紫气浮。

刺马当其名,文郁其字,其名译西域音,其字取中国义。玩王逢诗意,刺马当之人道似在元亡而后。寄迹黄冠,亦胜国遗臣之恒事,特出于西域人,则安世通不得专美于前矣。

## 二 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

### 丁鹤年

贯云石、迺贤等,虽系出西域,然其家世及原奉宗教不明,故只可概括之曰西域词人之佛老。若其家世及原奉之宗教,确有可考者,当专论之,则丁鹤年之经历最奇也。前篇曾论回回教世家之儒学,丁鹤年亦回回教世家之儒者,然其后复由儒而入佛,则其所受中国化之浓厚,又比专门儒者为甚也。丁鹤年生三十三岁而元亡,至明永乐末年始卒,年九十矣,故《元史》无传。《明史》入《文苑传》,叙述甚略,盖本戴良所撰《高士传》而节损之。今考鹤年生平,当仍采之《高士传》。《九灵山

房集》十九《高士传》云：

鹤年，西域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元初巨商。祖苦思丁，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父取马禄丁，重义轻财，尽取祖父遗资，赈诸亲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贫者。性尚豪迈，不喜荣名。年四十，辟主临川县簿，升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为筑种德之堂，请曰：“吾县盖公之桐乡，愿留居毋去。”遂家焉。生子五人，鹤年最幼。武昌公死时，鹤年年甫十二，其俗素短丧，所禁止者独酒，鹤年以为非古制，乃服斩衰三年。家有遗资，悉推与诸兄，不留一钱自遗也。武昌公在时，以鹤年倜傥类己，甚钟爱，异荫从父桓州职，鹤年辞谢不敢有，惟益厉志为学，清贫自苦。或曰：“汝贵家子，顾乃过自矫激如此？”鹤年曰：“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乡之诸儒长者，以其年幼而有志，多乐教之。年十七，通《诗》《书》《礼》三经。豫章周怀孝，楚大儒，时寓武昌，独器重鹤年，且欲同归豫章，而妻以爱女。鹤年以母老，诸兄皆官千里外，辞不行。明年，淮兵渡江，袭武昌，鹤年奉母夫人以行。夫人捐馆舍，鹤年哀毁尽瘠，盐酪不入口者五年。闻从兄吉雅谟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焉，辟从事，举校官，举孝廉，俱不应。南台大夫沙蓝答儿被召还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备洛访，复以从事辟之，江西、闽海二道肃政府，又以其省儒学提举荐，皆不就。留四明，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行囊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盖数数然也。鹤年天质颖

悟,读书过目辄成诵。善诗歌,而尤工于唐律,为文章有气,至于算数、导引、方药之说,亦靡不旁习。然专以躬行为学,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诺,尚气节,有东汉高士之遗风。员外郎马子英,不妄许可人,尝曰“吾友多矣,可托妻子者,惟鹤年一人”,世以为知言。

戴良之卒,先鹤年四十年。此传作于洪武初年,为鹤年所亲见,故鹤年《寄九灵先生诗》有“万言椽笔今无用,闲向林泉纪逸民”之句。注“先生尝为予作传”,即此传也。此传所述,关于鹤年前半世事略备。此传之后,有乌斯道《丁孝子传》(《春草斋集》卷七),纪鹤年梦得母墓事,亦可参考。惟学佛节,两传皆无明文,盖是时鹤年学佛之迹尚未著也。两传纪鹤年部族,仅泛称为西域人,《鹤年集》自署亦只曰“西域鹤年”,何以知其为回回教世家也?则有下列之诸证据。

《明史·文苑传》云“丁鹤年者,回回人”,其说盖本诸瞿佑《归田诗话》。《归田诗话·梧竹轩》条,谓鹤年为回回人。瞿佑曾在杭见鹤年,鹤年为佑审阅《鼓吹续音》,示以著述之法,佑深感之。《明史·文苑传》称“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即《归田诗话》语也。证一。《鹤年集》附录鹤年从兄古雅漠丁及鹤年次兄爱理沙诗,据元末人逸《元音》(卷十二)二人小传,均称回回人。其兄回回,其弟当然回回。证二。《元史》回回人多名丁,鹤年曾祖阿老丁,祖苦思丁,父取马禄丁,皆回回人名。杨士奇《跋丁鹤年诗》(《东里集》卷十)云:“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国,因以为姓,故鹤年亦丁姓。余在武昌遇之,时已老矣。”是鹤年本亦名丁也。证三。回回人居中国者马姓至多,吉雅漠丁字元德,亦取马姓。刘仁本《羽庭集》



卷五有《送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戴良又有《题马元德伯仲诗后》（《九灵山房集》廿二），伯即吉雅谟丁，仲即鹤年也。马子英为鹤年族兄，《鹤年集》有《题族兄马子英进士梅花诗》，是鹤年亦可马姓也。证四。赛典赤赡思丁为回回教祖别庵伯尔之后，已见《儒学篇》。《鹤年集》有《赠表兄赛景初诗》，注：“景初，咸阳王赛典赤之孙也。”表兄为回回人，表弟宜亦回回人。证五。回回俗葬无棺槨，《丁孝子传》言鹤年访母墓时，见平陆土有陷下者，意谓母葬时无棺槨，此回回葬法也。《高士传》又谓“其俗素短丧，所禁止者独酒”。证六。回回人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京师图书馆善本室有《回回药方》三十六卷。《高士传》谓鹤年“于导引、方药之说，靡不旁习”，“在四明或卖药自给”，此亦回回风也。证七。鹤年父重义轻财，鹤年亦倜傥类其父，每好赴人之急，此尤为回回教所尚，所谓五功之一也。证八。

有此八证，鹤年为回回教世家，毫无异义。至于鹤年本身，则实一儒家，读《高士传》已可概见：当其父死时，年十二耳，即以短丧为非古制，而服斩衰三年，其自幼已沾被儒风也。又欲奋身为儒生，年十七即通《诗》《书》《礼》三经，为大儒周怀孝所器重，今《鹤年集》有《奉怀先师豫章周孝思先生诗》，即其人也。鹤年既以儒学名，故凡思得文儒之上相助为理者，皆举鹤年，鹤年皆不之赴，所以为“高”也。集中亦常以儒自命，有“腐儒避地海东偏”，“落魄乾坤一腐儒”等句。其他举动之与回教相背者，可于《孝子传》见之：一作母主，蚤暮以拜，二陈酒肉以祭，三改葬用棺，皆非回教所宜有，惟儒教似之。戴良《鹤年吟稿序》云“鹤年兄弟俱业儒，伯氏之登进士第者三人”，皆足为鹤年儒教之证。而孰知其又不终于儒，此则与环境极有

关系者矣。

始吾读《明史·鹤年传》，见有“晚学浮屠法”一语而疑之，以回回与浮屠绝不相人也。及读《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见其与僧侣唱酬之作极多，而知《明史》之语有所本（明回回诗人金大车、大舆兄弟，亦多与僧侣唱酬之作。见《金陵丛书》丙集）。复获《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原分四集，第三卷曰《方外集》，与僧侣唱酬之作悉隶焉。核其所与游之僧，见之诗者凡三十一人，又较迺贤所与游之道侣为多矣。兹按《方外集》次第，举其名如下，漏载者据《艺海珠尘》本补之。

文极禅师	诸暨上人	僧净皓
甬东椿上人	慈溪懋上人	铁佛寺盟长老
铁佛寺益公了庵	见心长老	济汝舟长老
菩提寺主	恕中愠禅师	龙门海禅师
潘天渊长老伯仲	德声外侍者	信立庵长老
古鼎铭长老	慈溪润上人	慈溪牧上人
姑苏润上人	平江樞上人	贞长老
琦公宗师	义上人	祖庭兴上人
壁东文上人	大年椿上人	龙门禅师（补衲）

右二十七人，见《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卷三《方外集》。

济古舟	新古铭（二人皆浙东名僧）	秋月长老
铉宗鼎	染上人	

右五人，从《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录补。

《鹤年集》两本互有详略，今独取《琳琅》本者，以其特标《方外》一集，足明鹤年学佛之说不诬而已，非重其为元刻也。且此本并非元刻本，将于《文学篇》辨之。

鹤年以工诗寄迹丛林，榜所居曰逃禅室，所与游者尽缙流，莫不以得其一言为幸，故编帙遂日积而日富。观其所自述，及亲族所观察，鹤年似真有意于空门，如《送铁佛寺益公》有云：

世尊出西域，教化极东土。大道本无为，盛德人所慕。只今灭度二千年，授经弟子如亲传。我生懒僻苦贪佛，或谓三生有胜缘。

《题古鼎铭钟秀阁》云“我亦逃禅云水客，便应萧散共松扃”，《寄铉宗鼎》云“万里思乡瞻北斗，十年学道事西宗”，《宿染上人溪舍》云“见性本图先作佛，劳形翻愧早成翁”，皆自证其学佛之经过也。《鹤年集》附录其从兄吉雅漠丁诗，亦有“鹤年弟尽弃纨绮故习，清心学道，特遣楮帙，资其澹泊之好，仍侑以诗”等语，在宗族眼光观之，亦共证其为专心学道也。然以吾人今日研究之结果，鹤年之依佛，殆一种避祸不得已之苦衷，暂行遁迹空门而已。读其《逃禅室》诸诗，较然明白。如《逃禅室卧病柬诸禅侣》云：

高秋多病客，古寺寄黄昏，野迥常疑虎，天寒早闭门。  
离愁灯下影，乡泪枕边痕，赖有诸禅侣，情亲似弟昆。

又《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云：

不学扬雄事草玄，且随苏晋暂逃禅，无锥可卓香严地，有柱难擎杞国天。漫诧丹霞烧木佛，谁怜青露泣铜

仙，茫茫东海皆鱼鳖，何处堪容鲁仲连。

一种恐惧忧患之情，溢于言表，何与于禅！无怪乎曰“寄黄昏”、“暂逃禅”耳。又有《逃禅室述怀十六韵》，文繁不能备录。然其中如“耻洒穷途泣，闲修净土缘，有相皆虚妄，无才幸苟全。高蹈惭真隐，狂歌愧昔贤，惟余空念在，山寺日逃禅”等句，皆足证明其始非有真知灼见必须学佛，不过借此苟全性命耳。

然始而避地，继而参禅，终而高蹈，濡染既深，诂无所获！《艺海》本有《赠秋月长老》一首，为《琳琅》本所无，其意境亦为全集所未有，当系晚年参禅有得之言也。诗云：

秋月既虚明，禅心亦清静，心月两无亏，炯然大圆镜。  
流光烛万物，万物咸鲜莹，倒影入千江，千江悉辉映。情  
尘苟不扫，倏忽迷真性，所以学道人，于此分凡圣。视身  
等虚空，无得亦无证，伟哉寒山翁，与汝安心竟。

### 三 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

马节 赵世延

基督教世家之入道，最著者为马祖常之季父马节。节入王屋山为道士，说见《元文类》六七《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碑为马祖常撰，自述家世，至可信据。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百里，为唐司马承祯修道之所。《乾隆济源县志》十六载林灵素《游天坛三十二韵》，有云“林泉何处惬予心，收拾图书将卜筑，崎岖不敢千里辞，东至太行入王屋”是也。马节入山

后,无所表见,元人著述,亦鲜及之者,其甘心隐遁可知也。欲考马节家世,可观马祖常之家世,其祖为元名臣,又生元盛时,非有不得已必须隐遁之情可见也。家世奉基督,何以弃基督而入道,奇也。祖常为节犹子,祖常父子弃基督而入儒。读《石田山房文集》,祖常亦好与道上往还,集中赠道士诗,占全集十四分之一,与迺贤《金台集》相埒。然吾不以祖常为学道者,则以《石田集》赠道士诗虽多,皆酬酢之词,未尝有倾仰之意,与《金台集》绝异。集中求如《寄舒真人》云“凭师消鄙吝,犹可采山薇”等句,已不可多得。其称许道家处,亦不过如《王道士庆寿堂》“生男不必皆富贵,学道亦足传其家”而已。所以多与道士往还者,因祖常夙负诗名,诸黄冠咸以得其片词为幸,祖常亦乐此不疲,故《题舒真人鹤峰》云:

山中道士索题诗,柿叶千层写好词。不见笼鹅空揖去,此生虽老可临池。

可见其来者不拒之态度及道士求诗之众矣。至道士之好儒者,祖常更乐与之游,集中有《蜀道士归儒》一首,已见《儒学篇》。祖常之与道士往还,虚与委蛇而已。然证以马节之入道,则基督教世家与道家之接近,此中亦自有因缘。

马节而外,有赵世延,与马节同为雍古部人。雍古部为昔年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流行之地,故《元史》雍古部人多基督教人名。吾友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译注》,谓世延之父及子,皆用基督教徒之名,断赵世延为基督教世家,说不诬也。世延虽基督教世家,然其本身所学则为儒,《宋元学案》九五列《萧同诸儒学案》中,称为“渠庵同调”,渠庵者,同愬也。兹先将《元

史·赵世延传》节录如下：

赵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曾祖黜公。祖按竺迺，幼孤，鞠于外大父术要甲，讹为赵家，因氏为赵。父黑梓。世延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诏汉人参政，用儒者，赵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诚可用，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书参知政事。三年，劾奏权臣太师右丞相帖木迭儿罪恶十有三，寻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崩，帖木迭儿复相，锐意报复，诱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诬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对。至夔，路遇赦，帖木迭儿遣使督追至京师，煅炼使成狱。会有旨，事经赦原，勿复问。帖木迭儿更以它事白帝，系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为动。居囚再岁，胥益儿哈呼自以所诉涉诬欺，亡去。中书左丞相拜住屡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狱就舍养疾。帖木迭儿死，事乃释，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元年，召还朝。至顺元年，诏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屡奏：“臣衰老，乞解中书政务，专意纂修。”秋，以疾移文中书，致其事，明日即行，养疾于金陵之茅山。世延历事九朝，扬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于理。尝较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五子，达者三人，野峻台，次月鲁、伯忽。

吾录此传，而特详于世延被诬入狱一事者，吾认此为与世延之学道极有关也。许有壬《至正集》七六有《辩平章赵世延》文，

即为此事,可参考。《铁木迭儿传》二〇五及《英宗本纪》二七亦可参考。铁木迭儿必欲置世延于死地,由成都逮捕至京,陵虐禁锢,前后二年才出狱,时世延年六十余矣。凡人经历艰险,则信仰宗教之念悠然而生,佛老生涯又多与林泉接近,人即不信宗教,而情甘隐遁,自易与佛老为缘,丁鹤年之念佛,赵世延之学道,皆不能逃此例也。惟世延学道,史无明文,本传谓其事释后出居金陵,所谓金陵,盖茅山也,下文谓其养疾于金陵之茅山是也,史特讳言耳,然此亦何庸讳!世延著述,今传者不多,吾所见者,《南唐书序》、《茅山志序》外,有《京师东岳庙昭德殿碑》,文见《图书集成·职方典》廿六,有《盖屋重阳宫敕藏御服碑》,见拓本。其存目待访者,有《句容白云崇福观碑》,见《寰宇访碑记》,皆与道教有关者也。又世延之诗,《元诗选》癸集所收仅七首,而咏道院之作,已占其五,盖选自《茅山志》卷三十者:

- 一、玉晨观怀古。
- 二、许长史井。
- 三、白云观即景用韵。
- 四、华阳道院石亭。
- 五、出茅山,宿青玄观。

其《许长史井》云“因观长史阴阳井,始悟混元玄牝门”,其《华阳道院》云“何当借我东偏屋,静掩岩扉学炼形”,其《宿青玄观》云“莫道归途清兴减,夜来和月饮刀圭”,似世延所学,亦服食炼形一派,而非虚谈玄理者比。

世延归里后,有鸠资创建文昌帝君祠一事,见《清河内传》卷九赵延之(太原人)《文昌帝君行祠记》,尤足为世延学道之证。曰:“后至元二年,前奎章阁大学士、鲁国公赵世延告老还

成都，不忘旧德，拳拳于张君，甫下车，先侍生而卜焉。予因以建祠事告，公曰：‘积岁存心，愿莫之遂，若相神麻，敢披肝胆以助。’六月甲寅，遂卜其事，步城内外，择异处焉。祠事始定，公自为疏若干以鳩其资。”又曰：“主盟胜概者赵相也。晨夕劬躬，拮据卒徒者，侍生杨世仁也。”则世延之学道，又可于道家著述证明之。“张君”云者，道家称文昌帝君为即《诗经》之“张仲孝友”也。

更有一事，足觐世延家学儒道杂糅，而与基督实不相容。陈旅《鲁郡夫人赵氏墓志》（《安雅堂集》十一）云：“夫人赵氏，鲁国公世延之女。鲁公之平章蜀省也，奸臣以诏逮公系请室，夫人年十三，即却荤肉，向北斗拜祷，凡三年。”礼拜北斗，正道家法。又云：“鲁公以其能诵《易》，尝教之筮，诸阴阳家书，皆能通之。”阴阳术数，亦与道家为近。此世延家学之带有道家色彩者也。世延晚年，尤深黄老之术，权衡《庚申外史》载：“元统元年，太师燕帖木儿溺于酒色，宴赵中丞家，男女共坐，名为鸳鸯筵席。”《元史》一三八《燕铁木儿传》采此事，改鸳鸯筵席为鸳鸯会，然无论为筵席为会，此何等事，而世延乃曲忍之，不惜以自邸为彼荒淫地，与昔年弹劾铁木迭儿之气概，一何判若二人乎！岂阅世既深，则趋避熟乎？无惑乎当时有监察御史葛明诚者，劾世延固位取容，无补于事，请斥归田里也（《元史》三四）。此学黄老者之蔽也。然则世延之父及子，虽用基督徒之名，实不过一种基督化情力耳。



## 卷四 文学篇

### 一 西域之中国诗人

泰不华

迺贤

余阙

聂古柏

斡玉伦徒

三宝玉柱

张雄飞(昂吉、完泽)

伯颜子中

薛超吾

郝天挺

辛文房

马彦羣

阿里

前篇所论,如峨峨、马祖常、泰不华、贯云石、迺贤、丁鹤年等,皆有诗名。峨峨诗传者不多,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仅据石刻及《元风雅》选其数首。峨峨本以书名家,故诗名为书名所掩,详《美术篇》。贯云石有《酸斋集》,见《元诗选》。酸斋以乐府名,将别论之。马祖常为基督教世家,丁鹤年为回回教世家,亦将别论之。

泰不华死于方国珍之难。《元诗选》有《顾北集》,与余阙《青阳集》并列,推为元季诗人第一。其言曰“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迨至正用兵,勋旧重臣往往望风奔溃,而挺然抗节、秉志不回,乃出于一二科目之

士，如达兼善、余廷心者，其死事为最烈。然后知爵禄豢养之恩，不如礼义渐摩之泽也。故论诗至元季诸臣，以兼善为首，廷心次之，亦足见二人之不负科名”云。

至于迺贤，则有《金台集》传世，杨彝跋盛称其《颍州老翁》、《西曹郎》、《巢湖》、《新乡媪》、《新堤》诸篇，抚事感怀，有得于风人之旨。《颍州老翁》篇幅太长，今特介绍《新乡媪》一篇如下：

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绵华到天晓。绵华织布供军钱，倩人辘谷输公田，县里工人要供给，布衫剥去遭笞鞭。两儿不归又三月，只愁冻饿衣裳裂，大儿运木起官府，小儿担土填河决。

茆檐雨雪铎半昏，豪家索债频敲门，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床孙。明朝领孙入城卖，可怜索价旁人怪，骨肉生涯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

数来三日当大年，阿婆坟上无纸钱，凉浆浇湿墓前草，低头痛哭声连天。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调，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热火添香篝。

诗中大意可分三截：第一截写专制政体之横暴，第二截写豪门势力之压迫，第三截写贫富阶级之悬殊，抑何其言之沈痛也。

迺贤，葛逻禄人。葛逻禄今为俄地，其殆开后来俄国文学之先路乎！而同时诗人则固以迺贤为被中原之化者也。《金台集》李好文《序》谓：“尝爱贺六浑《阴山敕勒歌》，语意浑然，不假雕刻，顾其雄伟质直，善于模写，政如东丹突欲画本土人

物,笔迹超绝,不免有辽东风气之偏。惟吾易之之作,粹然独有中和之气,非圣人之化,仁义渐被,诗书礼乐之教而致然耶!”贡师泰《序》则谓:“予闻葛逻禄氏,在西北金山之西,与回纥壤相接,俗相类,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时居货,谋取富贵。易之世出其族,而心之所好独异,宜乎见于诗者卓乎有以异于人也。”程文《序》则谓:“易之葛逻禄人,在中国西北数千里之外,而能被服周公、仲尼之道。家固有闾閻勋荣,可借以取富贵,而弃不就,臞然一寒生,专以诗名世。”则迺贤与托尔斯太一流正有些相类,而戴良为《丁鹤年集》序,历数元时西域诗人,独不及迺贤,抑亦异矣。

《琳琅秘室》本《鹤年集》序,与《九灵山房集·鹤年吟稿序》,稍有异同,《琳琅》本为初稿,《九灵》本为定稿也。《琳琅》本云:“我元受命,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率先臣顺,奉职称藩。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嵯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占柏、翰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数公者皆居西北之远国,其去幽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足见我朝王化之大行,虽成周之盛莫及也。”

以上所举西域诗人十二人,独阙迺贤。《九灵》本则仅留马、萨、余三人,并贯云石、高彦敬等九人而去之。此十二人者,其诗名高下不同,而其可与中国作者抗衡则一也。戴良初以十二人并举,正可见其同负时名,足为今日言西域诗人者之

参考。兹将十二人中之已见或未见于前者,疏其略历如下:

马伯庸即马祖常,达兼善即泰不华,萨天锡、鲁至道为回教世家,雅正卿为基督教世家,别有专论。高彦敬名克恭,亦回回人,有《房山集》,见《元诗选》。善画墨竹山水,诗名为画名所掩,详《美术篇》。

余廷心名余阙,河西人,河西古诸羌,李元昊据之为西夏,元初累征之不服。其人刚直守义,蕃语谓之唐兀氏,为元色目人之一。其俗自别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余阙盖蕃而非汉也。据《元史》本传,余阙父名沙刺藏卜,据《元统癸酉进士录》,余阙父名屑耳为,祖及曾祖均名铎节,皆非汉姓,故余阙实西域人。至正十八年守安庆死节,有《青阳山房集》,今传于世。《元史》称其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四库提要》称其诗以汉魏为宗,优游沈涵,于元人中别为一格。胡应麟《诗薮外编》六云“元人制作,大概诸家如一,惟余廷心古诗近体,咸规仿六朝,清新明丽,颇自足赏。惜中厄王事,使成就当有可观。泰兼善绝句温靓和平,殊得唐调,二人皆才藻气节兼者”云。

聂古柏官吏部侍郎,据黎崱《安南志略》三,至大四年,聂古柏曾奉使安南。《元诗选》三集有《侍郎集》,鲁贞《桐山老农集》二有《送聂古伯主簿序》,疑同名异人也。傅习《元风雅》采聂古柏诗七首,其《番禺道中》一首,各家选本皆采之。末有句云“中朝耆旧如相问,鸟语啾啾正未堪”,竟笑吾粵为舛舌南蛮,而不自审其出于何族也。

斡克庄,名斡玉伦徒,徒或作都,或作图。西夏人。虞集弟子,《道园学古录》三九有《海樵说》,即为斡玉伦徒作。《元文类》十八选虞集撰《西夏相斡公画像赞》,斡公即玉伦徒之高

祖。《元诗选》癸之丁，有翰玉伦徒诗，癸之戊又有王伦徒诗，“王”为“玉”之讹，《元诗选》误作二人。虞伯生《诗续编》卷首，有监丞玉伦徒诗，刻本亦或误作“王”，《元风雅》则作“玉”，实一人也。翰玉伦徒为纂修《宋史》二十三人之一，见《圭斋集》十三《进宋史表》。《陔余丛考》十三刻本讹为幹三伦徒，皆误。

三廷圭，名三宝柱，畏吾人。《元史》一四四附《星吉传》。《元诗选》癸之丙有三宝柱诗。

凡此诸人，其诗今日或传或不传，然在当日则皆有声于时，然后为戴良所论列也。

唐兀去中国最近，其地又颇崇儒术，习睹汉文，故入元以来，以诗名者较他族为众。余闕、翰玉伦徒之外，尚有张雄飞、昂吉、完泽等。

张雄飞，登延祐首科进上，与马祖常、许有壬等同科，《至正集》三三有《张雄飞诗集序》，云：“延祐首科，国人暨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唐兀氏张君雄飞，首科右榜有闻者也。尤工于诗，佳章奇句，不可悉举”云云。与《元史》之张雄飞字鹏举者，同名异人，一汉人，一唐兀氏也。

昂吉字启文，至正八年进士。杨维禎《送启文会试诗》有“西凉家世东瓠学，公子才名久擅场”之句。《玉山名胜集》有昂吉倡和诗，《元诗选》有《启文集》。

完泽字兰石，《西湖竹枝集》称其聪敏过人，善读书，尤工诗律。

《元诗选》二集有《子中集》。伯颜子中，亦西域人。《明史》一二四附《陈友定传》。子中卒于洪武十二年，故《元史》无传，济阴丁之翰为作传，载《七修类稿》十六中。传云：

伯颜，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遂为进贤人。幼读书，通大义，稍长，无所好，惟耽典籍，手不释卷。从钓台夏溥习进士业，四以《春秋经》领江西乡举，授龙兴路东湖书院山长，改建昌路儒学教授。壬辰兵兴，全闽、二广皆归附国朝，伯颜由是潜形遁迹，隐约江湖间。以先世有墓庐在彭蠡之涯，乃卜进贤之北山，诛茅剪荆，躬自为创竹屋三间，左图右史，闭户澹如，时寓其忠愤于词翰之间而已。洪武十二年己未秋，朝廷搜求博学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明史》及《明史稿》作立本）闻伯颜名，遣从事以礼来征。伯颜闻使者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争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诗》，祭其先与昔时共事死节之士，复手书短歌一篇，饮药而卒。

王礼《麟原集》卷四有《伯颜子中诗集序》，云：“子中既断发自废为民，忠愤邑郁，仰屋浩叹，付之无可奈何，而心不能自平，时时以其慷慨之情、憔悴之色，一寓于诗。又记其旧作，辑为一卷，俾予序之。余三复而叹曰：‘美哉！飒飒乎殆有唐之正音，而阳明之气也。’子中今无民社之责，将翔于青原白鹄之间，肆其力于文字，则余也葛巾野服，陪乎杖履之末，尚取新作玩绎之。”其推挹极矣。

西域人中，更有其诗不传，而其诗集序跋尚见于他人文集，可以略窥其造诣者，有薛昂夫。《松雪斋文集》卷六有《薛昂夫诗集序》，云：“嗟夫！吾观昂夫之诗，信乎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昂夫西戎贵种，服旃裘，食湏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其风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皆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

有所不及，斯亦奇矣。盖昂夫尝执弟子礼于须溪先生之门，其有得于须溪者，当不止于是。而余所见者词章耳，他日昂夫为学日深，德日进，道义之味，渊乎见于词章之间，则余爱之敬之，又岂止于是哉！”

元时西域人华学之盛，论者辄谓与科举有关，吾不谓然也。当延祐未兴科举前，如不忽木、回回、纛纛等，文采斐然，何尝由于科举！然此犹得谓不由科举而由学校也。若廉希宪、赡思、赵世延等，又何尝出身学校！即以科举既兴论，贯云石、迺贤、丁鹤年等，又何尝出身科举！马祖常等出身科举矣，而延祐首科即已中选，其文章学问，必早蓄于未兴科举之前，岂为科举而求学也。薛昂夫亦生于元初，科举未兴，未尝入国学，徒以爱慕华学，执业于宋遗民刘辰翁之门，其华学遂灿然有烂，赵孟頫所以惊为奇事，而深信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

辰翁子将孙《养吾斋集》二四有《薛超吾字说》，云昂夫为超吾之字，而不言为西域人。《天下同文集》十五有王德渊所为《薛昂夫诗集序》，述昂夫家世较详，以为回鹘人能读中夏之书，破天荒而出类拔萃也。曰：“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人之生世，封域不同，而能氏不忘祖，孝也；仕元朝明圣之代，名不忘国，忠也；读中夏模范之书，免马牛襟裾之诮，字不忘师，智也。惟孝与忠、智，根本立矣，文藻柯叶，又何难为！今观集中诗词，新丽飘逸，如龙驹奋迅，有并驱八骏一日千里之想，振珂顿辔，未见其上。昂夫今甫三十有一，余欲与期之于十年之后。唐□□（应是种人二字）率多武臣，少见文士，昂夫诚能簪进川增，独破天荒，异时列名于儒林、文苑传中，出类拔萃，超越前古，顾不伟欤！”

昂夫诗集今不传，昂夫诗吾亦未一见，然由赵、王两序之

保证,不能不认为西域诗人之一,固不得以其诗之不传而屏之也。

西域诗人中,又有其诗传者不多,而别以与诗有关系之著述传者,则郝天挺之《唐诗鼓吹注》,及辛文房之《唐才子传》是。苏天爵为《元文类》,搜辑殆二十年,而西域诗人仅采五家,马祖常、高克恭、赵世延外,辛、郝二家而已。

郝天挺,字继先,号新斋,出于朵鲁别族。父和上拔都鲁,以武功称。天挺幼受业于遗山元好问之门,多所撰述,注《唐诗鼓吹》十卷外,又修《云南实录》五卷,事迹具《元史》本传一七四。天挺色目人,而《元史》与汉人同列,一时失检也。天挺诗传者仅一二篇,其《麻姑山》一律,《元风雅》、《元文类》并采之,而康熙御定《全金诗》四二乃据以补入金人之郝天挺卷中,不知金、元之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好问师,一为好问弟子。《池北偶谈》卷六、《元诗选》癸之乙先后辨之,《四库提要》总集类二亦引《池北偶谈》说,释陆貽典之疑。乃《新元史》一四八《郝天挺传》中,又臚入金人郝天挺语。原语见《中州集》卷九《郝天挺小传》,《金史·隐逸传》采之,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男子生世,不耐饥寒,则虽小事不能成,予试以吾言求之。”此元好问述其师郝天挺语,而《新元史》以为是好问弟子郝天挺之言,亦一时失检也,特附识于此。《唐诗鼓吹》者,元好问所编,而郝天挺注之,赵孟頫序云:

鼓吹者何?军乐也。选唐诗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于乐,其犹鼓吹乎!遗山之意深矣。中书左丞相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教者,盖非止于



诗而已。公以经济之才坐庙堂，以韦布之学研文字，出其博洽之余，探隐发奥，人为之传，句为之释，或意在言外，或事出异书，公悉取而附见之，然后唐人之精神情性，始无所隐遁焉。嗟夫！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此政公惠后学之心，而亦遗山哀集是编之初意也。（《松雪斋文集》卷六）

赵序仅言天挺为好问弟子，而未尝注意其为色目人。姚燧序则注意及之。曰：“鼓吹，军乐也。遗山选唐诗近体六百余篇，以是名。遗山代人，云南参政郝公新斋，视为乡先生，自童子时尝亲几杖，得其去取之指归，恐其遗忘，既辑所闻与奇文隐事之杂见他书者，悉附章下，则公可当元门忠臣。公将种也，父兄再世数人，皆长万夫，于鼓吹之陪牒稍而导绣轡者，似已厌闻，乃同文人词士，以是选为后部寂寂而自随，无亦太希声乎！其亦宏壮而震厉者，亦有时乎为用也。”（《牧庵集》卷三）

则直以郝天挺为原出将门，至是乃讲求文学也。今通行本《唐诗鼓吹》，无赵、姚二序，而有徐乾学序。《四库提要》谓：“天挺所注，虽颇简略，而但释出典，不涉穿凿，与明廖文炳等所解横生枝节者不同。”廖文炳为吾乡人。观今通行本，廖文炳等所解，卒不能废，盖初学便之也。

辛文房亦有诗名，陆友《研北杂志》云：“王伯益执谦以字行，大名人。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杨载仲弘，浦城人，并以能诗称。”《杨仲弘集》卷七有《元日早朝，次韵辛良史》七律一首，《句曲外史集》卷四亦有《元日雪霁，早朝大明宫，和辛

良史省郎二十二韵》。辛文房诗,不多见,《元文类》卷四、卷八载其《苏小小歌》及《清明日游太傅林亭》二篇,《四库提要》传记类一谓仅一篇者,沿《池北偶谈》十二说也。王士禛据《杨东里集》卷十,知辛文房有《唐才子传》,恨不得见。乾隆时纂《四库全书》,始在《永乐大典》中辑为八卷。后三间草堂、粤雅堂得日本刊足本十卷重雕之,此书遂复传于世,孰料西域人乃有此著述也。《四库提要》称其“较《唐诗纪事》叙述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传后缀论,多掎摭诗家利病,足以津逮艺林”。伍崇曜跋称其“评鹭精审,似钟嵘《诗品》;标举新颖,似刘义庆《世说》;而叙次古雅,则又与皇甫谧《高士传》等相同”,称之者至矣。惟《唐才子传》三百九十七人中,无一西域人焉,则运会之异也。予在马祖常《石田集》,发见文房有《披沙诗集》,与唐李咸用诗集同名,恨未得见,安得如《唐才子传》之复出人间也。兹将《石田集》卷二《题辛良史披沙集》诗录下,亦可窥见文房诗格之一斑。诗云:

未可披沙拣,黄金抵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长歌。  
秋塞鸣霜铠,春房剪画罗,吟边变余发,萧飒是阴何。

阴、何,阴铿、何逊也。以此相比,深许之矣。无感乎其于王执谦等齐名,而杨载等与之倡和也。

西域人有不以诗名,而由赠诗者之众,亦可知其人之风雅。杨翮《佩玉斋类稿》卷四有《送马彦羣赴江西省管勾诗序》,曰:“金陵寓官马彦羣,由进士为江西行省管勾。行有日,其故人刘献可具请于彦羣之所尝与游尤长于诗者,咏歌之以张其行,得诗一卷,谓上元杨翮习文词,宜为序,虚其右方属

焉。予惟金陵为江左文物之邦，历晋、宋、齐、梁、陈及南唐为都会，其俗特善歌诗。天朝克定季宋，金陵独未尝被兵，涵煦五六十载，人才辈出。彦举自早岁寓金陵，有贤名，与合郡之学士大夫尽交焉，故其上官之日，具得其诗，而四方秀人名公卿之在金陵者，亦附诗卷中，由是卷之诗美且富。惟彦举以西域世胄，入天子太学，擢右科进士，其年正强，才德方懋，宪官御史将交章论荐，何假于诗。然江西幕府，若大梁崔公、河南王公，皆当世之号能诗者，彦举往而有同寅之好，他日将从容取吾乡之诗而观之，则是诗乌可少。”

又有官于此县，而他县人赠之诗者。如安仁县人之于弋阳县监县阿里是也。李存，安仁人，安仁为弋阳之邻县，而《俟庵集》十九有《弋阳县阿里公宣差诗卷序》，云：“至正四年秋，西域阿里公受命于朝，来监信之弋阳县。公世居燕南，以孝友称，故御史季公、学士贾公、参政苏公、郎中王公，或诗以美之，或文以纪之。前乎此尝监胶水，有惠政，其民述而刻之石。今兹未几，而邑人歌咏之者，复盈耳而载路。顾安仁之于弋阳也，壤地相接，闻而知之，亦有不能已于言者，桂君才甫集而次焉，何其声之似弋阳也。”

此真有合于风人之旨者也。不问其本人是否能诗，然邦人士既各以诗投之，则其人必为风雅之上。

## 二 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

马润 马祖常 马世德

雅琥(别都鲁沙)

西域诗人中有为基督教世家者，莫著于雍古马氏。马祖

常父马润,所为诗,曰《樵隐集》,见袁桷所撰神道碑,此马祖常之家学也。《樵隐集》今不传。马祖常《石田集》则至元五年奉旨为之刊行,苏天爵序称其诗“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四库提要》亦称“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集中昆仲倡和之作亦夥,风流文采,萃于一门,彬彬称盛矣。

祖常从父马世德,为保禄赐之子。由进士第,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曾为庸田金事,城姑苏;后为淮南廉访金事,又城合肥。余阙《青阳集》有《合肥修城记》,即颂马世德之功德者也。记称“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国人,与余前后为史氏”云。世德亦工诗,《元诗选》癸之丁有马世德《过灵泉寺》二绝,云“世德浚仪人,官刑部尚书”,而阙其字。考马氏自祖常高祖习礼吉思始迁浚都,《西湖竹枝集》称马祖常为浚仪可温人,是也。《元诗选》癸之己有潘煌《陪侍尚书元臣公寓灵泉寺诗》,由此可知过灵泉寺之尚书马世德,即合肥修城字元臣之马世德,城合肥时为淮南廉访金事,过灵泉寺时为刑部尚书也。《元诗选》癸之癸据王宾《虎丘山志》,有马世德《题虎丘诗》,遂别出一马世德,不知即为过灵泉寺之人,由其曾城姑苏一事推之,则题虎丘正其为庸田金事时也。今录其诗如下,亦足觐其鳞爪。

沧海何年涌此峰,亭亭秀出玉芙蓉。高低楼观毗卢室,表里江山太白封。宝剑有时能化虎,石潭无际却潜龙。小吴轩畔登临处,致我青云第一重。

马氏而外,基督教世家诗人当推雅琥。雅琥,字正卿,《元

诗选》二集有《正卿集》。顾何以知雅琥为基督教世家,其证有三:一、《傅与砺诗文集》卷三有《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作,原注“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琥”。雅古为亚伯拉罕之孙,基督教徒恒以此为名,《元诗选》此诗,犹存此注,《康熙御选元诗》卷五将此注删去,而雅琥为基督教世家之证据,缺其一矣。二、孙原理选《元音》卷九采雅琥诗,称为可温人。曹学佺《历代诗选》,元诗卷七雅正卿诗,亦题“元可温雅琥著”,此与《西湖竹枝集》之称马祖常为可温人同一例,盖也里可温之省文也。四库本《元音》卷七改为“雅哈,衮诺尔人”,令人不知为何语,谬甚。三、《元秘书监志》卷十题名“著作佐郎雅古,赐进上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为著作佐郎在前,登进上第在后,故志仍雅古名,而追纪其赐进士出身也。有此三证,雅琥之为基督教世家无疑问矣。琥曾为奎章阁参书,《元史》三五《文宗纪》“至顺二年三月,御史台臣言奎章阁参书雅琥阿媚奸臣,所为不法,宜罢其职”。所谓奸臣者,泰定帝时宰相倒剌沙、乌伯都剌等,文宗竟恶之,目为奸臣。魏源《元史新编》四一平反之,允也,不足为雅琥病。马祖常《石田集》卷九有《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云:“雅正卿以文学才谔遇知于天子,出貳郡治,馆阁僚友及京师声明之士,各忻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而请余为之序。”雅琥诗名藉甚,瞿佑《归田诗话》卷下盛称其《御沟流叶诗》,云:雅正卿有《四美人图诗》,惟《御沟流叶》最佳。诗云:“彩毫将恨付霜红,恨自绵绵水自东。金屋有关防虎豹,玉书无路托鳞鸿。秋期暗度惊催织,春信潜通误守宫。莫道人间音问杳,明年锦树又西风。”琢句甚工。

胡应麟《诗薮外编》六论元诗,亟赏马伯庸“吴娃荡桨潮生

浦，楚客吹箫月满楼”，雅正卿“梅花路近偏逢雪，桃叶波平好渡江”，“一声铁笛千家月，十幅蒲帆万里风”等句，以为“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故稍为拈出，以俟知音”云。可见元人之诗，久不在明人目中也。

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自古而然，贤者不免。即雅琥本人之论诗，亦尝犯此病。许有壬跋雅琥所藏鲜于伯机《词翰》云：“鲜于伯机诗，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慨言人知其书，诗则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监郡雅琥正卿知之虽晚，爱之甚笃。正卿素言晋后有书，终不能如晋，唐后有诗，终不能如唐。予谓诗发于人心，天地无穷，人心无穷，不当主世代计也。书视诗，又艺之艺耳，正卿不屈也。及其观伯机书，则谓真《十七帖》，观其诗，又谓轶苏州，入彭泽矣。若然，则晋、唐而后，书复有晋，诗复有唐矣。予非好胜，窃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机之半，行皆左祖，且以释吉甫之慨焉。”（《至正集》七三）则雅琥初持复古论，继亦改持进化论者，许有壬嘲之，亦艺林佳话也。

雅琥婿别都鲁沙，亦有诗名，黄镇成《秋声集》卷下，有雅正卿婿别都鲁沙《迓宪使归汉阳》诗。

### 三 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

萨都刺

丁鹤年（吉雅谟丁、爱理沙）

鲁至道（哲马鲁丁、别里沙、仇机沙） 买闾

回回教世家之诗人，莫著于萨都刺、丁鹤年。萨都刺字天锡，有《雁门集》传世，毛晋跋之曰：“天锡以北方之裔，而人中

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半山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余于天锡亦云。”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刺小传》云：“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缚，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迺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云。

顾何以谓萨都刺为回回教世家？一、据杨维桢《西湖竹枝集》，谓“萨都刺为答失蛮氏”，答失蛮者，长春真人《西游记》译为大石马，云“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是也。《元史》二三《武宗纪》：“至大二年六月，宣政院奏免儒、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元史二》据《元典章》，谓“答失蛮，为回回之修行者”，《至元辨伪录》卷三作达失蛮。此可证萨都刺为回回人也。二、据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谓“萨都刺为回纥人”。回纥，唐元和间改为回鹘，其族类本在葱岭之东，夙奉摩尼教，与回回之在葱岭以西奉伊斯兰教者迥殊，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也。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是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卷十《世祖纪》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

与回回一也。余将有专论详之，此不过证明萨都刺为回回人而已。

更有谓萨都刺非回回人，而适足反证其为回回人者。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二，谓“萨都刺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其说本之孔齐《至正直记》。正可证明萨都刺当时必自认为回回人，而人亦以回回人目之，然后可诋为冒也。至于“朱氏子”云云，实因回回教人不食豕肉，讳言猪，猪与朱音同，谓其为朱氏子者，诬之也。加异教以恶谥，自昔有之，《辍耕录》廿八有《嘲回回》一条，薄俗也。今《雁门集》卷首有萨都刺遗像，其丰采纯然一回回人。集中《客中九日诗》，有“佳节相逢作远商”之句，萨都刺曾为商，远商亦波斯、大食人本俗。据《萨氏家谱》，萨都刺弟名刺忽丁，刺忽丁回回教人名也。《四库提要》因干文传《雁门集序》有“萨都刺即华人所谓济善”一语，曲解萨都刺为蒙古语，遂谓萨都刺为蒙古人，谬甚。至于萨都刺本人，是否仍守回回旧俗，实一疑问，其《溪行中秋玩月诗》，则固以儒自命，曰“有子在官名在儒”，此西域人习华学者之通例也。

萨都刺而后，回回教诗人首推丁鹤年。丁鹤年由儒入禅，前篇已详论之，至其诗则实为元季诗人后劲。戴良《鹤年吟稿序》称：“鹤年古体歌行，皆清丽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于五七言律。其措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节格调，则又兼得我朝诸阁老之所长，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诗人之所可及。”今《鹤年集》通行者有二本，《艺海珠尘》本三卷，题曰《丁孝子诗集》，《琳琅秘室丛书》本四卷，题曰《丁鹤年集》。以余所考，二本所收，皆明刻，而黄丕烈诸人则以四卷本为元刻，不知其一时疏略，抑自欺欺人也。黄丕烈跋云：“此元



刻元人丁鹤年诗，余友顾润滨岁试玉峰时所收，而以归之余者也。余向藏正统重刻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续集》，以附录终焉。尝取与明刻校勘，分卷分体，俱非其旧，即如《海巢》一诗，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职是之故，明刻列诸卷二中，失其旨矣。他如《哀思》以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后之称者，仅据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证庐山面目，益叹元本之不致沦没者几希。”此黄丕烈以四卷本为元刻本之说也。然试一考本集内容，则《梦得先妣墓》一首在焉。序云“己未夏五月，还武昌迁葬。兵后陵谷变迁，先妣封树，竟迷所在，久寻不得，露祷大雪中。冬十一月廿日夜，忽感异梦，翌日遂得其处，赋诗一首，以纪岁月”云。己未，洪武十二年也，元刻何能有洪武诗。此非元刻，证一。鹤年还武昌在洪武十二年，而集中《守墓陈情上武昌太守傅藻》诗，于“太守承恩下玉京”，及“拥经东出辞储馆”等句，“恩”字另行平抬，“玉京”“储馆”，均空格。此为明刻，证二。鹤年从兄马元德，卒于昌国州任，当其任昌国前，曾任奉化州。刘仁本《羽庭集》卷五有《送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为至正二十二年夏作，则元德之卒，至早亦当在至正廿三四年，而集中有“先兄太守死事之十有七年，于故史董文中家见所题竹诗，因雪涕次其韵”一首，又当在洪武己未后矣。此非元刻，证三。又其第四卷《续集》，为门人向诚编次，注曰“兵后还武昌作”，则此卷更为人明以后作可知。故《挽卫知事胡公鼎》有云“江海论文四十年，故家文物羨君贤”，若为元刻，则元亡鹤年才三十三岁，岂能说论文四十年耶！此非元刻，证四。据《明史·文苑传》，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奉母出走，年仅十八，由此至洪武己未还武昌，中间二十八年，

鹤年年四十五矣。故《逃禅室述怀》有“他乡二十年”之句，《兵后还武昌》有“乱后还家两鬓苍”之句。顾广圻、黄丕烈亦明知此集在还武昌迁葬以后作，顾题词云“须知《海巢集》，只说武昌前”，黄题词云“庐墓全亲孝，居山谢世缘”是也。然何以不考鹤年还武昌庐墓系在何年，而遽断此为元刻，此真不可解矣。其始顾广圻以给黄丕烈，而黄丕烈误信之，其后张金吾以假胡珽，而胡珽刊之校之，皆不复考究，甚矣板本家之不可靠也。

抑有言者，此本戴良序，未署“至正甲午秋”云云，亦殊误也。至正甲午，鹤年才二十耳，而序末云“鹤年之清节峻行，已别有传，兹不著”，是此序之作，尚在《高士传》后，而《高士传》述鹤年事，已至其避地四明时，非至正甲午，一也。《高士传》述壬辰淮兵袭武昌，“鹤年奉母夫人以行。夫人没，鹤年盐酪不入口者五年”，壬辰之后，加以五年，至少亦在丁酉，非甲午，二也。至正甲午，去元亡之年尚十有三年，而序中有“鹤年遭夫气运之适衰”一语，曾谓甲午而有是言耶！非甲午，三也。序又言“鹤年伯氏之登进士第者三人，其一即任奉化州之马元德”。据《雍正浙江志》·五二引《成化四明志》，马元德至正十七年丁酉进士，尚在甲午后三年，非甲午，四也。据《九灵山房集》，此序在《鄞游稿》内，亦惟《鄞游稿》始有与鹤年倡和诗。至正甲午，鹤年未至鄞，戴良亦未游鄞，非甲午，五也。以余考之，甲午当为丙午之讹。丙午为元亡之前二年，时东南已非元有，故可云“气运之适衰”。《九灵山房·鄞游集》八《余幽公手帖后题》云：“至正丙午秋，良与临安刘庸道，同客四明。”末署九月朔，此序之作，当同在此时，时鹤年避地四明，而戴良适游鄞也。《鄞游集》传第一篇，为《高士传》，序第一篇，为《鹤年吟

稿序》，题跋第一篇，为《余圃公手帖后题》。就编辑常理言，此三篇部居同，其撰著之时当同。《余圃公手帖后题》为丙午九月作，此序为丙午秋作，毫无假借。序作于至正丙午，二人适同居鄞，而集则刻于洪武己未鹤年还武昌之后。其丙午误为甲午者，犹之《雁门集·千文传序》之至正丁酉误为丁丑也。至正无丁丑，萨龙光《雁门集注》以为己丑之讹，据日人岛田翰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则丁丑实为丁酉。两回教诗人集序于支均误，可谓无独有偶矣。胡珽校刊此集时，一字不苟，而于此等紧要关目，独遗漏之。其识语又云“此集《四库全书》止有一卷”，今考《四库》本实三卷，而《总目》、《简明目录》误为一卷，不应遽信《总目》而不考阅书之实在也。《四库总目》谬误恒有，乌斯道作《丁孝子传》，未尝以申屠蟠比鹤年，而《总目》谓乌斯道、戴良为作传，皆以申屠蟠拟之。《高士传》谓吉雅谟丁为鹤年从兄，而《总目》谓为鹤年长兄，皆欠精审也。

至鹤年之高行，间世犹称道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十八有《海巢记》，云“残元遗民，以文苑巨子，不屈节，而为吾乡之高公者三人：九灵戴先生良，玉笥张先生宪，暨丁先生鹤年也。鹤年以朝不坐燕不与之身，岂有故国故君之寄托，况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华阀之系望，乃欲以藜床皂帽，支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间世之豪杰也已。至鹤年之诗，颉颃于马伯庸、萨天锡、余廷心之间，则前辈表章已多，尚其小焉者”云。

吉雅谟丁，字元德，亦有诗名。戴良有《题马元德伯仲诗后》（《鄞游稿》八）曰：“元德骑鲸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诗词流落人间者，六丁取之殆尽，独此三诗，犹为其弟鹤年所蓄。鹤年联之为卷，且追书和答之作，并题四韵于后。予得而读之，于是知二君之诗为足传矣。”今《鹤年集》附有吉雅谟丁与爱理沙

诗,爱理沙字允中,亦鹤年兄,至正间进士,官应奉翰林文字。

戴良《鹤年集序》举西域诗人十二人,中有鲁至道。至道潭州路总管,杨瑀《山居新话》有鲁至道《挽樊时中、宝哥两参政诗》,《元诗选》缺载。王逢《梧溪集》有《访鲁至道总管诗》;《元秘书监志》卷九有“伯笃鲁丁,字至道,进士,至正元年四月由礼部侍郎迁秘书太监”,当即此人。《元诗选》癸之丁有伯笃曾丁《浮云寺诗》:“答失蛮人,进士,至元三年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癸之己有唐兀氏买住《和伯笃鲁丁浮云寺诗》,则“曾”为“鲁”之讹,即鲁至道也。

其他回回教诗人之见于《元诗选》者,癸之内有哲马鲁丁,字师鲁,镇江儒学教授。癸之丁有别里沙,字彦诚,《西湖竹枝集》作别罗沙,而癸之戊又别出别罗沙,一人重出也。癸之辛有仇机沙,字大用,顾嗣立疑即《西湖竹枝集》之掌机沙,然掌机沙字密卿,当另一人也。

回回教诗人中有为《元诗选》所不及选,而见于赖良《大雅集》者,曰买间。买间字兼善,《大雅集》选其诗至十篇,称为会稽人,《御选元诗》称为西域人。王逢《梧溪集》卷四有《赠买间教授诗》,序云:买间字兼善,西域人。元初,祖哈只仕江南,遂家上虞。父亦不剌金,力资兼善学,以礼经领至正壬寅乡贡,擢尹和靖书院山长。礼部尚书李公尚纲言之朝,敕授嘉兴儒学教授。会政属淮阕,屏居幽遐。今春,访予最闲园,风雨花落,离索满目。观其志尚孤卓,殆忘世之荐变,身之益贫也,乃酌之酒赠之诗云:

顾叩西域士,乡荐十年前,陇亩心中越,山河枕上燕。  
尊同漂梗地,门扫落花天,暮杀柴桑老,诗题甲子编。

余因其祖名哈只,父名亦不剌金,知为回回教世家。哈只为曾朝天房者之称。亦不剌金或译亚伯拉罕,回回教人恒用以为名也。

#### 四 西域之中国文家

赵世延

马祖常

余阙

孟昉

贯云石

瞻思(亦祖丁)

察罕

考元西域文家,比考元西域诗家其难数倍。因元西域人专集,其传者类皆有诗无文,而元诗总集今传者尚众,如《元风雅》、《草堂雅集》、《大雅集》、《乾坤清气集》、《元音》、《元诗体要》等,皆元末明初人选本,复有陈焯《宋元诗会》、顾嗣立《元诗选》、《康熙御选元诗》等集其大成,一展卷而西域诗人悉备。至于西域人专集之诗文并传者,今只有马祖常、余阙二家。元文总集只有《天下同文集》及《元文类》,《同文集》限于大德以前,西域人作品无有;《元文类》诗有五家,文有马祖常、赵世延二家,赵世延只有《南唐书序》一首。至正间,诏修辽金宋三史,西域人预纂修之役者,《辽史》有廉惠山海牙,《金史》有沙剌班、伯颜师圣,《宋史》有斡玉伦徒、泰不华、余阙,皆一时之雋。至顺间,诏修《经世大典》,赵世延为总纂,虞集为其副,然官书公同编纂,不能确指某篇为某人手笔也。王士禛论马祖常《石田文集》云:“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赵世延、学术鲁翀、康里巎巎、贯云石、辛文房、萨都刺辈,皆是也。”(《居易录》卷二)然萨都刺以诗名,巎巎以书名,其文并不概见。贯云石诗文为程钜夫、邓文原所称述,而文亦不传。

辛文房《唐才子传》，志在谈诗，虽非专意为文，而文尚琅琅可诵。李术鲁翀则系出女直，本不列于色目人，则元西域人之文实寥寥可数也。

赵世延文传者《南唐书序》外，有《茅山志序》，见《道藏》；有《天禧寺碑》，见《金陵古金石考》；有《灵谷寺钟铭》，见《灵谷寺志》；有《钟山崇禧万寿寺碑》，见《客座赘语》。据《寰宇访碑录》，则有：

加封圣号诏碑(皇庆二年) 长安

重阳宫敕藏御服碑(延祐二年，赵孟頫书)

蓝屋(余藏有拓本)

东岳庙昭德殿碑(天历二年三月)大都

白云崇福观碑(元统元年) 句容

任城郡公札思忽儿墓碣(至元三年三月)

济南(《攷古录》作济宁)

《元史》一八〇《世延传》称“世延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惜乎存者不多也。《永乐大典》台字韵有世延撰《御史台题名记》，删节不全。

论西域文家，仍推马祖常。今《石田文集》完全具在，且有影印本行世。苏天爵序称：“公少嗜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文则富丽而有法，新奇而不凿。”故《元文类》选祖常文多至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而《石田文集》亦天爵与祖常从弟易朔所辑，请旨刊诸维扬郡学者也。易朔为基督教徒恒用之名，近译以撒，亚伯拉罕之子，雅各之父也。

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阙。阙以忠烈显，重其人者兼重其文，故《青阳集》传本较多，有五卷本，有六卷本，有明刊九卷本。《四库》本六卷，《总目简明目录》误作四卷。史称其“为

文有气魄，能达所欲言”。原集具在，吾人可自得之。《元文类》不录其文，实因其行辈较晚也。

与余阙同时，同为唐兀人，而以古文名者有孟昉。《元史类编》三六《文翰传》：“孟昉，字天炜，西域人，寓居北平。至正中，由翰林待制官南台御史。工书法，有《孟待制文集》。多歌曲，精究声韵之学”云。《孟待制文集》，《千顷堂书目》尚存。陈基《夷白斋集》：二有序，称为西夏人，《傅与砺文集》卷四有《孟天炜文稿序》，称为河东人，盖唐兀氏也。孟昉文不多见，《元诗选》癸之辛有《十二月乐词》，并序一篇，《两浙金石志》十八有《杭州路重建庙学记》一篇，略可见其梗概。惟余阙、苏天爵、宋褰等集，均有《题孟天炜拟古文后》。《青阳集》卷五云：“孟君天炜，善模仿先秦文章，多似之。”《滋溪文稿》卷三云：“太原孟天炜，学博而识敏，气清而文奇。观所拟先秦、西汉诸篇，步趋之卓，言语之工，盖欲杰出一世。”《燕石集》十五云：“河东孟君天炜，明敏英妙，质美而行懿。尝拟先秦、西汉诸作，摹仿工致，大夫士皆与之。”由此观之，则孟昉古文，实开后来李梦阳、何景明一派，特余阙等对之皆有微词耳。

至贯云石，则本为元古文家姚燧弟子。欧阳玄《贯公神道碑》称：“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惜不永年，年仅三十九。有碑铭、记叙、杂著、诗词行世。”今其文不可得见，仅《元诗选》辑录其诗，读邓文原《贯公文集序》，亦可知其造诣所至。序云：“余往在词林，获事翰林承旨姚先生，于当世文章士，少许可，然每称贯公妙龄，才气英迈，宜居代言之选。越二年，公来游钱塘，过余，相见若平生欢。示所著诗若文，予读之尽编，而知公之才气英迈，信如先生所言，宜其词章驰骋上下，如天骥摆脱羈，一蹕千里，而王

良、造父，为之愕眙却顾。吁，亦奇矣！儒先有言，古之名将，必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不能，此天下伟男子所为，非拘牵常格之士所知也。公之先大父丞相长沙王，功在旂常，公袭其休泽，尝为万夫长，韬略固其素娴，词章变化，岂亦有得于此乎！如予者，自少好为文，仅谨守绳尺自程，终亦不能奇也，视公能不有愧哉！尝观古今能文之士，多出于羁愁草野，今公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夫名者天下之公器也，公亦慎勿多取也夫。”（《巴西集》上）亦倾慕之至矣。程钜夫亦有《酸斋诗文跋》，云：“故勋臣楚国武定公之孙酸斋，皇庆二年二月，拜翰林侍读学士，与余同僚，因出此稿。余读至《送弟之永州序》，恳款教告，五七言诗、长短句，情景沦至，乃叹曰：妙年所诣已如此！听其言，审其文，盖功名富贵有不足易其乐者，世德之流，诃可涯哉！”（《雪楼集》二五）惜今传者诗词而外，文仅《阳春白雪集》一序而已。

元西域人中有著述甚富而文亦不传者，为大食国人瞻思。瞻思事迹具《儒学篇》。其所著，于经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于易有《奇偶阴阳消息图》，于史有《西域异人传》、《金哀宗纪》、《正大诸臣列传》，于地理有《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于子有《老庄精旨》，于法家有《审听要诀》，于集有文集三十卷。皆见《元史》一九〇本传。《千顷堂书目》悉著于录。今存者只《河防通议》二卷，辑于《永乐大典》，余皆不可得见。吾尝在《常山贞石志》发见瞻思文五篇，五篇中关涉佛教者占其三，则瞻思诚九流三教无所不通者也，真可谓异人矣。今介绍其目如下，倘好事者再事搜罗，所得当不止此。



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

获鹿(见《常山贞石志》十九)

哈珊神道碑(隶书,并篆额,至顺三年十二月) 栾城

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并篆额,元统三年二月)

栾城(见《常山贞石志》廿一)

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 正定

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年月同上)

正定(见《常山贞石志》廿二)

《诏书碑阴记》署真定贍思识,《善众寺方丈记》署大食贍思记,贍思不忘大食也。余藏有此碑拓本。善众寺在直隶栾城,《同治栾城志》十四亦载此碑,而《寰宇访碑录》十二误作陕西,元统三年亦误作元年,赵之谦《补录》不误。

元统中有亦祖丁,撰《魏郑公谏录序》,亦回回也。

西域人中有文名不甚显,而能尽翻译之能事者,有察罕。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人,魁伟颖悟,博览强记,通诸国字书。暮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自号。《程雪楼集》卷廿九《寿白云山人诗》,有“白云山人起西域,阳春为心玉为德”之句。“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元史》一三七)前二书译汉为蕃,《圣武开天记》则译蕃为汉也。《脱必赤颜》疑即今所传《元秘史》。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诸书尚存。元人本有白话文一派,察罕所译,未必悉为白话文,今黎澍《安南志略》有察罕序,辞旨典雅,足窥察罕文品一斑。“察罕”蒙古语为“白”,故察罕赐姓白氏。徐明善《芳谷集》卷二有《白云察罕平章赐姓白氏序》,以白居易比之,想其文老嫗都解耶!此亦元

西域文家应备之一派也。

## 五 西域之中国曲家

贯云石

马九皋

琐非复初

不忽木

兰楚芳等(十二人)

元人文学之特色，尤在词曲，而西域人之以曲名者，亦不乏人，贯云石其最著也。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选云石曲至夥，如《塞鸿秋》、《殿前观》、《水仙子》、《清江引》、《凭阑人》、《阳春曲》、《醉高歌》、《上小楼》、《点绛唇》、《新水令》、《斗鹌鹑》、《好观音》诸调，皆有云石作品。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姚桐寿言海盐人以能歌名于浙右，而其始实得自云石之传。其所著《乐郊私语》云：“州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出于潞川杨氏。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所谓州，海盐也。康惠，杨梓也。云石为阿里海涯之孙，云子者，传写讹也。姚桐寿以海盐之曲推杨氏，而杨氏实传诸云石，则云石为当时宗匠可知也。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云：“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酸斋，云石号。选《太平乐府》之杨朝英号淡斋。淡斋与酸斋游，酸斋曰：“我酸子当淡”。遂以号之。语见《太平乐府序》。同时有徐姓者，号甜斋，亦负时名，人称酸甜乐府，皆一时佳话也。

云石而外，西域人中善歌者有马九皋。《太平乐府》选九皋作品亦多，有《塞鸿秋》、《叨叨令》、《庆东原》、《阳春曲》、《山

坡羊》诸曲。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补遗》：“九皋回纥人，以篆书名，太平路总管。”盖能歌兼能篆者也。《太平乐府》又有阿里耀卿、里西瑛、沙正卿、李罗诸人作品。西瑛为耀卿子，观其氏名，疑皆西域人，以未有确证不述。使马九皋而无《书史会要》之证明，亦无由知其为回纥也。元人目中所谓回纥即回回，而回鹘则畏吾儿也，辨见前章，不复赘。《道园学古录》二八有《寄三衢守马九皋》诗，知九皋曾为三衢守，《雁门集》则有《三衢守马昂夫索题烂柯山石桥》诗，又有《寄马昂夫总管》诗，萨龙光注（十二）谓是一人，先为三衢守，后为太平路总管也。《元风雅》有马昂夫《送僧》诗，注曰达鲁花赤，疑即此人。然《元曲选》载涵虚子《词品》，评元代曲家，有云：

贯酸斋如天马脱羈，马九皋如松阴鸣鹤，阿鲁威如鹤唳青霄，萨天锡如天风环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不忽木如闲云出岫，马昂夫如秋兰独茂。

是分马九皋、马昂夫为二人也。

余在周德清《中原音韵》，发见有西域人琐非复初者，精音律，为德清所推服。德清《中原音韵后序》云：“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访西域友人琐非复初，读书是邦。同志罗宗信见饷，携东山之妓，开北海之樽，复初举杯，讴者歌乐府《四块玉》，至‘彩扇歌，青楼饮’，宗信止其音而谓予曰：‘彩字对青字，而歌青字为暗。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声，必欲扬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予因大笑，越其席，捋其须而言曰：‘信哉，吉之多上！’语未讫，复初前驱红袖而自用调歌，曰：‘买笑金，缠头锦，则是矣。’乃复叹曰：‘予作乐府三十年，未有

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复初知某曲之是也。’遂捧巨觞于二公之前，口占《折桂词》一阙，烦皓齿歌以送之，以报其能赏音也。”则德清之倾倒于琐非复初者，至矣。

琐非复初《中原音韵序》亦曰：“余勋业相门，貂蝉满座，列伶女之国色，歌名公之俊词，备尝见闻矣。如大德天寿贺词《普天乐》云：音亮语熟，浑厚宫样，黄钟大吕之音也，迹之江南，无一二焉。吾友挺斋周德清，以出类拔萃通济之才，为移宫换羽制作之具，所编《中原音韵》，并诸起例，能使四方出语不偏，作词有法，皆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以余观京师之目，闻雅乐之耳，而公议曰：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当时之独步也。”末署西域拙斋琐非复初序。

观此，则其一唱一和，互谓知音，相得极矣。琐非复初号拙斋，德清号挺斋，以斋为号，亦当时顾曲家风尚。“勋业相门”云云，琐非复初盖贵介公子，贵介公子与声色狗马之好易近，琐非复初、贯云石之所为，盖开纳兰性德诸人之先例者也。

西域贵介之擅名乐府，而在贯云石之先者，有不忽木。不忽木作品，传者特少，《太和正音谱》仅录其《鹊踏枝》散套，云：

臣则待醉江楼，卧山丘，一任教谈笑虚名，小子封侯，臣向仕路上为官倦守，枉沉埋了锦带吴钩。

《元诗选》癸之乙，仅录其《过赞皇五马山泉》七绝一首，云：

相彼山泉源本清，太平君子濯尘缨。泠泠似与游人

说,说尽今来往古情。

虽一爪一鳞,然流丽可喜。涵虚子《词品》比之为闲云出岫,必有所见也。钟嗣成《录鬼簿》以与贯云石、萨都刺并称,特许为公卿居要路者所独擅,而深致不满于平民。其言曰:“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不忽木平章、贯酸斋学士等三十一人。方今名公,萨天锡照磨等十人。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学,而歌曲词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自有乐章以来,得其名者止于此。盖风流蕴藉,自天性中来,若夫村朴鄙陋,固不必论也。”钟嗣成盖以歌曲词章之事出于天才,惟贵介为易得名。而元时贵介,西域人特多,此西域人所以在元朝文学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也。

永乐间,贾仲明撰《录鬼簿续编》,尚有西域曲家多人,曰兰楚芳、沐仲易、虎伯恭及其弟伯俭、伯让,西域人。丁野夫、赛景初,回回人。全子仁,名普庵撒里,委兀儿人。月景辉、金元素,名哈刺,及其子文石、武石,也里可温人。乐府皆有名。

## 卷五 美 术 篇

### 一 西域之中国书家

廉希贡等(二十五人)

巖巖

秦不华

贯云石

余阙

盛熙明

贈恩

賽景初(沐仲易、虎伯恭)

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元人主中国不及百年,色目人醉心华化,日与汉字相接触,耳濡目染,以书名当世者大不乏人。欲考此种事实,比他篇为易,以有元末人现成之《书史会要》,具载历代书家,直至于元,略为钩稽,即可知西域人能书者有若干人,不劳遍览群籍也。兹将《书史会要》中元时西域书家钩稽如下,其有色目误为蒙古者并附正之。

“廉希贡,字梦林,畏吾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善匾榜大字。”

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作于阗人。

“贯云石，北庭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豪爽有风概，富文学，工翰墨。其名章俊语，流于毫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滞于物，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矣。”

“余闾，武威人。登进士第，官至浙东肃政廉访司副使。风采峭整，工篆隶，字体淳古。”

“盛熙明，其先曲鲜人，后居豫章。清修谨饬，笃学多材，工翰墨，能通六国书。至正甲申以所编《法书考》八卷进，上览之彻卷，命藏禁中。”

“甘立，字允从，河西人。官至中书检校。才具秀拔，亦善书札。”

“巉巉，号正斋、恕叟，康里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风流儒雅，博涉经史，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谓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

“回回，字子渊，巉巉弟。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正书宗颜鲁公，甚得其体。”

回回系巉巉兄，回回生至元二十年，巉巉生元贞元年，此云弟者，误也。

“阿尼哥，字西轩，蒙古人。官至大司徒，善大字。”

《元史·方技传》作尼波罗国人。《新元史》误作阿尼哥尼。

“秦不华，元名达溥化，御赐今名，号白野，蒙古人。状元及第，官至浙东宣慰元帅。以清厉显名，骨鲠不同于物。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行笔亦圆熟，常以汉刻题额字法题今代碑额，极高古可尚，非他人所能及。正书宗欧阳率更，亦有体格。”

泰不华,伯牙吾氏,是色目,非蒙古,辨见《儒学篇》。元顺帝后燕铁木儿女钦察氏(《元史》一一四),据《燕铁木儿传》(《元史》一二八)称女为伯牙吾氏,是伯牙吾氏乃钦察也。曾康《元书》卷八二直书曰泰不华钦察人。

“斡玉伦都,字克庄,西夏人。官至山南廉访使。文章事业,复出人表,书迹亦佳。”

“萨都刺,回纥人。官至淮西廉访司经历。有诗名,善楷书。”

“道童,字石岩,蒙古人。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姿仪雄伟,尤工大字,能作双钩书。”

《元史》一四四作高昌人。

“庆童,字正臣,康里人。官至中书右丞相。器量弘重,善大字。”

《元史》一四二字明德。

“沙刺班,字惟中,蒙古人。官至集贤大学士。善大字。”

《元史类编》三十六:“沙刺班,字敬臣,号山斋,畏吾人。顺帝时学士。能诗文,兼工大字。”疑即此人。

“达识帖木儿,字九成,康里人。官至江浙行省丞相。知读书,能诗,大字学释溥光,小字亦有骀力。”

“伯颜不花的斤,字苍岩。高昌国王子,鲜于太常甥。官至江东廉访副使。介立不群,草书似其舅氏。”

《元史》一九五《忠义传》:“字苍崖,畏吾儿氏。”

“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温人。官至海北廉访使。笃志坟籍,至于百氏数术,无不研览。书宗二王。”

“荣僧,字子仁,回纥人。登进士第,官至江浙行枢密经历。楷书师虞永兴。”



“喜山,字近仁,畏吾人。官至集贤都事。工书。”

《佩文书画谱》三十六引,误作进仁。

“隐也那失理,字处元,畏吾人。楷书学虞永兴。”

右二十人,见《书史会要》卷七。

“边鲁,字鲁生,邳下人。工古文奇字。”

据《西湖竹枝词》,知为北庭人。

“马九皋,以字行,回纥人。官至太平路总管。能篆书。弟九霄,亦能之。”

“哈喇,字元素,也里可温人。登进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辞,书宗巉正斋。”

《录鬼簿续编》作“金元素,康里氏,名哈刺。随元驾北去,不知所终”。

“赵夫人鸾,字应善,雍古部氏。中书平章世延女,中书参政许有壬室。朗惠厚静,能琴书,善笔札。”

据陈旅撰墓志铭,字善应。

右五人,见《书史会要补遗》。

元代西域书家略备于是。观其次第,大约不依时代,随手记录,如余阙在巉巉之前是也。西域人书名,巉巉最盛,《元史》一四二本传称巉巉书“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式古堂书考》二十载张灿《赵巉二公翰墨歌》,有云:

元朝翰墨谁擅场,北巉南赵高颀颀,二公才名盖当世,片楮传播如珪璋。予山学士位馆阁,天水王孙登玉堂,官居位望正相似,后先双璧联辉光。

北嶠南赵系当时通称,然嶠书实不如赵,其有此称誉者,半因位望甚高,半因系出西域,希有可贵也。嶠嶠墨迹及碑刻传世者,亦远不如赵之众。《式古堂书考》十七著录者,有:

十二月十二日帖。

临怀素自叙卷。

书梓人传卷。

《三希堂石渠宝笈》二十三册有:

渔父辞。

颜鲁公书论。

皆有声于时者也。然其碑刻之见于《寰宇访碑录》十二者,有:

赠礼部尚书晁公神道碑(无年月) 山东郛城

大都城隍庙碑(至顺二年) 直隶大兴

敕修曲阜宣圣庙碑并碑阴题名(至元五年十一月)

山东曲阜

赠江南行省参知政事张思忠碑(至元六年九月)河南巩县

与王由义书(至正元年) 陕西朝邑

王氏世德碑(至正元年) 陕西朝邑

集庆路卞将军新庙记(至正五年十一月) 江苏江宁

少林寺达摩大师碑(至正七年) 河南登封

王节妇碑阴清风篇(无年月) 浙江山阴

共九种。其见于吴式芬《搃古录》十九者,有:

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杨载墓志(泰定三年) 江苏吴县

飞骑尉杨君世庆碑(元统二年二月) 河南浉池

中顺大夫竹温台碑(至元元年) 乌兰城(城原作坡)

中顺大夫达鲁花赤□公碑(至元四年五月) 乌丹城

佛慧圆明正觉普度禅师断崖义公塔铭篆额

(至元六年三月)

浙江□□

慕容氏先茔碑篆额(至元六年五月)

山东城武

共六种。倘全拓而影印传之,亦一美举也。

嶧嶧,康里部人,康里为术赤所封地,在咸海北岸,今为南俄罗斯地。时人尝仰慕俄国文学,岂知此间六百年前,乃有多数邃于华学之人耶!

然须知嶧嶧等之得名,用力至深,用功至勤,非浪得时名者比。《山居新话》、《辍耕录》十五均载有嶧嶧与客问答一则,云:“江浙平章子山公,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其精力如此,实为可惊,不知今日青年闻之作何感想也。

泰不华,伯牙吾氏。伯牙吾一作白野,故泰不华恒自署白野泰不华,人亦称为白野尚书。苏天爵《滋溪文集》三十有《题泰不华自书所作诗后》云:“白野尚书,向居会稽,登东山,泛曲水,日与高人羽客游。间遇佳纸妙墨,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清标雅韵,蔚有晋唐风度。予犹及见尚书先考郡侯,敦庞质实,宛如古人,而于华言尚未深晓。今有子如此,信乎国家文治之盛,而贡举得贤之效,益可征焉。”读天爵此文,可证元时西域人同化之速。始予研究此事,以为西域人同化中国,必其人入居中国已一二世,或百数十年。今观天爵所言,则泰不华之父尚纯然西域人,华言尚未深晓,而其子乃能邃于华学若此,可见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为大。天爵归功于贡举,特皮毛之论耳。嶧嶧、贯云石何尝出于贡举也。惟泰不华遗迹之传于今者,比嶧嶧更少。近年海上有珂罗版印《元八家法

书》，中有泰不华行书《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七言律一首，为《元诗选》、《顾北集》所未载。诗云：

昔年曾到楚江干，探得骊珠振锡还，忆著匡庐成独往，眼中泰望共谁攀。声华牢落金闺彦，烟雨凄迷玉笥山，绝代佳人怜庾信，早年词赋动天颜。

风华掩映，可称美绝，不知何人所藏。《寰宇访碑录》十二有泰不华所书碑四通：

- 一、重修南镇庙记，八分书（至正四年四月） 浙江山阴
- 二、重建凤山上乘寺记（至正七年八月） 浙江上虞
- 三、祈泽治平寺佛殿碑（至正九年四月） 江苏上元
- 四、即王节妇碑，篆书，其碑阴巉巉书也。 浙江山阴

泰不华并通小学，善篆隶，温润遒劲，尝重类《复古编》十卷，《元史》一四三本传称其“考正讹字，于经史多有据”。《御选元诗》五六载郑韶赠泰不华诗，有句云“古篆久知通史籀，新诗端拟过黄初”，其才华之美可想。泰不华篆额见于《橐占录》卷十九及二十者有：

- 觉苑寺兴造记（至正三年三月） 浙江萧山
- 重建儒学记（至正五年七月） 浙江会稽
- 重建旌忠庙记（至正七年） 浙江会稽
- 重修鄞县学记（至正九年九月） 浙江鄞县
- 重修后土庙记（至正十一年七月） 陕西渭南
- 重修后土祠记（至正十四年） 拓本

贯云石亦工书，陈基《夷白斋外集》卷下跋其书《归去来辞》云：“酸斋公如冥鸿逸骥，不受增缴羁勒，而其蝉蜕秽浊，逍

遥放浪,而与造物者游,近世盖未有能及之者。其自谓平日不写古今人诗,而独慕陶靖节之为人,书其《归去来辞》。观者殆不可以寻常笔墨蹊径求之也。”

余阙篆亦有名,宋濂《芝园续集》卷六《题余阙篆书后》云:“右四大篆,幽国忠宣公余阙为浦阳戴君叔能书。至正九年,公持使者节来镇浙部,濂偕叔能往见,公奖励甚至,且各书斋扁为赠。公文与诗,皆超逸绝伦,书亦清劲,与人相类。其忠义之气,可以惧乱贼、清恶厉,虽所书不工,犹当传之万世,况能臻其妙者乎!此纸所在,定有神物呵护,不可徒以翰墨视之。”《佩文书画谱》三八引《紫桃轩又缀》云(崇祯本《又缀》无此语):“余忠宣小字似不经意,而丰处有褚遂良,潦倒处有杨景度、林藻,岂漫不留意于墨池者所能符合邪!”书以人重,美者固美,即不甚美者,即将以景仰之意而美化之矣。

西域人中有著书专论书法者,龟兹盛熙明也。熙明以能书辟奎章阁书史。著《法书考》八卷进呈,清《四库》著录,《棟亭十二种》刻之,卷首有虞集、欧阳玄、揭傒斯三序。揭序称“盛氏之先,曲鲜人,今家豫章”。《书史会要》之说即本于此。《道园学古录》卷三有《题东平王与盛熙明手卷》诗,作“曲先盛熙明”,《元史类编》三六误曲鲜为鲜卑。欧阳序谓“熙明为龟兹人。刻意攻书,而能研究宗原,作为是书。运笔之妙,评书之精,非老于斫轮者,畴克如是”云云。夫以西域人而工中国之书,已属难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为成书,以诏当世,岂非空前盛业乎!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有是书跋,称“其文约,其旨该,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云。熙明并学佛能诗,著《补陀洛迦山考》,见《道光普陀山志》十五,《元诗选》癸之壬,录其《游补陀洛迦山》七言律一首。龟兹本佛国,其学佛

固不奇也。

元时西域人能书，而《书史会要》不载者，有贍思。张相文先生曾示我《哈珊神道碑》，请为之跋，盖贍思所撰并八分书也。体势波磔，用力极深，而竟无书名，其书名为文名所掩也。

《录鬼簿续编》称：“赛景初，天性聪明，幼从巉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屡嘉之。”又：“沐仲易，西域人。故元西监生。工于诗，尤精书法。”又：“虎伯恭，西域人。诗学韦、柳，字法献、羲”。皆《书史会要》所未载者。

## 二 西域之中国画家

边鲁

高克恭

伯颜不花

丁野夫

萨都刺

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以元版图之大，即有西域画家挟罗马、波斯、土耳其之画法，以显于中国，如清之郎世宁、艾启蒙者，亦并不奇；然此之所谓画家，乃中国画法，非西域画法，故不曰西域画家，而曰西域之中国画家也。考元代画家，亦有极现成之书，即元夏文彦之《图绘宝鉴》，其叙述历代画家，直至元季，与陶宗仪《书史会要》相同。今特钩稽其卷五中西域人善中国画者，以张吾西域人华化之说。

“边鲁，字至愚，号鲁生。善画墨戏花鸟。”

“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其先西域人，后居燕京。官至刑部尚书。善山水，始师二米，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琐泼染，作者鲜及。”

“伯颜不花，高昌世子，鲜于伯几甥，号苍岩。官至江东廉访副使。工画龙。”

“丁野夫，回纥人。画山水人物，学马远、夏圭，笔法颇类。”

边鲁，北庭人。据《西湖竹枝集》，鲁善古乐府诗，尤工画花竹，权贵人不能以势约之，《书史会要》并称其工书也。

元时画家有大名，能与赵孟頫抗行者，惟高克恭。克恭兼有诗名，《元文类》选西域人诗五家，马祖常外，选高克恭诗比三家特多。《辍耕录》二六《诗画题三绝》一条云：“高文简公一日与客游西湖，见素屏洁雅，乘兴画奇石古木，数日后文敏公为补丛竹，虞文靖公题诗其上，有‘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元诗选·房山集》小传误称为赵孟頫诗）。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等句，此图遂成一绝。”以高配赵，正与书家之以巉巉配赵相同。元朝书画，推赵独步，然与赵颀颀者，书画皆西域人，亦足见元西域人天资学力，不让汉人也。董其昌对于以高配赵之说，初颇怀疑，后乃翕服，试观《画旨》所述，前后持论不同。

《画旨》云：“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此数公评画，必以高彦敬配赵文敏，恐非耦也。”而其后又云：“高彦敬尚书，载吾松《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孙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尚书之云孙女也，余好为山水小景，似亦有因。胜国名手，以赵吴兴为神品，而云林以鸥波、房山所称许者，或有异同，此由未见房山真迹耳。余得《大桃村图》，乃高尚书真迹，烟云淡荡，格韵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梦见也。”又云：“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独推重高彦敬，如后生事名家，而倪迂题黄子久画云，虽不能梦见房山，特有笔意，则高尚书之品，几与吴兴埒矣。”

初则曰“高与赵恐非耦”，再则曰“未见房山真迹耳”，三则

曰“高之品几与吴兴埒矣”，终更推为“古今一人”，曰：“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独高彦敬兼有众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今将高克恭画之见于元人题咏者，略举其目如下：

桑落洲望庐山图	云林烟峰图	越山图
山村图	夜山图	秋山暮霭图
墨竹图	青山白云图	沧洲石林图
仿老米云山图	烟岭云林图	山村隐居图
秋山过雨图	春云晓霭图	墨竹坡石图
云山双鹤图	越山春晓图	

其尤习见者，为《夜山图》及《秋山暮霭图》二帧，当时有名诗人，题咏殆遍。盲诗人侯克中亦有二绝句，《夜山图》云：“幽人清夜思高闲，误落龙眠笔研间。万仞峰峦千里月，广寒宫里看三山。”《越山春晓图》云：“满目烟岚满意春，江山如画画如真。岩岩万壑千峰秀，可惜中间无一人。”见侯克中所著《艮斋诗集》卷上，所谓无目者且知其姣也。今故宫博物院所藏高克恭画，为吾所见者，尚十余轴，虽真伪一时莫辨，然已震而惊之矣。邓文原《巴西集》卷下有《尚书高公行状》，述克恭生平行谊至详，称其“画墨竹妙处不减文湖州，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乃用李成、董源、巨然法，造诣精绝。公卒后，购公遗墨者，一纸率百千缗。”其为时见重如此。其画纯中国法，且为米氏父子以来之变法，与带有匠气之界画，迥然不同。其为诗亦不尚钩棘，自得天趣，柳贯《待制集》十八《题姚子敬书高彦敬绝句诗后》有云：“高公画人能品，故其诗神超韵胜，如王摩诘在辋川庄，李伯时泊皖口舟中，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



秀之气。”胡应麟《诗薮外编》六云：“宋以前诗文书画，人各自名，即有兼长，不过一二。胜国则文士鲜不能诗，诗流靡不工书，且时旁及绘事，亦前代所无也。”高克恭即诗画兼长之一人。

然克恭究为西域何许人，亟欲研究之，惜书阙有间矣。据邓文原《高公行状》，已言“谱牒散佚，莫迹其所始”，然尚知其祖名乐道，父名亨，字嘉甫。观其命名，知其受华化已深。又言“嘉甫力学，不事权贵，朝夕讲肄，遂得大究于《易》、《诗》、《书》、《春秋》及关、洛诸先生绪言”，则俨然儒者也。“克恭早习父训，于经籍奥义，靡不口诵心研，务极源委，”则亦纯然儒者也。然克恭之婿为乌伯都刺，乌伯都刺者何人？泰定帝时中书平章政事，文宗朝所目为奸臣者也，此元朝家事，吾人今日正不必为左右袒。惟《元史》不为乌伯都刺立传，乌伯都刺事迹仅散见于本纪及宰相表中。乌伯都刺为回回人，其父益福的哈鲁丁，有大勋劳于回回文字，此研究元朝文化史者不可不注意之事也。《元史·释老传》：世祖至元六年以前，施用文字悉用汉楷及畏吾儿字。六年颁行蒙古新字，凡玺书颁降，并用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选举志》言至元二十六年，尚书省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参《百官志》）。黄潜《金华文集》卷八《翰林国史院题名记》云：“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并教习于本院，今回回学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试综合此种史料，则知元初只用畏吾儿字及汉字，至元六年始颁行蒙古新字，至元二十六年又以与西域诸国

交通频繁,始置回回国子学,教习亦思替非文字。文宗以后,中央势力大衰,西北三藩渐失其统驭能力,交通几乎断绝,而亦思替非之用亦稀,故以待制兼掌之,而回回学上亦省也。盖元制文字用途之区别,虽以蒙古新字为主,而不甚通行,有所颁布,须各以其国字为副。大抵汉字用于中国本部,畏吾儿字用于葱岭以东,亦思替非文字用于葱岭以西诸国也。亦思替非简称亦思替。《元典章》吏部一,正七品官有教习亦思替文字博士,吾始疑亦思替为粟特之异译。粟特国见《魏书·西域传》,粟特语唐以前盛行于中亚细亚,回教兴后,波斯语渐代之。亦思替非又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未知所谓回回国子学者,是否与波斯文字有关。益福的哈鲁丁既能通其字学,为回回国子学开始教授之一人,则必大有勋劳于元时回回文字者也。

益福的哈鲁丁《元史》亦无传,何以知为乌伯都刺之父?则据程钜夫《雪楼集》卷二有乌伯都刺三代封制,乌伯都刺祖为札刺鲁丁,曾祖为木沙刺福丁,皆回回人名。《四库》本改乌伯都刺为额卜德喀勒,改益福的哈鲁丁为伊卜德喀罗丹,不知作何语矣。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即后有发见,亦可信其无误。倪瓒《清閼阁集》卷九云:“高房山清节雅尚。有马先生,亦其国人,遂号彦敬,盖司马慕简之意。”所谓马先生者,疑亦回回国人。《清河书画舫》“绿”字号曰“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未知何据。《内阁书目》三谓“高文简公名亨”,亦误,应作父名亨。《四库总目》以高克恭为金人,反讥《云艺圃集》载入元诗为失断限,尤荒谬。今所欲知者,为高克恭本身是否仍守回回教是也。据邓文原《高公行状》:“克恭卒之日,命丧葬用朱文

公法,此心不以生死乱,众谓讲学之验”云。则克恭已弃回从儒者也。然吾细察邓文原所著行状,有为克恭隐饰意,应用“回回”处,辄易以“西域”,此元代文人习惯,其实系出回回,有何可讳。释大欣《题高彦敬墨竹》云“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蒲室集》),柯九思《题秋山暮霭图》云“三代以来推盛世,九州之外有斯人”(《丹丘生稿》),周伯琦《题青山白云图》云“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式古堂画考》十七),危素《题高房山画》云“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铁网珊瑚》卷二),凡此皆不能忘其为西域人,而未闻有以“回回”二字入诗者。西域之名,出于汉以前,回回之名,起于晚近,贵远贱近,人情然也。

谓丁野夫为回纥人,亦此意。元人公牍文字多从俗用回回,至于士夫执笔为文,则辄易回回为回纥,以回纥之名较古雅也。朱德润《题高彦敬房山图》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存复斋集》卷十),其例也。迺贤合鲁人,而必称之为葛逻禄者,亦用唐以前名也。今吾人目中又与元人异,回回系指伊斯兰教徒,回纥则北方一种族,曾有功于唐,改名为回鹘,高昌、北庭其余裔也,元人谓之畏吾儿,边鲁、伯颜不花其人也。据《绘事备考》,边鲁作品有《群鸦话寒图》、《芦汀宿雁图》、《水墨牡丹图》等,皆中国画,非西域画。伯颜不花以龙名,《绘事备考》载有《袞雾戏波龙图》、《坐龙图》、《出山子母龙图》、《戏龙图》等,亦中国画所特有也。

元西域人无画名而有画传于世者,故宫博物院有萨都刺《严陵钓台图》一轴,又有《梅雀》一轴,为延祐二年春写,并题句云“香满疏帘月满庭,风檐鸣铁研池冰。夜寒人静鸟禽语,却忆罗浮雪外登”,颇有高致。

### 三 西域人之中国建筑

#### 也黑迭儿燕京宫阙

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顾吾国言建筑者向无专书，而元西域人建筑之存于今者尤罕。广州之怀圣寺塔，修于至正十年，有郭嘉为之记，见《道光南海志》廿九；泉州之清净寺塔，修于至正九年，有吴璆为之记，见《闽书》七；杭州有真教寺，延祐间建，见《西湖游览志》十八；四明有礼拜寺二，延祐以后建，见《至正四明续志》十，略可代表元时回回教建筑。镇江有也里可温寺八，杭州有也里可温寺一，至元十八年以后建，见《至顺镇江志》九及《西湖游览志》十六；甘州有十字寺，见《元史》三十八；扬州有十字寺，见《元典章》三十六，略可代表元时基督教建筑。泉州华表山有摩尼教草庵，见《闽书》七，略可代表元时摩尼教建筑。然此诸建筑，今多不存，即存，亦只可谓为西域人建筑，不可谓为西域人之中国建筑。

元时西域人中国建筑，有极伟大而为吾人所未经注意者，无过于今北京之宫殿及都城，虽以朱彝尊之该博，而《日下旧闻》略之；虽以孙承泽之熟语掌故，而《春明梦余录》亦略之，非有所讳言，即从来轻视工程学者之故也。予近从欧阳玄《圭斋集》卷九《马合马沙碑》发见元时燕京都城及宫殿，为大食国人也黑迭儿所建。也黑迭儿为马合马沙之父，父子世绍元工部事，以大食国人而为中国如许工程，实可惊也。碑云：

也黑迭儿系出西域，唐为大食国人。世祖即祚，命董茶迭儿局，茶迭儿云者，国言庐帐之名也。至元三年，定

都于燕，八月，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官殿。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表。也黑迭儿受任劳勩，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胼胝，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冬卿抡材。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釐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绶虎飞檐，具以法。岁十二月，有旨命光禄大夫安肃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祐，暨也黑迭儿同行工部，修筑宫城。乃具畚鍤，乃树桢干，伐石运甓，缩版覆簷，兆人子来，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绳，其坚凝金，又大称旨。自是宠遇日隆，而筋力老矣。

也黑迭儿《元史》无传，《世祖纪》记修筑宫城事，只称“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而不及也黑迭儿。故自昔无人知有也黑迭儿也。辽、金故城，在今城西南，至元迁拓东北，分十一门，东西南三面皆三门，北二门。至明乃大杀其北面，而稍拓其南面，东西各留二门，故至今九门，其面积已不若元时之大矣。然今人游北京者，见城郭宫阙之美，犹辄惊其巨丽，而孰知筚路蓝缕以启之者，乃出于大食国人也。也黑迭儿虽大食国人，其建筑实汉法。《元史》一二五《高智耀传》言：“西北藩王遣使人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此即建筑燕京时，西北藩王所来之质问也。然何以当时宫阙必用汉人制度，则以元起朔漠，所居者特庐帐耳。也黑迭儿所典之茶迭儿局，即掌庐帐者。使以当王为贵，则庐帐实贵于宫阙，而元人自知庐帐之陋，不如汉

家宫阙之美,故虽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则不能不改从中原制度,所谓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审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故不惜舍庐帐而用宫阙。也黑迭儿深知其意,故采中国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内之规模,夫如是庶可慑服中国人,而不虞其窃笑矣。《辍耕录》……有《宫阙制度》一篇,垂四千五百言,《知不足斋丛书》有《故宫遗录》一篇,垂二千六百余言,述元时宫阙规模,宏伟极矣。吾人读欧阳玄文,既知为也黑迭儿所为,今日不能不以此光荣还诸劳力劳心之原主。虽当时行工部尚书者不止一人,元制,工部尚书三员,正三品,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然张柔为张弘范父,《元史》一四七有传,武夫不谙工事,且翌年即卒,未睹其成,可无论矣。段天祐《元史》亦无传,仅一七七《吴元珪传》有云:“至元二十六年,缮修宫城,尚书省奏役军士万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陈其不便。乃立武卫,缮理宫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挥使。”知段天祐亦武人,至元三年与也黑迭儿修筑宫城后,二十六年复修宫城,曾任大都留守司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卷八六:“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掌修治城隍及京师内外工役之事。”(参《兵志》)此段天祐之职掌也。而也黑迭儿则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元史》卷八五《百官志》:“茶迭儿局总管府,秩正三品,管领诸色人匠造作等事。”“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艺。”试以二人职掌相比勘,则段天祐犹今步军统领,而也黑迭儿则土木工程局长也。且也黑迭儿四世领茶迭儿局,授工部尚书,倘非工程世家,曷克有此。欧阳玄碑中所论,亦专以考工为言,而深赞其建邦之能,世官之美。试登景山一望,

当时之泱泱风度,恍惚犹在目前,而《元史》遗之,至创造主名,竟归湮没,不有此墓前片石,则也黑迭儿之心血,不与草木同腐者几希。即云谀墓之文,恐有溢美,然世领工部,何能捏造。《新元史》一一三为之补传宜矣,惟尚嫌未能发挥也黑迭儿建筑之精神,窃以为应置诸《方技传》之首也。且《氏族表》作也黑,传与目作也里,亦应改正。

旧史《世祖纪》:“中统四年三月,亦黑迭儿丁请修琼花岛,不从。至元元年二月,修琼花岛。”亦黑迭儿丁即也黑迭儿,丁为回回人名常用之尾音。琼花岛即今北海。当未修筑宫城之先,也黑迭儿曾请修北海,此又《圭斋集》所未言,而足证其为工程学者也。

《元典章》刑部三《阑入禁苑》条,有监修官也黑迷儿丁呈,捉获跳过太液池围子禁墙人楚添儿一事,状招于六月二十四日带酒,见倒讹上墙,望潭内有船采打莲蓬,跳过墙去,被捉到官云云。此事有月无年,当系至元间修琼花岛时事。惟“迭儿”作“迷儿”,想是误字也。

《四库总目·政书类》存目考工之属,有《永乐大典》本《元内府宫殿制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称其记元代门廊宫殿制作甚详,而讥其词“鄙俚冗赘,不类文士所为,疑当时营缮曹司私相传授之本。”惜其书不传,或即也黑迭儿之徒所撰未定,固不能以文士之文绳工程学者也。

## 卷六 礼俗篇

### 一 西域人名氏效华俗

鲁古讷丁	沙的行之	木撒飞
玉元鼎	合刺思	米少尹
咬思永	札马鲁丁	怯里木丁
拜住(刘君定、李公敏、赵荣)	刘因反对种人效汉姓	
吴海反对汉人冒国姓	里氏庆源图	
浦氏定姓碑文		

赵翼《廿二史劄记》三十有《元汉人多作蒙古名》一条,以为“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名,亦多仿之。且元制本听汉人学习蒙古语,惟其通习,故汉人多以蒙古语为名,一时风会使然也”。然以余所考,则与此所论适得其反。试一检元人文集,种人之请字请名者触目皆是,其人皆慕效华风,出于自愿,并非有政府之奖励及强迫,而皆以汉名为荣。且元制不禁种人学习汉文,故种人多以汉语为名,亦一时风会。廉希宪、郝天挺、高克恭、赵世延、马祖常、颜师圣、丁鹤年等无论矣。安熙《默庵文集》卷四有《御史和利公名字序》。



篇,云:“近世种人居中国者,类以华言译其旧名,且或因名而命字焉,是虽非人道所当先,而亦古人遗意也。监察御史鲁古讷丁,系出奈蛮和利氏,历监浚、邳两州(《畿辅丛书》本作“西州”),惻怛爱民,兴学礼士。既终,家居待次,益自力问学,以求其所未至。间从予游,刻意清苦,吾党之士,鲜能及之。于其请字也,为取《崧高》之诗,所谓‘戎有良翰,文武是宪’者,以良翰易其名,且以《周书》‘乱为四辅’之语,合而字之曰宪辅。”盖亦因其旧名,而又因名以制字也。未署大德甲辰著。是大德八年以前,西域人已多有华名者,故篇首云云也。

吴澄《文正集》字说更多,凡八十余篇,其中西域人请字者(卷五),有《沙的行之字说》,云:“上古有名而无字,质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九州之内尚文,则如中古之后;九州之外尚质,则如上古之时,其俗之不同也旧矣。皇朝区宇之广,鸿濛以来所未有,九州内外,靡不臣属,合诸国诸郡而为一,盖各从其俗,而莫之或同者也。建康贰侯沙的公,西北贵族,其治所至有声,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从中夏之俗。夫所贵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之礼法可慕也,所慕乎周公、孔子之礼法者,以行之为贵也,慕之切而行不继,则虚文耳,尚文而虚,不若尚质之实也。行之之行,既取信于同列,行之之字,非直侔其名而已,抑亦表其实云。为之书者吴兴赵子昂,为之说者临川吴澄也。”此则以汉名为荣,既请名人为之说,复请名人为之书,虽非出于君主之赐,而出于同人之赐,其奖励盖在社会不在政府。故一方政府以蒙古名赐汉人,而热中利禄者趋之;一方社会以汉名赠色目人,而醉心文化者亦赴之也。

《吴文正集》卷六又有《崇仁县元侯木撒飞仁甫字说》,于此义尤显,几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之意。曰:“崇仁夙称壮

邑,生齿之繁,习俗之美,他县莫及。木撒飞承务郎自州倅升县长,前时足迹不到江南,而莅政以来,凡所施設,无一不使民悦服,咸曰仁哉元侯,二三十年所未有也。侯慕效华风,欲立字以副其名,夫字者匪但副其名而已,盖将表其德也,于是表其可表之德,而字之曰仁甫,喜崇仁县之得此仁侯也。”木撒飞纯然为一回教人名,因其治化之美,而以中国之唯一美词字之,褒之也。

同集同卷,又有《玉元鼎字说》,元鼎一学者,盖先有汉名,而欲就其名以取得训海之义,亦近取诸身之法也。澄之言曰:“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剌,从太祖皇帝出征,为勋旧世臣,名载国史,今其苗裔,乃能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可谓有光其先者矣。以其字而请教训之辞,予语之曰:鼎者重大之器,其在于《易》,巽下离上之卦为鼎,盖取卑逊于内,文明于外之义。卑逊者进德之基,文明者进学之验,进德在于克己,进学在于穷理。元鼎读《大学》、《论语》,其习所谓穷理克己,实用其力而已。笔之为《元鼎字说》以赠。”此则望文生义,而致劝勉之词者也。

王恽《秋澗集》四六亦有西域人字说,而皆以“英甫”字之。其一为《忽治中名字说》,曰:“予官御史时,闻今治中别乘合剌思,喜功名,乐善言,而与上君子游。至元壬申秋,得同僚平阳,相接如平生欢。一日请名于予,君姓忽氏,盖父字也,世为唐瀚海军都护府人,其国郊于乾兑之间,其人多沈潜刚克,内明而外毅。吾子秉彝奇特,表著于一时,故以德辉名君,而英甫字之。盖英者德之光发见于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称也。”

其二为《米少尹名字说》,曰:“剑倅米君,世为西域人。性开敏,乐于为善。予过剑浦,米来求名,因训之曰闾。闾者生

其善心，显其可践迹也，内不先开，英何为而发，故字曰英甫。”末署庚寅九月十二日。至元庚寅上距至元壬申凡十八年，而两西域人先后求名，皆以英甫字之，未知其偶合耶？抑以为同是西域人，特取前时所以字西域人者字之耶？

许有壬《至正集》六五亦有西域人字说，其一为《咬思永字说》，曰：“西域生咬，大父尝持宪数道，世赏在咬，自以年未及，学未充也，日种学绩文，非儒生不交，纨绔气习，濯刮殆尽。予与其外舅和叔监郡游，时从过于，俾赋诗，每俄顷成，且清丽不苟。暇日请曰：‘咬幸承下风，昆季为华学，率以思冠其字，先生幸字之。’予观世之人，习于近而不究其远，徇于短而不求其长，天下之通患也。若世家子，则此疾尤痼，盖不知思永之过也。《书》不云乎，‘慎厥身修思永’，故从其昆季之以思为字也，而以思永字之。”凡元人所谓纨绔气习者，大抵指武功起家之色目人而言，未有指以诗书致卿相之汉人也。故其人多不学，而咬则尽反其故习，非儒生不交，可谓有华学之癖者矣。

其二为《丁慎之字说》。丁慎之者，中书省玉典赤，玉典赤者，服役人也。非勋阀而执贱役，无所谓纨绔气习矣，而习闻诸先生绪论，亦爱慕华风。许有壬曰：“中书玉典赤从予最久者，西域札马鲁丁，慎而寡言，若诗书渐习之有素者。再拜请曰：‘细人世西域而生中国，又得亲公之教，幸阅而训之字，得服以自励。’予素爱其人，且服役几年，所直几官，而独有见于吾辈，其可进也。于是即其人之长，字之曰慎之，且语之曰：‘若知慎之为义乎？慎于言而言无过，慎于行而行无失，无所往而不慎，则将进乎善而为成德之君子矣。’慎之其益慎之哉！”

王沂《伊滨集》十七亦有《西域人怯里木丁字说》。以玉为

西方之物，遂取以名其人，不知古所谓出玉之国，实指于阗，于阗在葱岭以东，其去波斯、大食，尚较去中原为远也。曰：“监深州郡怯里木丁，西域人，世居什纳什勒国。唐初西域主阿喇愈氏，始用其国言撰字修书，以教其人。怯里木丁之先，有能通其书与字者，故因其地而赐姓什纳什勒。国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某，以技艺故得徙中原，占籍赵之中山。监郡君与其弟舍克布问名与字于余。史称汉使通西域，采玉石以归，然则玉故西方之物也。什纳什勒氏为西域之巨族，必知玉之所以为贵，故余名监郡君曰瓚，字之曰清之，名舍克布曰璋，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贵，则知其所以自贵，思其字之美，则知所以全其美矣。”

凡此皆西域人之喜有汉名者也。喜有汉名之不已，又从而为之说，一人为之说之不已，更有以其名字为题，遍征当世士大夫诗文以为乐者，此真西域人爱慕华风之甚者也。

陈基《夷白斋稿外集》卷下有《书太古字说后》一篇，云：“河东运使高昌拜住公，字太古。中朝诸名公为文为诗，以发明其义，无余蕴矣，复俾某一言，以申其说。”则《太古字说》当不止一篇矣，吾所见者有宋褰《燕石集》卷十三一篇，曰：“监察御史高昌拜住，字太古。谥予曰：朋友命以字，旧矣，君文人，幸衍其义教我。予辞曰：予不啻不文，且有疑焉。太古当泰定初，丞秘书监，予尝备员典校，时相先后，未始识其人，然闻公卿大夫士交口荐誉者十有五年矣。其言曰：太古不崖岸，不畦畛，不陷阱机巧，真淳朴茂，洞达乐易。今乃识某人，服用冠佩，车马屋室，殊非洪荒之世，大庭赫胥之民，无标枝野鹿之态。或者哂曰：子论人以心乎？顾以迹乎？不崖岸，不畦畛，不陷阱机巧，真淳朴茂，洞达乐易者，为今人乎？为古人乎？”

予致狂叹服其言之能释予疑，遂志之为《太古字说》。”观此则太古之神情如绘矣，盖明明一西域人，而爱慕华风者也，是不啻太古之像赞也。

然此所论特名字耳，西域人于名字上效汉人加姓，亦当时风尚。《燕石集》卷五有《太学生刘君定挽诗》，原注云：“君定西域人。延祐七年，中大都乡试。”《石田集》卷九有《送李公敏之官序》，云：“余在河南，即闻于闐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明史》一七一有《赵荣传》，云：“其先西域人。”此西域人之加汉姓者也。然种人加汉姓，当时学者实反对之，刘因《静修文集》十九有《古里氏名字序》一篇，发表其极端反对之论，至将古里氏数世称吴之例推翻之，而复乎古里，此则讲学家之矫情夺理者也。其言曰：“吴景初请予制其子名，自叙其为女真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诸姓各就其近似者易从中国姓，故古里氏例称吴，已数世矣。予闻之，大以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传之子孙，其脉络截然有不敢毫发乱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绝本根，附于他裔，顾乃因仍苟且，徇于流俗而不恤。彼儿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为问乎？今先为正其姓，然后名其子承，字之延伯，盖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贻也。”夫吴景初所请者名耳，而刘因乃推翻其姓，何以为情！古里氏是女真，非色目，女真在元，本与汉人同列，其改汉姓犹不可，况色目乎！刘因之说若行，则马祖常、赵世延等皆须去汉姓，然祖常、世延等之汉姓可去，《魏书·官氏志》所载元魏以来种人所改之汉姓，何从而去之！种族狭隘之见，不应出于大一统之时。刘因之反对种人冒汉姓，防种族混合耳，然种族混合，于人类社会之进化为害为利，必有能言之者。后来吴海又持反对汉人冒国姓之论，其用意与刘因正同。

吴海《闻过斋集》卷一有《王氏家谱叙》，曰：“河西古诸羌，宋李元昊据之为边患，相继用兵，士有陷没者，杂为夏人，元初得天下，赐姓唐兀氏，俾附国籍，次蒙古一等。河西而仕宦者，皆舍旧氏用新氏，国家尚宽厚，虽占旧氏不禁，然能存者仅二数。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齐人没元昊者，乃冠旧氏名上。一日出家谱相示，自曾祖以来，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缀，其意谓新氏乃天子所命而不敢违，旧氏乃祖宗所传而不可弃，故兼录之。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趋，固有自毁其祖而冒国籍，以求仕之显者，安有既授赐姓，犹不忍舍其旧乎！吾阅是谱，不觉为之感叹，彼自弃其祖者使得观是谱而能动心焉，庶亦可改也。”

虽然，以名为姓，古所恒有。贯云石以父名首字为姓，萨都刺以自名首字为姓，而称萨氏子焉。不独色目人如此，凡无氏姓之种人胥如此。揭傒斯《文安集》卷九有《送璩元溥序》，云：“庐州舒城长璩元溥，蒙古人，名璩理普化，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可见以名为姓，实一极自然之称谓，无得而议者。

程钜夫《雪楼集》十五有《里氏庆源图引》，述里氏定姓之由，可以推知西域各姓，皆有慕乎中华氏族之制而效之者也。曰“氏族之制，所以定亲疏、别嫌疑、厚人伦也。西北诸公，以名称相呼，以部落为属，传久而差，失真尤甚，此《里氏庆源图》之所以作乎！里氏者，隆禧院使约著所自氏也。按里氏世高昌人，其俗大抵与诸国类，又世蹂金革，虽豪王大族，能自系其所自出者无几。惟里氏世仕其国为大官，自大父撒吉思仗义归朝，佐定中夏，其后列朝班寄方伯者六十人，亦既盛矣。而隆禧君大惧世代日益远，生齿日益众，无命氏以相别，终亦茫

唐杳眇不可知而已。乃以身事本朝者，实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从世俗书，有从土从田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溯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至于今九世，系以为谱，号曰《里氏庆源图》，而隆禧为七世”云。

约著大父为撒吉思，俗书吉从土，思从田，田土合而为里，望文生训，故以里为氏。《四库》本改撒吉思为萨奇苏，不独失其命氏之意，且不知从土从田之谓何矣。

宋濂《銓坡集》卷七有《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述古今定姓之法尤详，今节录之，亦可见元西域人同化之往迹也。曰：“浦君，西域阿鲁温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时迁幽之宛平，生同知温州路总管府事道吾，道吾生刺哲，刺哲生道刺沙、溥博，即浦君，其字为仲渊。性颖悟，从名师传，通《毛氏笺》，中至正壬寅江浙乡闈一榜，辟教谕嘉兴，遂占籍焉。夫西域诸国，初无氏系，唯随其部族以为号，盖其族淳庞，其事简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声名文物之区者三世，衣被乎书诗，服行乎礼义，而氏名犹存乎旧，无乃不可乎！于是与荐绅先生谋，因其自名，而定以浦为姓。昔者代北群英，随北魏迁河南者，皆革以华俗，改三字四字姓名为单辞，而其他遵用夏法。今浦君之为，上符古义，下合时宜，非卓见绝识，不得与于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则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恶足以论变通之故。”

变通云者，即同化也。溥博明系回回人，其兄名道刺沙，尤为元代回回人习用之名。至溥博而字仲渊，则明明取《中庸》“溥博渊泉”之义，复通《诗毛氏笺》，则彬彬乎进文明之域矣。彼拘守常义，谓“我先祖未之能行”者，凡变一法，革一俗，必有同类阻挠之力，无古今中外皆然，浦氏定姓，不能独免，故

宋濂奖之，宋濂之识过刘因远矣。

## 二 西域人丧葬效华俗

凯霖	丁鹤年	廉希宪
赵世延	别的因	也黑迭儿部人
畏吾儿丧事体例	禁色目人效汉法丁忧	

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莫过于丧葬。然考元人丧葬，较考元人名氏为难，因宋元人习惯，喜求人为名字说，故易于考见，而关于丧葬之记载，则诸家著述极稀。许有壬《至正集》五三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言凯霖一家改革旧俗事甚详，名氏丧葬，均改从华俗而不恤。凯霖兄弟交许有壬久，故有壬备知之。其言曰：“公讳哈只哈心，阿鲁浑氏，西域人。隶王旭列邸，王邸在极西，遣公入觐计事，公夙慕中土，挈家行。初至和林，元帅苟公奇之，妻以女，生二子，长阿合马，次阿散。麦砧哈檐，西域名族，念公贤，赘阿散其家，生二子，长暗都刺，次凯霖。暗都刺兄弟鞠于外家，攻儒书。既长，益习礼训，谋于师友曰：‘古之姓，或官或封，无常也。吾其从祖母之苟乎！’遂姓苟氏。又曰：‘我兄弟读书学礼，无名字其可，名则不敢忘吾先，而字则从华可也’。于是师友相与字暗都刺曰平叔，凯霖曰和叔。”此言凯霖兄弟名氏改从华俗之经过也。又云：“和叔宝庆路邵阳县达鲁花赤，移彰德路临漳县，更移安阳。爱其山水，思妥其先，卜地司空村，有飘风旋尘为涡，导马首者七，众皆见之。下马默祷：‘若吾祖考宜此地，当止。’风即戢，买而为兆域，迁祖考妣、考妣、兄，以泰定四年二月葬焉。以公西来而为使也，表之曰‘西使之阡’。嫂侄继母弟相继没，俱衬焉。”又



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然而求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和叔则曰：‘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戾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俗之不同，理之顿异，吾其可从乎！’”於戏！若和叔者，孟子所谓善变者也。其俗不铭，而铭其先，其俗墓近人，而必远五害，此其变之小者也。”此言凯霖迁葬其先人改从华俗之经过也。凯霖实回回人，其善变华俗如此，其持论之平允和蔼又如此，字曰和叔宜矣。

凯霖而后，西域人丧葬改从华俗最著者为丁鹤年。戴良《高士传》（《九灵山房集》十九）云：“鹤年父武昌公死时，鹤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丧，鹤年以为非古制，乃服斩衰三年。及夫人捐馆舍，鹤年哀毁尽癯，盐酪不入口者五年。”此言鹤年丧制从华俗也。乌斯道《丁孝子传》（《春草斋集》卷七）言：“鹤年避地二十余年，兵后还武昌，访生母葬地，自秋至冬，遍询莫知者。鹤年作母主，早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浹有报，拜至七日夜，梦母氏出高堂中，以恸即寤。晨起，邻老杨重者至，云：‘吾昨夜梦子之母氏，堂宇间自内出，以酒肉见赐。’鹤年以梦母氏与邻老同，试即其地物色之。见平陆上有陷下者，意谓吾闻母葬时无棺槨，上覆败舟板，人与板腐尽乃尔。遂陈酒肉以祭，祭毕斲其上，骨果见。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复啖指血骨上，良久拭去，血骨通变茜色，乃收骨棺敛葬是乡。鹤年庐墓终身，一时论者咸称为孝子。”此言鹤年葬法从

华俗也。作母主以拜，陈酒肉以祭，皆汉法，非回回法。血骨棺斂，亦华俗，非回回俗。至于梦示葬处，与凯霖之风导马首，同为吾国说部习见之词调，足见其受印象于华俗者深也。

然三年之丧及丁忧之制，元初西域人已有行之者，不自鹤年等始也。《元史》一二六《廉希宪传》：“至元元年丁母忧，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傍。宰执以忧制未定，欲极力起之，相与诣庐，闻号痛声，竟不忍言。未几，有诏夺情起复，希宪虽不敢违旨，然出则素服从事，入必缙经。及丧父亦如之。”又卷一八〇《赵世延传》：“元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台都事，丁内艰不赴。”时丁忧之制尚未著为令甲也，然廉希宪、赵世延已自行之。《元典章》吏部五《官吏丁忧终制叙仕》条，载大德八年诏书，曰：“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祛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是大德八年以前实无丁忧限制也。故《元史》卷七八《梁曾传》云：“大德元年，除杭州路总管。四年，丁内艰。先是丁忧之制未行，曾上言请如礼。”此汉人自请如礼也。廉希宪、赵世延非汉人，而亦热心古礼。且元制凡关于中国礼俗之事，必令蒙古、色目人除外，无限制之者。《元史》卷八三《选举志》：“大德二年诏，凡值丧，除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外，管军官并朝廷职不可旷者，不拘此例。”斤斤然唯恐汉法之拘束之，而廉希宪、赵世延乃乐于受古礼之拘束，此犹谓文人曾读孔氏书者然耳，而亦有非文人而用中国礼者。据黄潘《金华集》卷二八《答禄乃蛮氏先茔碑》，乃蛮曲出禄后人，有别的因者，至元间为池州、台州两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居丧用中国礼，黄潘称之曰：“公之至孝，出于天性，盖北方丧礼极简，无衰麻哭踊之节，葬则剡木为棺，不封不树，饮酒食

肉无所禁,见新月即释服。迨公居张夫人之丧,始悉用中国礼,逾年乃从吉。”据碑,张夫人之卒在至元二十一年,时三年之丧未定,而别的因自行之,可见其受华化甚早也。别的因《元史》一二一有传,而不言其居丧用中国礼。

又有一事,足证元时西域人模仿中国习俗,应有尽有。前吾闻天主教人有不满于利玛窦者,谓其“京师阜成门外葬地,有翁仲等供地下之驱遣,丰义和团来始发其覆。”吾初疑其诬蔑利玛窦过甚,及见欧阳玄所为《马合马沙碑》(《圭斋集》卷九),乃信天下事无奇不有,有非思想所能及者。马合马沙之父也黑迭儿,建筑燕京宫城,已详《美术篇》。碑称:“也黑迭儿以修筑宫城有功,部人凿石作像,髭髯咸肖,设置墓舍。族属见之,谓其非法,谋弃隐处。世祖夜梦也黑迭儿,若有诉事,状如生平。明发召诘其家,以像事告,亟命止之。”斯事也,与天主教人诬利玛窦之事甚相类。也黑迭儿为回回教徒,回回教之厌恶偶像,比天主教过无不及,而也黑迭儿之墓舍,竟有石像焉,此石像非出于华人,而出于部人,虽出于部人,而其子马合马沙任之,尤奇焉。特原碑所称“亟命止之”者,止而不设乎?抑止而不弃乎?部人设置之,族属谋弃之,也黑迭儿之示梦,取何态度?欧阳玄文不明了,若也黑迭儿而不欲弃此石像也,则真死心于中国化者矣;即也黑迭儿而欲弃此石像,然其部人已设置之,亦可表示其部人之中国化。

尚有其他方法足证元时西域人丧葬有效汉俗者:

一、《元典章》礼部三有畏吾儿丧事体例。禁止畏吾儿效汉儿体例,必其有所效,而后有所禁也。其条文有云:“休似汉儿体例行者,搭麻花、挂孝、穿团头,都休穿带者。烧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样包裹者,休暖墓儿者,休引灵者,或是拣莫那个

七条里,休依汉儿体例。纸做来的金银、纸房、纸人、纸马、袄子,休做者。”

又云:“中书省札付:畏吾儿田地里,从在先传留下底各自体例有来,这汉儿田地里的众畏吾儿每,丧事体例有呵,自己体例落后了,随着汉儿体例。又丧事多宰杀做来的勾当每,上位听得上头帖薛、不速蛮也丧事里,依各自体例行有。从今已后,这汉儿田地里底众畏吾儿每,丧事里只依在先自己体例行者,汉儿体例休随者。”

“汉儿田地里的畏吾儿”,即杂居汉地之畏吾儿。畏吾儿杂居汉地,即沾被汉化,虽有此反覆叮咛之禁戒,奈众楚人咻之何!帖薛,谓基督教徒,《至元辨伪录》卷三所谓“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迭屑即帖薛,弥失诃,近译弥赛亚也。不速蛮谓回教徒,《长春西游记》卷上所谓:“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领诸部人来迎。”铺速满即不速蛮,或作木速儿蛮也。

二、《元史》三十《泰定帝纪》:“致和元年夏四月己亥,塔失帖木儿、倒刺沙请,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其名。”丁忧之制,本蒙古、色目人除外,其后蒙古、色目人效汉法者众。塔失帖木儿代表蒙古人,倒刺沙以回回代表色目人,各欲限制其本俗。然流风所被,莫之能御也。《元史》三十二《文宗纪》:“天历元年(即致和元年)十二月戊午,诏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如旧制。”此即取消四月时倒刺沙之议。文宗党深恶泰定党,故特反其所为,然亦因效汉法者惯例已成,除名不胜除,不若听之为便。《元史》八十三《选举志》:“天历二年,诏官吏丁忧,各依本俗。蒙古、色目仿效汉人者,不用部议,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此与《文宗纪》所记本同一事,特详略稍殊。彼云天历元年,此云天历二年,因天历

元年十二月己丑朔，十二月戊午，除夕也，故《选举志》系之二年。“不用部议”者，不除其名，听其自便也，不啻明许之矣。

王礼《麟原集》卷六有《义冢记》一篇，言西域人以中国为乐土，而不肯西归。其词曰：“义冢者何？西域氏族塋也。营之者谁？吉安达鲁花赤也。于是可知混一之盛矣。何也？西域之于中夏，言语嗜欲殊焉，虽汉唐以来，婚媾有之，然各怀旧族，不能杂处他土，顾安有生西域而葬江南者。惟我皇元，肇基龙朔，创业垂统之际，西域与有劳焉。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之义乎！呜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首丘之义不顾，尚何论乎葬仪，恐从华俗者众矣。

### 三 西域人祠祭效华俗

马庆祥褒忠庙      马合麻生祠  
凯霖五龙庙      马合谟白龙潭庙  
答失蛮灵隐寺佛像

古者有功于民则祀，建祠造像，所以崇德报功，其为用与今之铸铜像、立纪念碑者无异。或一乡一族中，不能不有一公共聚会之场，于是立庙建祠，置彼此所共崇拜祖先之像或主于其中，以伸景仰，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愚者为之，则信偶像之有灵，有向之祷祀邀福者矣，一神教徒所以以拜偶像为大戒，而不容此等祠宇之存在也。然此特末流之失耳，与有功于民

则祀之初旨何关！今人游建国伟人铜像之旁，免冠致敬，瞻仰徘徊而不忍去，又胡为者！不能以习俗仪节之不同，遂谓露天矗立之铜像为优，而庙貌森严之偶像为劣也。明乎此，可以与言元时西域人关于祠祭之观念。

始吾读《元遗山集》二七《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知为马祖常之高祖马庆祥，固明明基督教世家也（说见《儒学篇》）。而马庆祥没后，金人为立像汴京褒忠庙，岁时致祭。吾极疑之，以为不应以此施之基督徒，既而思之，立像犹铸铜像耳，岁时致祭，纪念云尔，所异乎铜像者，庙祀而已，有何不可。及读周霆震《石初集》卷七，又有《义兵万户马合麻安塘生祠记》，始知元人对于回教徒亦以此施之，所谓有功于民则祀也。其词曰：“今义兵万户马合麻公致远，抚土恤民，尽心报国，始终不渝。公之先，自西域徙京师，宦游四方，子孙益盛。致远侍亲杭浙，以荫补官，授庐陵井冈巡检，职在察奸求盗，而所至书策自随，深有意濂洛之学。事上接下，温厚和平，至纲常大义所关，则正色凛然，不可毫发忤。临危涉险，慷慨出万死如履坦途，盖由诗书讲贯之余，有以察夫天理民彝，而此心之涵养有素也。于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浒，以系其思，若《召南·甘棠》之诗，西都循吏之传，张益州画像之仿佛其平生衣冠状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虽公之德业闻望，不系祠之有无，然人情感慕之诚，则必因祠以著。”

此文最能代表中国人所以立庙建祠之故，与一神教徒所排斥之偶像，其性质绝对不同，所谓《甘棠》之思，感慕之诚，纯为纪念性质，何尝有丝毫邀恩祈福之意！此而不许，非人情也。回教徒恶偶像比基督教徒尤甚，今安塘人乃以施之回教徒，未闻马合麻有拒绝之词也。以较也黑迭儿墓舍之石像，又

进一步矣，因彼之像在翁仲，而此之祠在本身也；以较马庆祥汴京之褒忠庙，亦进一步矣，因彼之庙在死后，而此之祠在生前也。然此皆受人祠祭者耳，犹可谓其权不操诸己也。更有致祭于群祀者，在元西域人中亦恒见之，奇其出于基督教及回教徒也，是真深染中华习俗者矣。马祖常《石田集》有《陪可用中议祠星于天宝宫》诗，薛汉《宗海集》又有《送马少卿伯庸南祀嵩恒淮渚》诗，固已绝非基督教世家所宜有矣。然其他诗文中集中如此类题尚众，且或出于回教徒，不胜引。夫嵩、恒、淮渚，为古诸侯所祭，载在典礼，马祖常既归儒，宜可往祭。然有事不师古，迹涉荒唐，非佛非儒，等于迷信者，亦时见有一神教徒随俗祭之，奇也。今举《安阳金石录》卷十五龙庙、白龙潭二碑，以著其例。

《五龙庙碑》为许有壬撰。其略曰：“彰德路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之阳有五龙庙，庙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滯而后泄，其龙居之渊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书，言明昌中，风拔庙树，印地有迹，事颇涉怪，而不及庙之建始何时。其号五者，具五方为象设尔，以其祷之屡孚也。路达鲁花赤荀公凯霖、同知阿蓝、判官毛刺真，尝修其废，筑台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苗尽槁，荀公曰：‘五龙庙效灵自昔，协恭精祷，神其悯乎！’于是率僚属，斋沐，具香币祷焉。戊子行事，云乃起，是夕微雨，越翌日，雨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浮而兴，市之闭遏者发，人之转徙者息，病者以苏，讹言以寂，丰凶笑颦，变乎旦夕。既报祀，安阳县尹赵君时敏刻石以昭神贶，以达邦君之休。”原按：“碑久毁没。”今据《至正集》五二补入。凯霖即前章《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之凯霖，固明明回教徒也。“五龙”云云，与《旧约》书中以色列人之金牛犊何异，而凯霖竟随俗祭之。出

于中国官吏不奇,出于其他西域官吏亦不奇,出于回回教世家之官吏则奇,习俗移人,抑官守有限也。

《白龙潭庙碑》为王博文撰并书。其略曰:“距城西南二十里播流村有白龙潭者,丛祠蔚然,其水不经见,其详不得而考焉。故老相传,中有神物居之,顷年旱暵,有祷辄应。泰定丙寅,燕人马合谟来守是邦,越明年丁卯秋旱,禱而果雨,遂割俸金,一新庙貌,所以答神贶也。又明年戊辰,实致和改元,正月不雨至六月,蹇阳肆凶,麦无完穗。太守有忧之,躬率僚属,绝膺鞞,去巾袜,徒步而诣所谓白龙潭者。即事之始,先以绛帕幂二瓶,置香案,谓之请圣水,得请则水满其瓶,不得请则瓶空如故。于是祝奠如仪,肃拜无算。未几,瓶中水满,而绛帕不濡,與水以归,崇奉惟谨。居二日,阴云四合,而雨乃大作,槁苗浥兴,人心救宁,岁号小稔。呜呼,龙固灵物也!不有佥判等之精诚,无以见其神异,不有太守闵农忧,无以尽其虔禱之劳。太守固贤二千石,不有视民如伤之心,无以回天地之和气。呜呼,盛矣哉!”

原按:“碑亦佚。”据《邈乘》删节本补入。碑所云云,实为神话,而太守之虔禱,乃出于精诚,吾不知其信仰改变之心理若何。《道光广东通志》二四《宦绩录》,有马合谟,字端卿,回回人。后至元三年为海北海南廉访司副使。重农劝学,夏旱祈禱,令儒生斋戒集文庙,诵《云汉》之诗,告祝恳至,即日大雨。与守安阳之马合谟事极相类,名适相同,未识是否一人。而中华习俗之移人,真有可惊者,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吾见今一神教徒之跻登显要,辄改其故步,亦可持此解嘲乎!其他元代祠庙碑刻中之西域人题名,不胜枚举。大抵一庙一碑之立,凡官于斯土者,例得列名碑阴,不论其与本身之信仰若何



也。《攷占录》十八载山东临朐县碑刻，有《沂山东镇庙祭春记》，为至大四年马合麻撰并书，皆西域人祠祭之效华俗者。前清时回教徒有官至三品即须反教之谣，吾闻而疑之，综观以上事实，其说不为无因欤！

《两浙金石志》卷十五有《元答失蛮重装佛像记》，云：“灵隐禅寺，伏承大功德主江浙等处行省□□左丞相答失蛮，布施金子彩色，重装佛国山诸佛菩萨圣像，所集洪因，端为祝延皇帝万岁。至大三年九月日，住持僧正传谨题。”记在西湖飞来峰，摩崖正书，字径一寸。答失蛮《元史》无传，然以答失蛮为名，当为回教徒。重装佛像何事，而可出于回教徒者！《元史·武宗纪》载：“至大三年九月，御史台臣言：江浙省丞相答失蛮，于天寿节日殴其平章政事李兰奚，事属不敬”云云。与此题记年月正合，是答失蛮一面出资重装佛像，一面于大庭广众中殴人，亦元西域人之特色。出于巨官，载之正史，均可为发矇者也。

#### 四 西域人居处效华俗

马祖常石田山房

张闾益清堂

斡朵忽都鲁忠顺堂

钱宝臣容膝轩

买闾一乐堂

仲礼九思堂

伯颜子中池亭

舍甫刺丁池園

余阙青阳山房

马季子怀静轩

守中霜月轩

答里麻识理一清堂

楔公远近思斋

萨德弥实瑞竹堂

楔玉立绛守居园池

答彦修云溪小象

居处能表现人之精神，箪瓢陋巷，颜子乐之；环堵萧然，五柳先生晏如也。然此非所论于元西域人，因元西域人丰裕者多，贫乏者寡，无论如何不致有环堵萧然之景况也。惟名园别墅则有之，此唐风也。自唐以来，庄园之风极盛，离宫别馆，榱栋相望，风气所趋，西域人亦竞相仿效，此其故半因豪富，半因爱慕华风。迨乎建置既繁，题榜署名，辄相因袭，王士点《禁扁》之作，即所以标异避同，其盛可想也。

马祖常于淮南筑别业，名石田山房，自为图记（《石田集》附录），指韵求诗。其词有曰：“屋侧有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树苞竹，荟蔚蔽亏，前为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编菅苇，门屋覆之以茨。岁时里邻，酒食往来，牛种田器，更相赏贷，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孙，持书笈来问《孝经》、《论语》孔子之说。其耕之土虽硗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饶，然犹愈于无业也。”此马祖常之所居，以山房为名，而以耕读相标榜也。

余阙亦于淮西筑别业，名青阳山房。储书其中，属新安程文为之记（《青阳集》附录），曰：“青阳山房在今庐州东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为名，武威余公读书之处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养其亲。即田舍置经史百家之书，释耒则却坐而读之，以求古圣贤之学，是时未有青阳山房之名也。及其出仕，不忘其初，乃辟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储书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与里中子弟朋友讲学于此，始有青阳山房之名。”此余阙之所居，以山房为名，而以耕读相标榜也。

山房之名，宋始有之，大抵为山居读书之所。苏轼《东坡文集》五三有《李君山房记》，云：“李公择少时读书庐山白石庵。公择既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九

千余卷。不藏于家而藏于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宋史》四一六《曹邴传》：“邴知建昌县，复故尚书李常山房，建斋舍以处诸生。”是山房者实含有藏书以供人就读之意，马祖常、余阙以是名其居，犹是宋人遗俗也。

张闾有益清堂，迺贤《金台集》卷一《题益清堂诗序》云：“闽海宪使合鲁桓穆公，归休嵩山之下，凿池引流，列植卉木，扁其燕处之堂曰爱莲。公没，堂池遽废，其孙国子生张闾伯高，谦恭好学，思继先志，乃复增葺而新之，国子先生陈伯敷易其名曰益清。伯高谓余曰：‘与君世寓南阳，且支裔联属，不可无作。’因赋律诗十有四韵，以复其命。”诗有“吾宗多秀发，公子独清修”之句。张闾之张，汉姓也，不有此序，孰知其与迺贤同宗。今以益清名其堂，盖有取于愈进文明去旧俗愈远之意乎！

然亦有虽进文明，而不忘旧俗者，马祖常之从子马季子是也。马季子有怀静轩，王逢《梧溪集》卷四下《题怀静轩诗序》云：“怀静轩者，居延马季子之所创也。季子之先曰月哥，曰理术，自雍古部族居静州天山。一传为习礼吉思，仕金死节，二传为月忽那，从世皇南征，以劳拜礼部尚书，三传为世昌，四传为礼，五传为祖中、仲氏祖常，六传为季子，居于淞之竹冈。轩以怀静名，示不忘本也。”

静者静州，马季子祖所居也。元时西域世族，类能以诗书化其朴野，其祖若父虽起家甲冑，二传即沾被华风。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而其所以能化之速者，首由物质供给之丰腴，而诗书礼义随其后，所谓衣食足则礼义兴也。

斡朵忽都鲁有忠顺堂，刘敏中《中庵集》（元刻本卷廿三）

云：“高唐监郡斡朵忽都鲁，系出西城（《四库》本卷三作域），读书乐善，士夫称之。兄弟六人，而君为季，其父独以君袭是职，监郡凡三世矣。作忠顺堂居之，因郡人元恒斋正卿来征言，赠以二诗。”有“系族来何远，文儒夙所耽”之句。元恒斋为高唐王闕里吉思客，斡朵忽都鲁为高唐王属吏，忠顺堂者，其读书宴客之所也。《中庵集》十四又有《樗亭铭》，四库本十九注云“为回纥人作”，然则樗亭者，亦回纥人之中国建筑欤！

守中有霜月轩，王毅《木讷斋集》卷一有《霜月轩诗序》，云：“高昌守中，榜其读书之室曰霜月轩，求予叙其卷端。守中无亦操履严洁，有似于霜，心术光辉，有似于月，故名其轩以见志邪！守中家世显荣，德性谦退，谢绮纨之习，敦诗书之好。予爱其德，由是而勸之，则将凛凛乎其有守，昭昭乎其有见，丙夜读书轩中，庶几斯名之称情也。”

钱宝臣有容膝轩。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四有《容膝轩铭》，曰：“高昌钱宝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轩，昭其俭也。”

答里麻识理有一清堂。舒頔《贞素斋集》卷一有《一清堂记》，云：“前江淮知府理侯来宰吾邑（绩溪），官安而吏多暇，筑堂于寓舍之隙，为燕息之所，扁曰一清。侯高昌人也，仕于南国历年多，见世之汨泥扬波者众，惧辱于己，乃弃大府而僻壤是依，洁身治事，若甚宜之，扁堂曰清，侯之心可见矣。”

买闾有一乐堂，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梧溪集》（卷五）有《怀哲操序》，云：“怀哲，美买闾教授敬亲爱弟也。惟敬爱也，不以祸乱穷羈少渝焉，构堂名一乐。前朝儒公卿颂述备至，而琴操缺遗，故予补之”云。

偃公远有近思斋。孔子曰：“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郑元祐《侨吴集》卷七有《近思斋箴》，注曰：“为高昌偃公远

作。”有“圣徒示训，在思之近，譬则升阶，敛步而进。级尽一级，学博理穷，笃志切问，仁在其中”之句。

仲礼有九思堂。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赵汭《东山存稿》卷四《九思堂记》云：“九思堂者，高昌仲礼公闲居之所也。至正十一年冬，公莅两浙盐政，命前所治邑休宁诸生赵汭为文以记之。汭闻诸君子，一言而可决天理人欲之几者，日思而已，故吾夫子之教，欲人即身心日用以慎夫所宜思，其目虽九，而思则一。公能取之以名其堂，信乎知所先务者矣。”

萨德弥实有瑞竹堂。吴澄《文正集》十三有《瑞竹堂经验方序》云：“盱江郡侯，莅官余暇，注意于医药方书之事，遇有得必藏之，积久弥富，题曰《瑞竹堂经验方》。侯名萨德弥实。瑞竹堂者，往时侯插竹为樊，竹再生根，遂生枝叶，人以为瑞，而侯以扁其堂”云。《瑞竹堂经验方》今不传，所传者清《四库》辑《永乐大典》本，固中国药方，而非西域药方也（元有回回药方院）。可见元时西域人居处服食，无所往而不华化矣。

此外建筑物之见于《儒学篇》者，有闾里吉思之万卷堂，回回之时斋，见于《文学篇》者，有察罕之白云山别墅，皆西域人佳构之慕效华风者。《文学篇》又称伯颜子中卜居进贤之北山，躬自创竹屋三间，读书其中。读《元诗选》刘闾《容窗集》，有《咏颜子中池亭》二首，犹可想见其风景。诗云：

池净天容湛，窗虚水气通，远山来户外，飞雨洒亭中。  
蒹葭含朝景，薜荔集晚风，平生江海念，相对兴无穷。

种树年年长，开窗面面凉，雨苔生砌绿，秋叶堕池黄。  
得句闲拈笔，抛书懒近床，旅怀随所至，谁复计行藏。

其风景固江南风景也。

《元诗选》倪玉立《世玉集》有《绛守居园池》诗，序云：“乙酉之秋，七月既望，余自河中谪狱还司，过绛，登守居园池。昔日亭墅，悉已埋没，独洄漣亭、花萼堂复构以还旧观，流泉莲沼，犹仍故焉。堤柳阴翳，径花鲜妍，庭竹数竿，清风泠然，有尘外之思，即事赋诗”云云。

倪玉立以一摩尼教世家（见《儒学篇》），对于古人遗迹加意保存，发为咏歌，寄其遐想如此，此又西域人之爱慕林泉者也。林泉之好，为人类所共，不能谓为中华所独，然元西域人率以武功起家，其性质宜与林泉不相近，而有时飘然物外，辄令人神往，不料其为西域人者，不得不谓之华风。

阮元《两浙金石志》十六有《舍刺甫丁墓碣》，为泰定元年物，得诸南屏山麓。无额，上刻云月之形。云月形者，回回教徽号，即今新月旗也。碑称：“公以伯颜丞相荐，充嘉兴上海县达鲁花赤，累调绍兴之山阴、衢之常山、建康之句容，过化之地，皆有恩泽及民。乃急流勇退，隐居于杭之丰乐桥东，筑池圃，植花竹，为高世避贤之举，以礼义教子孙，以诗酒交亲友，视富贵如浮云，得逍遥物外意，《易》所谓‘知进退存亡’者，公有之云。以至治三年卒，年七十有四。子五人，长木八刺沙，次纳速鲁丁，孙三人，长阿老丁，葬于钱塘之西湖南园。”

舍刺甫丁为回回教世家，当无疑义。惟阮元跋据《杭州府志》，谓其长孙阿老丁，曾于文锦坊南建真教寺，俗名礼拜寺，则未必然也。据《西湖游览志》十八真教寺为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今碑称舍刺甫丁卒于至治二年，是真教寺之建，在舍刺甫丁未卒前七八年。阿老丁为舍刺甫丁长孙，时年当

未滿三十，未必可称为回回大师。且祖若父并存，即有建白，亦未必自居其名。则建真教之阿老丁，当另一人也。不能以其同名而一之，因西域人同名者众也。

回回教世家有高致不减舍刺甫丁，而为同时文人所称慕者，有答失蛮彦修。彦修于至正十年为秘书少监，危素《说学斋集》卷四有《云松隐者图序》，云：“云松隐者，西域彦修君之别号也。彦修世胄高显，早游成均，历官清要，襟度夷雅，恬淡自得，居京师修文坊，恒杜门却扫，留情诗书文艺之间。尝诵唐李翰林庐山集云松之诗，而爱其山，屹立江上，飞泉怪石，佳花美木，往往而见。徒以縻于职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兴是图，朝夕览观焉。呜呼，世之人亦孰窥其高致哉！”

何以知为答失蛮？则以李士瞻《经济集》卷六有《甲午岁题江汉王粲楼，和答石蛮彦修韵》一首。甲午为至正十四年，故知其为云松隐者之彦修也。许有壬《至正集》六七又有《答失蛮彦修云溪小象赞》，尤具有出尘之想，盖涵煦百年，而北鄙杀伐之声绝响矣。其词曰：

厌膏粱之腴，而采山钓鱼，舍鲜华之服，而博带长裾，拂朝市之尘，而居岩壑之僻，刷贵介之习，而为山泽之臞。栖神于澹泊，游心乎诗书，长松荫庭，春酒在壶。人间富贵之乐，有及此迂疏者乎！政恐不免于用世，而亦将为一琴一鹤之徒也。

赵翼《廿二史劄记》二十谓元季士夫风雅相尚。岂独中国士夫，西域士夫其高致不让华人也。丁复《桧亭集》卷八有《送答彦修御史调西台》诗，答即答失蛮之简称。

## 卷七 女 学 篇

### 一 西域妇女华化先导

李舜弦

一代之史，一方之志，卷末必附列女，今言西域人华化，不可不于妇女求之。始吾元西域人华化稿成，王国维、英敛之二先生先后告我以前蜀李珣事。据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何光远《鉴诫录》卷四，均称珣为土生波斯，有诗名，所著有《琼瑶集》，可补吾西域人华化先导一节。吾因李珣而联想及王衍昭仪李舜弦。舜弦，李珣妹，《全唐诗》第十一函有李舜弦诗，杨慎《词品》云：“王衍昭仪李舜弦，饶词藻，有《鸳鸯瓦上》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词云：“鸳鸯瓦上瞥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一作王建诗。《全唐诗》又作王衍宫人李玉箫诗。然无论此诗为谁作，李舜弦固以波斯女而能诗也。《图绘宝鉴》卷二言“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属文，尤工书画。郭崇韬伐蜀得之，夫人郁悒不乐，月夕独坐南轩，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挥毫濡墨，模写纸窗上，明日视之，生意具足”云。是李舜弦复以波斯女而能画也。李珣可为元西



域人华化之先导，李舜弦可为元西域妇女华化之先导矣。

## 二 西域妇女之华学

赵世延女(贯云石女)

偃哲笃妻

丁鹤年姊(铁铉二女)

前《美术篇》引《书史会要补遗》，有“赵夫人鸾，中书平章世延女，中书参政许有壬室。能琴书，善笔札”云云。应详求赵夫人历史。《至正集》六四有《亡室高阳郡夫人赵氏志》，夫人名定，永平人，与此雍古部氏绝非一人。惟同志末有“夫人子燕山，继夫人赵氏子之如己子”一语，则此当为许有壬之继室。《安阳金石录》十二有《鲁郡夫人赵氏墓志铭》，夫人讳鸾，志中亦有“前赵夫人有子曰燕山，抚育如己出”一语，即《书史会要》所称道者也。据《金石录》，“此石藏小营村民家，乾隆十一年出土，字多没灭。今移置许文忠公祠，后半截残缺不完”云。其文为陈旅所撰，《安雅堂集》十一载之，武亿盖未之见，今撮录以补《安阳金石录》之缺。文云：

中书参知政事安阳许公有壬之夫人赵氏，讳鸾，字善应，鲁国公讳世延之女，母刘氏。鲁公本雍古部人，由公业儒，始氏赵氏。夫人朗惠而厚静，幼时古文歌诗入耳辄能记，七岁诵《周易》书，属对，九岁使颦学女事，则《论语》、《孟子》、小学书皆成诵矣。鲁公之平章蜀省也，奸臣以谄逮公系请室，夫人年十三，即却荤肉，向北斗拜祷，凡三年。旦夕哭泣，至翳其两目，鲁公难解，目遂明如初。鲁公文学政事重海内，而女又贤明，选婿称难其人。初，

参政以进士廷对，鲁公为读卷官，及参政为两淮转运使，丧偶且期，值鲁公还金陵别业，因请婚，于是夫人归焉。鲁公以其能诵《易》，尝教之筮。自广陵如鄂，未至金陵三十里，闻鲁公与刘夫人偕来，筮得观之益，曰：“纳甲法，乾宫金用，土为父母，阳土伏而不出，其飞来者阴土也，切身且动，吾母其独来乎！”已而果然。至鄂，闻城中火，且及所居，参政以为忧。筮得坎，其占为伤财，夫人曰：“此则不必以纳甲论，当冬占火而得坎，火能神乎！”火果止。其识类非师傅方册所有者，诸阴阳家书，皆能通之。鲁公尝言“吾教之一，其自得盖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参政不知，偶携琴自怡，夫人始一鼓，乃作十余曲。又善笔札，皆不自表襮。生长将相家，而服食约素，遇亲旧不择贵贱，巽抑若寒门女，其善行盖有不可殚言者。

自“鲁公以其能诵《易》”句以下，《安阳金石录》全阙。此文可注意者，赵世延本基督教世家，予既由种种方法证明其晚年好道，隐居金陵之茅山（详《佛老篇》）。今此文言其女拜斗，善卜，通阴阳家言，可知世延家学，实杂孔、老、阴阳、术数为一堂，色目人沾染华俗之深，无逾于此。

贯云石晚好浮屠，《元史》-四三本传据欧阳玄《贯公神道碑》，谓：“云石女一人，有学识，能文章。适怀庆路总管段谦。”名父之女，皆慕华学，二女可称无独有偶。

畏吾儿偁氏，为摩尼教世家（详《儒学篇》）。孔齐《至正直记》卷三云：“高昌偁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且教子有法，为色目本族之冠。其子偁伯僚逊，至正五年进上，历官翰林应奉文字。”人知偁哲

笃教子有法，不知非独哲笃能也，其夫人亦贤母也。黄潘《金华文集》三九有《魏郡夫人伟吾氏墓志铭》，云：“今吏部尚书偁哲笃公之夫人卒，尚书既亲志于幽堂，其子偁伯僚逊等，复以尚书之命，征予铭。予辱与尚书有同年之雅，不敢以不文辞。谨按夫人讳月伦石护笃，字顺贞，系出伟吾氏，曾祖而上，世仕本国。夫人生而聪慧，稍长能知书，诵《孝经》、《论语》、《女孝经》、《列女传》甚习，见前史所记女妇贞烈事，必再三复读而叹慕焉。年十七归于偁氏。偁氏本突厥之贵戚，自唐以来，世相伟吾氏，遂为其国人”云。

志中叙夫人事姑教子事甚详，以关妇德，不备述。非轻妇德，以为妇德者何族蔑有，不得指为华学，本篇所论是华学，非妇德也。伟吾氏文字与汉文异，夫人所习之《孝经》、《论语》，当非畏吾儿文，而为汉文，故谓之华学。《孝经》、《论语》或有畏吾儿译本，然《女孝经》、《列女传》及前史所记女妇贞烈事，未必有畏吾儿译本。且此诸书，即使有畏吾儿译本，而其原本究为华文，故能习此者，即谓之华学。可见元时华学之广被，且化及西域闺门也。

回回教世家丁鹤年，前篇论之屡矣。丁鹤年以诗名家，孰知其幼时所学，皆出其姊所口授也。鹤年姊名月娥，《明史·列女传》列卷首，然不详。其所取在死节，与予所取异趣也。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七有《月娥传》，较详，《明史》即本于此。今节录其文如下：

月娥者，芜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长取马录丁之女，西域人也。少聪慧静幽，诸伯氏皆明经，工举子业，月娥随而诵说，通奥义。及长，归通甫，事上抚下，凜如礼法，

诸妇诸女，咸淑其化。既而寇群起，据豫章，自上游而下，势张甚，月娥挟诸妇诸女避郡城。未几，寇果至，城陷，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诸妇诸女亦相与死水中，凡九人。父老议曰：“十节同志死，不可异圻。”乃于故居之南黄池里作巨穴，同葬焉。题其名曰“十节墓”。其弟鹤年，相与树碑墓下，以昭节行。鹤年富于经史，有操行。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月娥，幼名也。

十节墓，《明史》作十女墓。城陷，妇女未必即须死节，此亦得诸中华礼教者欤！然吾所取者其华学也。

《七修续稿》卷五有铁氏二女诗，为邓州色目人铁铉女。铉革除间参政，因忤成祖被诛，二女发教坊司，女誓不受辱。已而放出，各上诗一律谢恩，其长诗有“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之句，传诵一时。事并见《震泽纪闻》。然则元时西域妇女之华学，其流风至明未艾也，惟钱谦益《列朝诗集》闰四，谓此诗非铁氏作。

## 卷八 结 论

### 一 总论元文化

综计全书所论,凡百六十有八人:《儒学篇》三十,《佛老篇》八,《文学篇》五,《美术篇》三二,《礼俗篇》四一,《女学篇》六,去其各篇互见者三十六人,尚存百三十二人。此百三十二人中,有著明部族者,有泛称西域或色目者,惜不能一一确指为今何地,然可略分葱岭东西两大部,列表如下:

#### 葱岭东部 五十六人

唐兀八	畏吾儿十一	回鹘二	高昌十七
北庭一	龟兹一	乃蛮二	合鲁二
哈刺鲁二	雍古八	斡端一	于阗一

#### 葱岭西部 六十八人

西域廿三	回回二十	回纥三	答失蛮三
大食二	阿鲁浑二	板勒斡城一	康里五
伯牙吾氏一	也里可温八		

#### 其他 八人

朵鲁别族一	尼波罗国一	色目六
-------	-------	-----

其中有一地而二名,或一族而数译者,皆用名从主人之例列之。如合鲁即哈刺鲁,斡端即于阗,回鹘、畏吾、高昌、北庭,元人本视为一,回回、回纥,元人亦视为一,说详《文学篇》。凡此诸人皆见诸载籍、于中国文化有表见者。其有载籍不载,或载而今已佚,或未佚而为余疏陋所未及见者,当不止此。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且元自延祐肇兴科举,每试,色目进士少者十余人,多者数十人,中间虽经废罢,然举行者犹十五六科,色目人之读书应试者甚众。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言:“天子有意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石田集》卷九)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谓“胡元诗人贯云石、萨天锡欲矫宋诗之衰,而膾气乘之”云云,其一例也。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求之,则王士禛、赵翼两家之言可参考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三十,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云:“元起朔方,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如小云石海牙、孛术鲁朮、峨峨、萨都刺等,当为翘楚矣。”言外颇有不满于元朝文物之意,然同卷又有《元季风雅相尚》一条,云:“元季士夫好以文墨相尚,独怪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搢绅之徒,风雅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固不

系乎朝廷令甲之轻重也。”据此，则赵翼亦知元人文化不弱，且不系乎政府之提倡，第以此归其功于南宋遗民，则遗民何代蔑有。须知文化与政治虽有关系，但毕竟不是一事，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即优于乱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人亦行其素焉耳。

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二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且元时并不轻视儒学，至大元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延祐三年，诏春秋释奠，以颜、曾、思、孟配享，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又以周、程、张、朱等九人从祀，至顺元年，以董仲舒从祀，至正廿一年，以杨时、李侗等从祀。又并不轻视文学，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此中消息，王士禛参之最透，故《居易录》卷二之论《石田集》也，则谓：“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赵世延辈是也。”其论《燕石集》（卷三）也，则谓：“此与《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时崇文如此，或谓九儒十丐，当是天历未行科举以前语。”天历应作延祐。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论据。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六）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此一说也。郑思肖《大义略序》（《心史》下）曰：“鞑法：一官二吏，三

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又一说也。然七八之目,二说已自不同,况谢枋得明谓“为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云尔,非元制果如是也。《池北偶谈》(卷七)列举元代色目文人,持论至为平允。曰:“元名臣文士,如廉希宪、贯云石,畏吾儿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人也;颜宗道,哈刺鲁氏人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其所见较赵翼为独到,予兹所论,正与王士禛同也。试更进而考察亲见元时西域人华化者之言论,以完吾说。

## 二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华化

危素

干文传

戴良

家铉翁

危素之叙《金台后稿》也,在至正十一年辛卯,其言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诗以观民风,西方之国,靡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自幽、秦而西,未见有诗,岂其风气未开,习俗不能以相通也欤!易之,葛逻禄氏也。彼其国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国远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与回纥最先来附,至今百有余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进士第,易之乃泊然无意于仕进,退藏句章山水之间。其所为诗,清丽而粹密,学士大夫多传诵之。然则葛逻禄氏之能诗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见我朝文化之洽,无远弗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此危素以成周比元,而谓其能化行西域也。

干文传之叙《雁门集》也,在至正十七年丁酉,亦以成周之



化比元。其言曰：“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启祚，皆始于西北，去周之邠、镐益远，是以人生其间，多质直端重，才丰而气昌。观之马文清（应作贞）、达兼善、纥子山攀，其所为诗，往往宏伟春容，卓然凌于万物之表，可以轶汉唐而闯风雅，有周忠厚之气象，为之一新。若吾友萨君天锡，亦国之西北人也。君幼岐嶷不群，稍长愈颖敏，为文词雄健倜傥，迥迈乎人人。尝出其所作之诗曰《雁门集》者见示，予得以尽观，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一扫往宋委靡之弊。国家元气，肇自西北，以及于天下，有源而有委，读是诗者尚有以见之。”

戴良之叙《鹤年吟稿》也，在至正二十六年丙午，说亦云然。曰：“昔者成周之兴，肇自西北，西北之诗见之於《国风》者，仅自邠、秦而止，邠、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系之列国以与邶、鄘、曹、桼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者，皆居西北之远国，其去邠、秦，盖不知其几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

危素、于文传、戴良皆南人，其人皆生元季，其论元人之化治西域也，同出一词，所谓舆论者非耶！

元好问生金末元初，其所选诗，号《中州集》，宋人之留元者有家铉翁，为题其后。文见《元文类》八三，曰：“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崇，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故壤

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暇日获观遗山元子所哀《中州集》,百年而上,南北名人节士所为诗,皆采录不遗,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犹吾同国之人,胸怀卓犖,过人远甚,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此又宋人之先见,而其后竟言中者也。盖铉翁留元十余年,得睹元初人物气象,与宋季之偏激狭隘,迥然不同,知其后必昌,故为是论。岂知不用百载,而西北子弟之成就,已过乎铉翁所期也。

### 三 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汉唐以来,翻经沙门,传教教士,华文著述众矣,然大抵皆宣扬本教、发挥西学之书,求可以称华学者盖寡。元西域人不然,百年之间,作者至三十余人,著述至八十余种,经史、词章、老庄、申韩、舆地、艺术、阴阳、医药之属无不具。且皆华法,非西法,与徒夸彼蕃俗、思革吾华风者不同,此元人特色也。《元史》无艺文志,清金门诏、倪灿、钱大昕诸家补之,互有详略。今兹所录,不过西域人之部,然已有出诸家补志外者,则疏漏仍恐不免,姑俟异日续补之。

人 名	书 名	备 考
蒲寿晟(回回)	心泉学诗稿	四库辑《永乐大典》本。 《倪志》误以寿晟为寿庚弟。
	心泉诗余	《彊村丛书》本

嵯峨(康里)	大元通制	删修人之一,见《顺帝纪》二。
马润(雍古)	樵隐集	见《清容集·马公神道碑》。
马祖常(雍古)	英宗实录	以下六种,见《元史》本传。
	皇图大训	
	承华事略	
	列后金鉴	
	千秋记略	
	章疏一卷	又见《千顷堂书目》。
	石田山房集	有影印《元四家集》本。
赡思(大食)	帝王心法	以下十四种,见本传。
	四书阙疑	
	五经思问	
	奇偶阴阳消息图	
	老庄精诣	“诣”《千顷堂书目》作“语”。
	镇阳风土记	
	续东阳志	
	河防通议	《四库》辑《永乐大典》本。
	西国图经	
	西域异人录	
	金哀宗纪	
	正大诸臣列传	

	审听要诀	
	文集三十卷	
侯玉立(回鹘)	世玉集	《元诗选》。
侯百僚逊(回鹘)	近思斋逸稿	见《千顷堂书目·外国类》。《明诗综》九五亦有侯逊诗。
泰不华(伯牙吾氏)	重类复古编(十卷)	本传。
	顾北集	《元诗选》。
	宋史	分撰廿三人之一,见《圭斋集·进宋史表》。
伯颜师圣(哈刺鲁氏)	金史	分撰六人之一,见《进金史表》。
贯云石(畏吾儿)	直解孝经一卷	本传。
	贯公文集	《巴西集》有序。
	酸斋文集	《千顷堂书目》。
	酸斋集	《元诗选》。
迺贤(合鲁氏)	河朔访古记	《四库》辑《永乐大典》本。
	金台集	近日翻元本。
	金台后集	《说学斋集》有序。
	前冈诗集	见《宋元诗会》。
	海云清啸集	见《千顷堂书目》。
丁鹤年(回回)	丁鹤年集	《琳琅秘室丛书》本。
	丁孝子诗集	《艺海珠尘》本。

	皇元风雅	《九灵山房集》有序,与蒋易、傅习等所编同名。
赵世延(雍古)	经世大典	纂修人之一,见《元文类·经世大典叙录》。
	风宪宏纲	本传。
余闾(唐兀)	五经传注	本传。
	易说五十卷	见《九灵山房集·余闾公手帖后题》。
	青阳山房集	有四卷、五卷、六卷、八卷各本。
	宋史	分撰廿三人之一,见《圭斋集·进宋史表》。
高克恭(西域)	房山集	《元诗选》。
	高尚书文集	《式古堂画考》有王士熙跋。
	高文简公集(七卷)	见《千顷堂书目》。
聂古柏	侍郎集	《元诗选》。
韩玉伦徒(唐兀)	宋史	分撰廿三人之一,见《圭斋集·进宋史表》。
张雄飞(唐兀)	张雄飞诗集	《至正集》有序。
昂吉(唐兀)	启文集	《元诗选》。
伯颜子中(西域)	子中集	《元诗选》。
薛超吾(回鹘)	薛昂夫诗集	《松雪斋集》、《天下同文集》有序。

郝天挺(朵鲁 别族)	云南实录五卷	本传。
	唐诗鼓吹注(十卷)	通行本。
辛文房(西域)	唐才子传十卷	《粤雅堂》本、日本本、近 翻元本。
	披沙集	《石田集》有《题披沙集》 诗。
	布都公行状	见《雪楼集》。布都公， 察罕父。
雅琥(也里可 温)	正卿集	《元诗选》、曹学佺《历代 诗选》。
萨都刺(答失 蛮)	雁门集	有三卷、六卷、八卷、二 十卷本。
	萨天锡诗集(二卷)	《千顷堂书目》。上礼居 藏十卷。
	集外诗一卷	毛晋刻。
	萨天锡逸诗	日本刻。
	西湖十景词	见《元史类编》。
沙刺班(畏吾 儿)	金史	分撰六人之一，见《进金 史表》。
廉惠山海牙 (畏吾儿)	辽史	分撰四人之一，见《进辽 史表》。
	仁宗实录	以下二种，见本传。
	英宗实录	
孟昉(西域)	孟待制文集	《夷白斋集》有序。

	孟天玮拟古文	《燕石集》、《滋溪集》有题词。
察罕(西域板勒纥城)	圣武开天记	《千顷堂》作《皇元太祖圣武开天记》。以下三种,均见本传。
	纪年纂要	《雪楼集》有序,《千顷堂》作《帝王纪略纂要》。《借月山房》重订本。
	太宗平金始末	
盛熙明(龟兹)	法书考八卷	《櫟亭十二种》本。
	补陀洛迦山考	见《普陀山志》。
萨德弥实	瑞竹堂经验方	《四库》辑《永乐大典》本。《吴文正集》有序。
保八(色目)	易原奥义一卷	以下三种,见《四库总目》,统名《易体用》。《松乡集》有序。
	周易原旨六卷	
	周易尚占二卷	
戈直	贞观政要集论(十卷)	通行本。
札马鲁丁(西域)	万年历	见《历志》,至元四年进。
可里马丁(西域)	万年历	见《仁宗纪》,皇庆二年上。
忽思慧	饮膳正要三卷	《道园学古录》有序。

## 附 征引书目

汉书	旧唐书	新唐书
宋史	金史	元史
元史类编	元史新编	新元史
元书	元史氏族表	补元史艺文志(钱大昕)
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倪灿)	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金门诏)	
元名臣事略	明史	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劄记	南唐书	安南志略
至顺镇江志	至正四明续志	西湖游览志
八闽通志	泉州府志胜	闽书
顺治吉安府志	雍正浙江通志	乾隆福建通志
乾隆泉州府志	乾隆济源县志	道光广东通志
道光南海县志	道光普陀山志	同治栾城县志
光绪嘉应州志	耶律楚材西游录	长春真人西游记
刘郁西使记	张星烺马可李罗游记译注	
元秘书监志	元典章	两浙金石志
越中金石志	常山贞石志	安阳金石录
和林金石录	和林金石诗	寰宇访碑录
补寰宇访碑录	攘古录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陵古金石考	经义考	内阁书目
蓁竹堂书目	千顷堂书目	四库总目提要
宋元学案	书史会要	图绘宝鉴



- |         |         |           |
|---------|---------|-----------|
| 画旨      | 清河书画舫   | 铁网珊瑚      |
| 绘事备考    | 式古堂书画汇考 | 佩文斋书画谱    |
| 三希堂石渠宝笈 | 元八家法书   | 茅亭客话      |
| 鉴藏录     | 玉堂嘉话    | 困学斋杂录     |
| 研北杂志    | 山居新话    | 至正直记      |
| 辍耕录     | 故宫遗录    | 庚申外史      |
| 谏言长语    | 乐郊私语    | 客座赘语      |
| 七修类稿    | 震泽纪闻    | 尧山堂外纪     |
| 枣林杂俎    | 日知录     | 居易录       |
| 池北偶谈    | 香祖笔记    | 十驾斋养新录    |
| 陔余丛考    | 开元释教录   | 至元辨伪录     |
| 茅山志     | 清河内传    | 摩尼教人中国考   |
| 元也里可温教考 | 苏轼东坡文集  | 谢枋得叠山集    |
| 郑思肖心史   | 丘葵钓矶诗集  |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
| 元好问遗山文集 | 陆文圭墙东类稿 | 邓文原巴西集    |
| 任士林松乡集  | 赵孟頫松雪斋集 | 吴澄文正集     |
| 刘因静修文集  | 刘将孙养吾斋集 |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  |
| 康熙默庵文集  | 王恽秋涧集   | 姚燧牧庵集     |
| 程鉅夫雪楼集  | 徐明善芳谷集  | 袁桷清容居士集   |
| 释大欣蒲室集  | 侯克中艮斋诗集 | 刘敏中中庵集    |
| 马祖常石田集  | 虞集道园学古录 | 杨载仲弘集     |
| 揭傒斯文安集  | 丁复桧亭集   | 王沂伊滨集     |
| 黄潜金华文集  | 欧阳玄圭斋集  | 柳贯待制集     |
| 许有壬至正集  | 宋褰燕石集   | 黄镇成秋声集    |
| 萨都刺雁门集  | 陈旅安雅堂集  | 傅若金与砺诗文集  |
| 李存俟庵集   | 苏天爵滋溪文稿 | 余阙青阳集     |

- |         |                           |         |
|---------|---------------------------|---------|
| 李士瞻经济集  | 迺贤金台集                     | 贡师泰玩斋集  |
| 刘仁本羽庭集  | 陈高不系舟渔集                   | 张雨句曲外史集 |
| 柯九思丹丘生稿 | 朱德润存复斋集                   | 郑元祐侨吴集  |
| 吴海闻过斋集  | 丁鹤年集                      | 舒頔贞素斋集  |
| 周霆震石初集  | 王逢梧溪集                     | 鲁贞桐山老农集 |
| 戴良九灵山房集 | 杨翮佩玉斋类稿                   | 倪瓒清閼阁集  |
| 王礼麟原集   | 赵汭东山存稿                    | 陈基夷白斋稿  |
| 王毅木讷斋集  | 高克恭房山集(自此至《于中集》十二种据《元诗选》) | 聂古柏侍郎集  |
| 雅琥正卿集   | 刘闻容窗集                     | 文矩子方集   |
| 倪玉立世玉集  | 泰不华顾北集                    | 薛汉宗海集   |
| 吴克恭寅夫集  | 昂吉启文集                     | 伯颜子中集   |
| 宋濂学士集   | 刘基诚意伯集                    | 王祹忠文集   |
| 危素说学斋集  | 乌斯道春草斋集                   | 杨士奇东里集  |
| 朱彝尊曝书亭集 | 王夫之薑斋诗文集                  | 全祖望鮚埼亭集 |
| 杭世骏道古堂集 | 文苑英华                      | 天下同文集   |
| 元文类     | 元风雅                       | 西湖竹枝集   |
| 大雅集     | 玉山名胜集                     | 元音      |
| 乾坤清气集   | 元诗体要                      | 元人十种诗   |
| 宋元诗会    | 全金诗                       | 御选元诗    |
| 元诗选     | 列朝诗集                      | 明诗综     |
| 甬上耆旧诗   | 乐府新编阳春白雪                  | 太和正音谱   |
| 中原音韵    |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 元曲选     |
| 归田诗话    | 诗数                        | 录鬼簿     |
| 皇朝词林典   | 词品                        |         |

## 附 录

## · 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

日本桑原鹭藏撰

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氏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代也里可温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掲載之《火祿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为当时学界所见重。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核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料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

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窠而为科学的者也。

陈垣氏于去年末,草《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其稿本迄未公表于学界,吾辈幸于今春得著者惠赠其稿本一部(译者按:陈援庵师之《元西域人华化考》上卷,已载于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

近日少暇,得遍读其全篇,兹将阅于其书所感,试略言之。案其稿本共为上下二册。所谓《元西域人华化考》者,盖研究元代西域人受文学的支那化之事实也。元代有多数西域人移住支那内地,其中景仰支那文化,受其薰陶,所谓华化者不少;是书即说明此种事实也。

支那人夙行所谓楚材晋用主义,超越国籍与种族之区别,而登庸人材;故外国人才多集于支那。此风尤以元时为最盛,当时来仕支那之西域人中,一方则以本国文化贡献于元朝者固多(例如亦思马因等之传西域炮术,扎马鲁丁之传西域天文,爱薛之传西域医药);他方则华化之西域人以所习得之支那学艺(经学、诗文、书画等)润饰太平者亦不少。陈垣氏之论著,以研究后者为主,此可以明了当时西域人受支那文化影响之深且广也。兹为使观者了解其内容之大概,故将其论著之目录开示于左:

上册目录:第一,绪论:(一)西域范围,(二)元时西域文化状况,(三)华化意义,(四)西域人华化先导。第二,儒学篇:(一)西域人之儒学,(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三)回回教世家之儒学,(四)佛教世家之儒学,(五)摩尼教世家之儒学。第三,佛老篇:(一)西域人之佛老,(二)回回世家由儒入佛,(三)

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第四,文学篇:(一)西域之中国诗人,(二)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三)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四)西域之中国文家,(五)西域之中国曲家。

下册目录:第五,美术篇:(一)西域之中国书家,(二)西域之中国画家,(三)西域人之中国建筑。第六,礼俗篇:(一)西域人名氏效华俗,(二)西域人丧葬效华俗,(三)西域人祀祭效华俗,(四)西域人居处效华俗。第七,女学篇。第八,结论:(一)总论元文化,(二)元人眼中西域人之华化。

附录:元西域人汉文著述表,征引书目。

观以上目录,则可知著者之论文,对于西域人华化之问题,为如何彻底的研究考核矣。观其绪论,先限定西域之范围,以解释华化之意义;于此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也。此为从来支那学者所不经见。又如以介绍元以前西域人华化之事实为研究之前提,更可见著者研究之方法周到也。

其本论博引傍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就中如畏吾儿人高昌偃氏家传及一门九进士事迹之考证(摩尼教世家之儒学),及元末诗人丁鹤年事迹之考证(回教世家由儒入佛),又如考证《丁鹤年集》四卷之非元刻(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尤尽委曲,非独为研究元代历史,即研究支那文化史者,亦有参考此论著之必要。甚望早日公刊,以广嘉惠于东西学界也。

吾辈就元时代之事迹,并无特别之智识,故于陈垣氏之论著,虽能赏赞,然实无加以有责任批评之资格。但予辈读毕此著,觉有两三点不妥,兹开列于左,以供氏之参考焉。若他日此新著公刊时,能参酌吾辈所见,则幸甚矣!

一,唐武宗命宰相李德裕,选秦汉以来入仕中国之外国

人功绩显著者三十人，作《异域归忠传》一卷（见《蒲寿庚事迹》二—六页）。此书今日不传，此三十人果指何人，虽未判明，然就此可知古代外国人来仕于支那者不少也。迨唐以后，外国人之入仕者尤多；然此等外国人多数为军人武将，文人绝不见，纵令有之，大抵亦限于北狄东夷种族，其西域出身者甚少。陈垣氏于西域人华化先导一节，称元以前华化西域人，有唐李彦昇，宋安世通、蒲寿晟三人，而李彦昇、蒲寿晟二人为吾辈往年已介绍于学界之人物，惟安世通则为陈垣氏所新介绍者也。

陈垣氏根据《宋史》卷四百五十九隐逸传所称“安世通者本西人”一语，而认其为西域人，断其为安息出身。但《宋史》所谓西人之文句，所指殊暧昧。《宋史》卷一百五十《王彦昇传》之称“西人”，盖指原州（甘肃）附近之蕃人，决非西域人之意义。宋人一般称西夏人为“西人”，指斥彼等时则谓为“西贼”，故仅根据《宋史》之谓西人，而即断定安世通为西域人，无乃不确乎？

假令此西人果作为西域人解释，然安世通之姓，果本于安息欤？此亦疑问也。唐时代移住支那之西域人，多以其本国之名为姓；据唐中世杜环《经行记》西域之末禄国 Mouru = merv 载云：

胡姓末者，兹土人也。

观此可知当时末禄国人移住支那者称末姓。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二亦载曰：

米氏：西域米国胡人也。唐有供奉歌者米嘉荣，五代米至诚。

此为米国人移住支那后称米姓之证据。西域石国人之来者，则称石姓，如唐中世李怀光养子石演芬（《新唐书》卷百九十三忠义传），其一例也。

西域安国人于唐时代或以前，移住于支那而称安姓者有之，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四叙安姓云：

出自安国，……后魏安难随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执李轨送京师，以功拜右武卫大将军、归国公……（其玄孙）抱玉赐姓李氏，兵部尚书平章事、凉国公。

又见《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云：

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又徙武威，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至抱玉赐姓李。

此《新唐书》之记事，亦不能十分凭信，其称安息为黄帝之后，乃附会耳。然直以武威之安姓，断为安息人，是亦疑问。此安姓谓其出于安息，无宁谓其与安国有关系也。安国即中央亚细亚之 Bukhara 地方，Bukhara 与 Samarkand 至唐代尚流行火祆教。唐中世慧超之《往五天竺国传》亦云：

此六国(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

漠罕默德教徒之记录,亦谓西历八世纪时拔克哈拉与撒马尔干一带地方流行波斯宗教,而安息人则不信奉火祆教及摩尼教,然凉州安姓为本州之萨宝(大约与《隋书》之萨保同),可知其为火祆教徒。凉州及其附近一带地方,迄唐时尚多火祆教徒,故以此安姓为出于与火祆教无关系之安息,毋宁谓其出于与火祆教有关系之安国,似此解释较宜也。凉州安姓之事,为研究支那火祆教历史之一重要史料,然从来无人注意之;如陈垣氏《火祆教入中国考》及石田学士《支那火祆教》(大正十二年四月之《史学杂志》),亦皆不引用之。

吾辈本以安世通为安国出身之人;然姑与陈垣氏同意,认其为安息出身,但陈氏以安世通之安世为安息之异译,则难以赞同也。东汉以来西域人既有以其国名之一字为其姓之习惯;如天竺人之竺法兰,月支人之支谦,康居人之康孟祥,安息人之安世高,大秦人之秦论:皆其实例也。安世高姓安名世高,则安世通亦当姓安名世通,而陈垣氏竟以安世为姓,通为名,无乃错欤?

二、于李彦昇、安世通、蒲寿晟三人以外,西域人之华化者尚有之:例如北朝之乞伏保为高车部人,其义母申氏死,解官奉丧归故宅(洛阳)。高车部即所谓北狄,或在西域人之范围外,亦未可知,然北朝时代高车部之土地,略与元代乃蛮部之土地相当(或畏吾儿之一部),乃蛮部(及畏吾儿)为元代色目之一,故高车部亦可视为西域人。亲丧解官为支那古来礼制,然北朝时代之多数官吏,必非实行此古礼;而乞伏保以塞



外种族,竟为义母之丧,循奉礼制,则其受华化之深可知。观《北史》卷八十四列彼于孝行传,可以知矣。

三、较乞伏保更为适切之西域人华化实例,尚有唐代之迦叶志忠。迦叶志忠之姓,明示为印度人,唐中宗时代为右骁骑将军知太史事。自高宗时代始,支那历法多出于印度人瞿昙、迦叶、矩摩罗三家之手。迦叶志忠为迦叶家之一人,《资治通鉴》景龙元年载云: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官至帝坐,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上以为然,敕称处纳忠诚,彻于玄象,赐衣一袭,帛六十段(《唐纪》二十四)。

迦叶志忠即其人也。《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六,载有志忠上中宗之进桑条歌表一篇,诚为堂堂之文章,由是可以推测志忠之深受华化也。

四、蒲寿晟之弟蒲寿庚事迹,吾辈已发表于学界,观其悬重金收买定武兰亭之刻石(见《蒲寿庚之事迹》第二八五页)与夫建设海云楼之事实(同上二三五页),可以窥见蒲寿庚华化之一端矣。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其卷四有题海云楼一首曰:

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

倚栏心自浮,万顷一磨铜,欲画画不得,托言言更穷。

阴晴山远近,日夜水西东,此意知谁会?鸥边独钓翁。

海云楼建设之目的,欲图望见海舶之出入;其楼及楼下亭之结

构亦可为其居处华化之一凭证也。

此《心泉学诗稿》只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未曾公刊，无由输入日本。吾辈于本年初春，得陈垣氏见赠其写本，始得寓目；同时又以蒲寿晟挚友之南宋遗民邱葵《钓矶诗集》写本见赠，兹附一言，以表感谢之意。

五、泰不华为儒者，为诗人，亦为书家：皆足成家，为元代著名之人物。陈垣氏考核其事迹，殆无余蕴。但彼是否可列入西域人中，不无疑问。泰不华属于伯牙吾台族，故宜认为蒙古人，不宜认为西域人；而陈垣氏儒学篇中云：

或称为蒙古人；其实伯牙吾台是色目之一，非蒙古。

如是断定，何所据欤？吾辈以伯牙吾台宜属蒙古，故主张泰不华不当列入西域人华化之实例中也（见大正五年十二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三所载箭内博士《元代社会之三阶级》四二〇页）。

〔原文载于日本《史林》杂志第9卷4号，1924年10月出版。中译本载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6期，1925年11月18日出版。译者陈彬和〕

## 致 陈 垣

(一九二五年二月)

王国维

《花间集》(卷十)有李秀才洵词三十七首(此据绍兴中晁谦之刊本,宋鄂州本“洵”作“珣”)。《鉴诫录》(卷四):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也,与李生常为善友,因戏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薰来也不香。”黄休复《茅亭客话》称珣为波斯人(手头无此书,未及检)。

王灼《碧鸡漫志》(五)李珣《琼瑶集》有《凤台》一曲,注云:“俗谓之《喝驮子》。”又云《花间集》和凝有《长命女曲》,伪蜀李珣《琼瑶集》亦有之。又卷三云李珣有《倒排甘州》。卷四云李珣有《河满子》。此四首皆在《花间集》所选三十七首之外,是珣词有专集,且至南宋初尚存。

### 三 致 王 国 维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陈 垣

静安先生道右：

承示李珣事，至快，即检《茅亭客话》李四郎条。四郎名珣，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兄珣，有诗名。珣举止温雅，以鬻香药为业云。因忆《旧唐书·敬宗纪》有长庆四年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事（并见李汉传），珣、珣其苏沙后耶？若然，则尹鹗诗所谓“胡臭薰来也不香”者，亦嘲其素业也。录之以博一粲。十四年二月廿日。

(手稿)

以上两函载《陈垣来往书信集》227—228页。

## 四 笔 谈 录

(约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七月间)

陈垣 陈寅恪

垣：不忽木，《元史》通作木，康里人，纛纛之父。不忽木，《元典章》忽（超按：“忽”应为“木”之笔误）作术。究竟是“木”是“术”？

寅：待查。但恐是术字。因蒙文 ju 字常有。而木字多是 bu 字，金女真满洲文即布字，如伊里布、塔齐布之类。

垣：此字若术，则与特勤、特勤之误相等，因各书皆作不忽木也。术误木甚易，木误术甚少。

寅：因此疑原是术。但须再查一查。

垣：元刻书如《太平乐府》等皆作木，若假定为术，应更有强有力之证据。

寅：故需再考是否有同一原文而译音不同者。此可于索引中求之。此种两译名字见于《唐书》而须改正者，如《唐书》龟兹王之名，《新、旧唐书》皆不同。苏代（超按：“代”为“伐”之

笔误)勃鞞、勃鞞,其实作“驶”。因近日发见此王之文告。puspa,花之意,即玄奘《西域记》之金花。故《新、旧唐书》皆误。

据原件。参陈智超《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文,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 五 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陈寅恪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路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

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今复取前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则读者自能知之,更无待于寅恪之赘言者也。挚仲治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二月陈寅恪谨序。